

炎黄春秋

第 9 期
2006 年

高尚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胡启立：雪泥鸿爪忆十年

朱厚泽：池必卿交班

于光远：要给梁湘一个评价

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

目 录

本刊特稿

- 1 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高尚全

亲历记

- 8 雪泥鸿爪忆十年.....胡启立
11 池必卿交班.....朱厚泽
16 我参加的1946年“反苏”游行.....燕 凌
22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林 晰

怀人篇

- 28 要给梁湘一个评价.....于光远
30 我的老师何干之.....宋 涛
32 张要在文革中坚持为刘少奇、万晓塘说好话.....方 凌
35 胡耀邦在川北指导我们办案.....杨宗贤
37 邓宝珊将军文革蒙难记.....牛正武

求实篇

- 40 周恩来与定西救灾.....邓全施
47 “红色间谍”郭汝瑰.....朱竟成 张治宇
50 李普今年八十八.....杨继绳

遗闻录

- 55 纯情燃烧的岁月.....段仁汉
58 吕彦直设计监造中山陵.....鄢增华
61 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度兼理川政.....曾景忠
64 柳亚子与汪精卫.....李海珉

一家言

- 67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吴 江
71 口号数字化 数码别太大.....章立凡

古镜台

- 72 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陈麟德

来函照登

- 75 马克思的女儿不是嫁给资本家.....高 放

专稿

- 76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中)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23512(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 高尚全

胡锦涛总书记于今年3月6日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温家宝总理也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中央的改革意志和改革决心,是在关键时刻采取的明智选择。不仅是对当前改革争论的回应,同时进一步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和《求是》杂志刊登“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新突破”的评论文章。我认为《人民日报》和《求是》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意愿。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从历史经验看,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并不奇怪。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恐怕也会有。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

有争论。1979年11月,小平同志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受到“左”的干扰,主管理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甚至批发了五位同志给他的信。这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的观点,认为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红旗》杂志编者的话说,“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

但我经历的最早的观念之争可以追溯到1956年。那一年我在一机部工作,做了一些调查。1956年10月23日这一天,入住一机部招待所的达1444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计划经济就是审批经济,企业需要设备,要找部里,企业需要原材料也要找到部里。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积极性,一切行动听上级指挥。政府则忙于发文件,靠行政的手段来维持运转。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当时有一个画家配了一个漫画,说企业买一个打字机要坐着火车跑到部里审批。当时计划经济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人们不敢说计划经济不行,为什么?因为那时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后来,有人就贴大字报批判说,这怎么行呢?企业有了自主权那还了得,那不是南斯拉夫吗?那不是修正主义吗?

现在回头来看,真正的突破是1984年。农村

改革初见成效,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产品丰收了,农产品要有市场,要销售出去,同时需要交换城市的生产资料,所以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城市还是老的体制,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平均主义,严重影响企业的自主权,不改革已经不行了。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起草过程中,我主张把商品经济的概念提出来。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哪个地方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商品交换,哪个地方的经济就发展很快,人们就比较富裕。所以我当时提出来,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之后,还要加上“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当时的阻力很大,有的同志不赞成,说这怎么行呢?这变成资本主义怎么行呢?后来就找了20个思想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过来开座谈会。大家在座谈中都认为应把商品经济提出来。根据座谈会的情况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中央根据多方面的反映和呼声,下决心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写进《决定》。

不过,1984年提出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人片面强调有计划的一面。曾经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种提法。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制度,将市场调节作为手段和方法,是两个不对称的概念,很不协调。所以后来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或者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也经过了一番争论。

其实,关于计划与市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了近100年。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但什么是市场?我曾经在多种场合讲到,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出现了市场,它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它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为市”的提法。一个地方有了市场,就会繁荣起来,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但传统观点却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

1987年3月20日,我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8月20日我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三点意见: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三、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我希望中央十三大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同志把我的材料转送中央领导。

1987年10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应当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定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社会主义经济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然而在1990年,计划经济又回潮了,有同志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了好多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那时,有同志又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同志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有人写文章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那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新上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选择了以理服人的做法,通过向中央送了两份材料,影响中央高层决策。我当时是陈锦华的助手,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一篇是对外经济体制司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同志看了以后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同志看了以后,批示要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

件起草小组参考。当时,整理这个材料的一位副司长压力很大,怕犯错误,怕有人批评资产阶级就在对外司。

另一篇是1992年4月15日召开广东、江苏、山东等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后报送的材料。这个座谈会的议题就是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座谈会很神秘,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得外传。因为在当时对改革的非议没有过去,讨论这个问题很敏感。

根据讨论,锦华同志亲自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从五个省的实践看,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的地方,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说明市场经济这种手段和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这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当然,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小平同志。对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说一个字都不要改。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平息了关于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

根据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但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当时并不明确。1993年,我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我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

解放以后,本来资本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后来我们搞了计划经济,“资本”两个字不能提了,因为一提“资本”,就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就改称“资金”。后来在《决定》中,使用了“资本市场”的概念。

我认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要求。既然我们承认劳动力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惟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承认它在各个生产要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我们怎么能让其他生产要素都进入

市场,单单劳动力不让进入,还怎么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呢?

但这个概念刚一提出,立刻就有同志反对,说这个不行,劳动力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动摇,怎么能够市场化?但我还是坚持。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我列席了。有关领导同志也担心提出劳动力市场能不能被接受。那种会议本来没有我发言的资格,但我莫名其妙,几乎是失去控制地讲了,提出“劳动力市场”的五条理由。后来,江泽民同志在我的《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一文上做了“请中央各常委参阅”的批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劳动力市场”最终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但虽然写进了中央的《决定》,后来还是有一位教授批判“劳动力市场”这一看法。

当前的争论是过去姓“资”姓“社”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本刊创刊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言

二、正确评价中国的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加到18.23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4%,而同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3%左右。

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6.1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改革以来的28年是人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改革明显提高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1978年到2005年,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16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1.4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8189亿美元。现在,我国GDP列世界前四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谷类、肉类、棉花、钢铁、煤炭、电视机、电脑等产品产量以及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不久前召开的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和印度,并决定论坛夏季还要在中国召开。所有这些成就,都来源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因此,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是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

改革虽然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存在不少前进中的矛盾、问题和体制性的障碍。比如,现在基尼系数确实已经很高了,贫富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对这些问题要客观分析,不能武断地说医疗改革失败了,教育改革失败了,住房改革失败了,不能简单地地下这些结论。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不完善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缺失,没有兼顾各方面利益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改革变形了,变成了假改革。因此这场争论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承认问

题,而在于如何分析问题。

大家知道,90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大家基本上是普遍受益,现在,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同时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困难群体。在社会结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多样化,改革触动到利益主体,改革要调整利益关系。改到这里难度就大了。在这个新阶段,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改革的深度、广度、复杂性正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过去28年的改革进行总结,从而汲取经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在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发生的变化,一旦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判断,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改革所导致的。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就是权钱交易,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如19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19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在这种局面下,只有着力推进改革,尤其要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怎么做?首先,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比如,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的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当然,也有人说,过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两极分化,所以现在应该颠倒过来,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是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和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搞市场经济就要有竞争,要讲究效率,不讲效率的市场经济就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容易搞成平均主义。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似乎很公平啊,每个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但是大家不希望要这种贫穷的公正。市场要讲求效率,政府要强调公平。一个是有效地更好地创造财富,一个是更好地实现公平,使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优先或者公平优先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现在有人提出,针对当前主要危险、主要倾向,当前要反右防“左”。现在老百姓最怕折腾。折腾的苦头过去吃了很多,折腾就会落后,折腾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折腾就会影响改革和发展,折腾就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老百姓希望现在不要折腾,将来也不希望折腾。我认为,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只有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使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当前,要着力解决和满足人民群众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所谓“西山会议”的事实真相

不少同志问到,所谓“西山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不回答这个问题,是对改革历史的不负责任。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本是一次内部的专家例会,重点分析当前的改革形势,旨在深入研讨、交换意见,提出对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位学者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言论,更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私自将会议的原始速记稿刊登在海外的华人论坛网站上。乌有之乡网站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人还把一个普通的座谈会与当年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扯到一

起,戴上“西山会议”的帽子,进行恶意炒作。

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针对近一、两年来社会上有关改革的大讨论,通过实事求是地分析,澄清认识,坚定方向,以期形成改革的共识与合力,提出措施建议,加快推进改革。

围绕当前关于改革的这场争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那些公开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人们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低效益与人民生活的贫穷与落后,中国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改革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直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改革的共识。

围绕当前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诸如医疗、教育、征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政府官员腐败等,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与其说是改革的不成功,不如说是一些领域中的改革起步晚了,进展慢了,改革的力度小了,使得长期形成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不能把当前出现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失败。

就如何解决当前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与会者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重点应调整积累与消费或者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应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扩大政府对困难群体扶助的转移支付。针对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是破除垄断,政府应管好基础医疗与公共教育,同时放出一部分资源交由民间主体去创办;通过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在抑制腐败的问题上,必须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破除行政性垄断,从制度上根除权力寻租的腐败机会;同时,下决心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完善的法律制度。

从总体上看,除个别发言外,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围绕上述内容展开交流和研讨的。通过深入研讨,与会者树立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信心,形成了下一步继续深化改革的共识。

乌有之乡网站于3月24日发表黎阳的署名文章《“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看“精

英”西山会议的典型发言》，首次将杏林山庄会议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牵强地联系在一起，说“如今中国的‘改革精英’们也开了个‘西山会议’。”并声称会议原始记录“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完整的党纲党章。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后。6月10日，乌有之乡刊出了《钟轩理的“理”不通》的文章，认为整篇文章空空洞洞，根本不联系实际。“说客气点，叫信口开河，不折不扣的官样文章；说难听点，是做贼心虚，以官方身份喝令老百姓停止反思改革，惟恐暴露以‘改革开放’为名盗窃国库、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的真面目。”6月11日，秋石客刊发《评钟轩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一文，认为“这样重要的文章，连一句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没有提，是作者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的呢，这可是最要害的问题。作者可能无视亿万人民群众对领袖毛主席无限的热爱之情，自然要滑到了新老自由主义反列宁主义，反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日，黎阳在华岳论坛继续刊发文章《钟轩理合法非法？》，说钟轩理的文章与“西山会议”“是一伙的”，“一个鼻孔出气，连措辞语气都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人制造所谓“西山会议”事件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与束缚，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左”比“右”好的错误倾向。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犯“左”的错误理直气壮，甚至很光荣；犯“右”的错误则要身败名裂，甚至被杀头。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冒出来干扰历史进程。极左派们制造所谓“西山会议”事件，不过是他们企图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开历史倒车的又一例证。

在有的网站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一系列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文章。例如在乌有之乡的网站中，秋石客在《当前理论界应展开深入讨论的十五个问题》的文章中，提出要“重新认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问题”。在他看来，“拿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来说，经济工作是否依然是主要矛盾，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确已发生了变化，以资本主义复辟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等政治问题成了主要矛盾”。因此，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进行调整”。有一位从一开始就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同志甚至提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而是七、八年一次地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资产阶级叛变”，把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甚至在乌有之乡的网站上，竟然出现了一篇《张春桥，你没有死》的文章，吹捧张春桥，说他是“一个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才华和最有实力的无产阶级理论家”，明目张胆地为张春桥平反。刘日新同志在《从“计划”改“规划”谈起》的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是天经地义的”，“新自由主义特别仇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这样走下去，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将要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附属国。”

这些人，不仅对杏林山庄会议的原始记录稿恶意炒作，连篇累牍地上纲上线，还给党中央施加压力，试图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间挑起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运动。如果按他们的意见办事，必然出现灾难性后果。

四、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大武器。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体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中国的国情实行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它有五个基本特征：

1. 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 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
3.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4. 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

障；

5.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这次改革争论中,为什么有人提出国务院发展非公有制 36 条是违背宪法的,不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说《物权法》是违宪的,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为什么有人说改革方向出了问题,改革是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国有经济实现战略性改组,就有人认为是搞私有化,就不是搞社会主义了。

有人认为,现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国有的比重已不到 20%,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地位了,私有化了,不是搞社会主义了,搞资本主义了;有人批判说,根据普查,工业领域中,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比重只占 20.3%,这怎么叫社会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按照这些先生们的逻辑,只能搞一次国有化运动,把国有经济比重搞到 70—80%才能算搞社会主义。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倒退回去才算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其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分歧。这次争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争论还会继续下去,100 年也不会罢休。

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是把人民的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准则的社会主义,是使人民得到实惠,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义不是说你的国家权力有多大,国有企业有多少,国有经济的比重有多高。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那种国家控制全部资源,国家包办所有企业,国家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总之是以国家为本的社会主义,以往的历史已作出了结论。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力量把企业和托拉斯国有化。德国拉萨尔曾鼓吹国家社会主义。恩格斯曾对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作过深刻的批判:“自从

俾斯麦致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十足的奴才习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55 页)

我经常讲这两句话:人民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人民创造财富多了,政府的税收也就多了,就有财力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样就进入良性循环。

以人民为主体,首先表现为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人民要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马克思提出,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我理解重建个人所有制,必须承认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主体。社会主义必须使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同人民的劳动直接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使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来,才能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起来。这一切都必然要求有完善的法治来保障。正在制定中的《物权法》就是要保护人民的产权。不管是富人的和穷人的合法财产都要保护,合法财产为什么不保护?至于不合法的财产,逃税、受贿等靠非法得来的财产,自然有法律来制裁。人民财产必须保护,若不保护,第一资本会外流,第二会挥霍浪费,第三要丧失创造财富的动力。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我所提出的民本经济,就是以民为本,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也就是老百姓经济。这种经济它可以使“你要我干”变成“我要干”,能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内在动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国有经济与民本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关键是政府要做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维护人民利益,首先是维护人民创造的财富。财富的合理分配、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财富的有效创造是前提,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两个都要重视。对财富的创造如何保护,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制度安排都很不够。所以,当务之急要加快《物权法》的制订。

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我认为,这是这次改革争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责任编辑 杨继绳)

雪泥鸿爪忆十年

● 胡启立

1993年3月15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人潮涌动。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我随着众多人大代表一起从东门进入会议大厅，刚刚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就被眼尖的记者发现。顷刻间，我陷入了聚光灯和麦克风的重重包围之中。

记者们的提问在耳边响起：“请问胡先生，您过去是政治局常委，每次开会都坐在主席台上，如今坐到了台下，对此您有何感想？”

问题不容回避。在摄像机聚光灯的照耀下，我坦然地回答说：“过去我总跟别人讲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为什么轮到我自己就只能上不能下呢？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不改。现在我要尽心尽力，当好一个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感想。”

我这个话是发自内心的。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在我心中永远是至高无上，是第一位的。无论在任何岗位，任何情况下，都要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都要尽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这就是我人生的信条。

我未能料到的是，就在那次人代会上通过决议，将原机械电子工业部分开，成立了新的电子工业部，并任命我为电子工业部部长。我过去几十年中大多时间都是做党务工作的，到国务院政府部门工作是一个新的挑战，何况我对电子工业也了解很少，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考验。组织的安排，人民的决定，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毅然接下了这副担子。

在长期计划经济的传统分工中，电子工业部一向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装备部”，主要任务就是从事电子元器件和整机等产品的制造，如电视

机、通信设备、各种电子元器件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使停留于单一制造而缺乏系统、网络和服务意识的电子制造业，逐步失去了市场。以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当时我国电信市场需求巨大，但是国产通信设备却只占不到30%的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瓜分了大部分市场，通信领域的重要装备形成了“七国八制”的分裂局面。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和新电子工业部党组的同志们深入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电子工业的发展趋势，提出新电子工业部的首要任务是从传统的单一制造业向现代电子信息产业转变。围绕这一战略，在之后的五年中，我们重点抓了三件事：打破电信垄断，推进信息化，建设“909”工程。

为了推动产用结合，给国产电子信息产品开拓市场，并给广大消费者造福，我们致力于打破电信垄断，组建联通和吉通两个通信公司。此项举措，一时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虽经百般波折，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经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两个公司终于成功地建立并取得了发展，从而第一次在我国电信领域引入竞争，拉开了电信体制改革的序幕。它们为近十年来我国电信运营和装备制造产业适应市场规律的要求，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推动软硬结合，装备制造和系统集成的结合，推动我国电子工业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我们提出和致力于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信息化基础设施工程——“金桥”、“金卡”、“金关”，即所谓的“三金工程”。它们实际上是计算机网络在国民经济各部

门的推广应用。今天,“三金”工程已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金”系列工程,大大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向各个行业的渗透。计算机网络管理与应用在全国真正进入了普及和深化的阶段,为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倍增器”的作用。

无论打破电信垄断,还是推进信息化,都是为了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宽电子工业的市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增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尽管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速度很快,产业规模很大,产量也很高,但是利润却很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是我国不掌握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产量越大,向外国缴纳的专利费、技术提成费也越多,中方只是获得微薄的劳务加工费而已。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作为电子产业基石的半导体产业方面。当时,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严重滞后,85%以上的芯片依赖进口,集成电路生产在技术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三代以上。核心技术的缺乏,严重制约了电子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在没有自己集成电路产业的情况下,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就受制于人,命脉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

经过细致深入的讨论研究,1995年电子工业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九五”期间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报告》。当年12月,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组会上,又做了关于《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是重中之重》的专题发言。党中央、国务院对报告和发言极为重视。由此,“909”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断决策下应

运而生;继而,它又在中央各有关部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直接支持下,“特事特办”,高效运作;终于,凭借国家的强力支持和“909”工程建设者知难而上、奋发图强的艰苦努力,我国第一个世界主流水平的集成电路企业——上海华虹微电子有限公司诞生。国务院决定由我这个政府部长直接兼任董事长。

人的一生中总会在某种形势下做出自己没有料到的选择。我以66岁的年龄兼任华虹集团董事长,直接主持“909”工程,确实非我个人意愿和主观设计,完全是时也、势也。当时就有好心的朋友对我说,你搞“909”,是“抢个地雷顶在自己的头上”。确实,当时并非不知道其中风险,只是风险之大,复杂程度之深,均远远超过我所预料。

“909”工程虽顺利立项,但迟迟找不到合作伙伴,被外国人嘲讽为“中国人以为有了钱就能搞半导体”,搞“错位”了;工程开工建设了,恰逢半导体市场低迷,全世界半导体工厂纷纷缓建或停工;想自力更生,却发现已经开工建设的超净厂房没有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比需要的面积小了一半;和日本NEC公司合作谈判成功了,却又招来批评,有人说是“中国人买个炮仗让日本人放”;还没来得及为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成绩庆贺,就遭遇世界范围的半导体存储器市场一落千



1999年2月23日,华虹NEC芯片生产线投片仪式

丈,刚刚上路的生产线必须转型为代工……

一路坎坷一路歌。“909”工程从立项、建设到投产,这中间既有背水一战的拼搏,也有柳暗花明的转机;既有短暂的迷茫困惑,更有勇往直前的豪迈信念;既有沉着冷静的执著,也有迎难而上的坚韧。一次次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又一次次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而我虽为之心力交瘁还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我明白,我背后没有退路,党和人民需要办的事一定要办成,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当时我曾经说过:“如果说,向集成电路投资有风险,那么不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因此而影响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那才是最大的风险。”个人可能遭遇的风险,和国家的利益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当时我曾向华虹董事会的同志们说过:“建设‘909’,走的好比是华山天堑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半导体产业是国家生死攸关的产业。‘909’如果失败,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动摇我国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信心。这样一来,就会坐失良机,阻断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道路。”因此,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任何个人考虑,任何畏难、退缩情绪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正是国家利益,人民需要,这样一个大局把我们整个团队的意志凝聚到一起。这就使“909”工程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初创的胜利。

作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龙头企业,到2005年6月,华虹已经完成和超过了当初立项时的所有目标。

华虹集团现已成长为专注于芯片制造、芯片设计、营销、投资(包括海外投资),以及系统集成等领域的大型高科技集团。华虹 NEC 的 8 英寸生产线实现了自主经营,2004 年,华虹集团销售收入 49 亿元人民币,并进入稳定的盈利期。由华虹控股的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已掌握 0.13 微米面向大生产的标准 CMOS 工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初步形成。2004 年,华虹 NEC 在全球半导体代工企业中排名第 7。在完全依靠自身资金和技术积累的情况下,其产能从月投 8 英寸盘 2 万片发展到 4 万片(2005 年底将达 5 万片),技术从 0.5 微米升级到 0.18 微米,通过即将开始建设的 12 英寸生产线,华虹 NEC 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进一步做大做强。

华虹 NEC 生产线为信息产业的核心——集成电路产业在我国的生根、繁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效益。仅以手机的 SIM 卡芯片为例,在华虹 NEC 建成之前,我国移动通信 SIM 卡芯片全部依赖进口,平均采购价为每片 82 元人民币。华虹 NEC 投产后,支持华虹、大唐两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自主设计开发 SIM 卡芯片,并为其加工;产品打破国外垄断迅速推向国内电信市场后,价格随之急剧下降。到 2004 年,SIM 卡芯片平均价格已下跌到每片 8.1 元人民币,从 2001 年至 2004 年,仅此一项就让消费者节省了 60 多亿元。

华虹 NEC 的成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它以事实证明中国大陆具备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在其系统作用的带动下,海外集成电路制造商蜂拥而至,仅长江三角洲就先后出现了中芯国际、宏力、和舰、台积电等多家知名半导体企业。今天,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台湾省以外新的芯片制造基地。

芯片制造业的繁荣,直接带动了设计业的发展。到 2004 年中国大陆芯片设计公司增加到 421 家,总销售额达 81.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率为 41.5%。

芯片制造与设计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我国从“电子大国”向“电子强国”的迈进,奠定了初步基础。

事实证明,1995 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909”工程的决策是高瞻远瞩、正确及时的。华虹集团 10 年来潜心励志、艰苦奋斗,实现了在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掌握了半导体产业中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并具备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下一步以国际化(组建跨国团队、利用全球技术与资金、参与国际竞争)为目标的全面自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转瞬即逝。而今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双鬓朝如青丝暮成雪。随着岁月流逝,一切都会从记忆中渐渐淡去。正如苏东坡赠其弟苏辙的一首诗中所言: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班交卿必池

● 朱厚泽

池必卿同志是在贵州摆脱“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着手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干部新老交替之门,走向新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备受尊敬、信赖的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

当必卿同志即将迎来九十大寿的时候,类似我这样年龄和经历的贵州干部,内心分外惦记他。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情景,就像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我心中萦回。

我第一次见到必卿同志,十分偶然。那是1978年底北京正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我随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同志、书记夏页文同志,按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事前所作的安排,到花园村李的家里,当面向当时来京参加会议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汇报1964年贵阳四清的严重情况和受到错误打击的大批干部群众现时的困难处境,促请省委切实抓紧平反冤假错案。我是主要汇报人,情况说得很简短。在我当面“放炮”,批评当时省委对平反贵州四清中的冤假错案拖延、敷衍时,省委第一书记开始脸色颇表不快,但随着汇报过程中李井泉的插话和他转述耀邦同志的意见后,很快就转而对那些“四清下台干部”说起些言不由衷的好话来。而和他一起来的高鼻梁、深眼窝的高个子老头,除中间插过一两句话外,只是平静地听着,并未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会后回到中组部东华门小招待所翠明庄,我整理记录,这才找人打听,得知那位老头是新调任贵州省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老资格的原华北局书

记处书记池必卿。

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由于必卿的果断和贵州许多老领导坚持正义热情推动,中央和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速行动,文革、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量得到纠正、昭雪平反。许多沉冤久远的老人得以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安度晚年;许多被赶出城市的家庭,得以重返家园,子女得以一视同仁,入学就业;许多被弃多年、长期被视为“异类”的分子和中青年干部得以重新起用。我就是这个时期,在平反、恢复党籍后,经省委重新任命参与贵阳市领导工作的。

我与必卿直接的接触,开始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团到京,被安排在牛街住清真寺旁宾馆,我不习惯那个气味,弄得很恼火。传说是有人以为贵州省是“少数民族”,因而作了类似“伊斯兰”的安排。几个人在下边议论想提意见,据说必卿不让讲。我原来以为他是北方人,很习惯。谁知他根本吃不了牛羊肉,结果只能每天给他煮一碗北方汤面,或者加个鸡蛋。整个会期他就这么过的。我才体会到他的顾全大局和生活简朴。后来我上他家里,夫人徐若冰同志让我品尝她家的北方味,我只觉得从山西带来的腌小黄瓜,手指粗细,特别好吃,其他东西,都难与南方相比。

十二大结束,我直接回贵阳,向市委、市级机关、企业、学校作传达。好像事隔不久吧,刮起了一股清理精神污染的风,报上登载许多外省

的领导人发表的谈话,像是表态的样子。我却没有看见必卿有什么谈话。后来《经济报》的记者还找我问,我说中央说过,不搞污染嘛。接着就传来贵阳街头有公安局的人剪小青年的喇叭裤,等等。必卿见我就问:有这个事吗?我说:我也听说了,给市公安局局长直接打过电话,他们说市委夏页文同志已经批评了他们,马上检查改正了。必卿摇摇头说,可笑。接着谈起建寺庙、烧香拜佛之类的事情来。我说了陪客人上黔灵山,看到弘福寺里烟火缭绕。我说,穿着高开叉的旗袍,光着两条大腿,搽烟抹粉的,趴在地上又烧又拜,也真不太像个样。必卿却把眼睛瞪着我说:少见多怪!后来省委让检查一下各地清污的情况,事情还真不少,什么随便定性批判文章、书籍、绘画等,都有,还是紧张了一阵子。经过反复划分政策界限,才没有重复过去习惯了的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老毛病。

我在必卿直接领导下参与贵州省委的领导工作,是1982年年末。当时农村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大体过去,必卿和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省委工作重点历来在农村,面对这么个新形势,抓什么?怎么抓呢?

我把中央的整体部署精神和我们从地市、县区农村调查中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向他汇报请教: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注重边远山区扶贫济困,保护农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涉及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等一整套调整和改革。这一来,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的教育、选拔势必重新安排,相应转变……而这一切都必须从贵州省的省情出发。我深感对贵州省情的系统了解,深入研究太不够了。

我向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下边的话已到口边,我想说“力不从心”。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说出来。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还想用过去“催种催收”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他赞赏地说:就按这个思路去搞。你不只是管农村,要代表省委把城市也一同抓起来,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还要抓党校,轮训和培养干部。注意大学和科研院所,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搞个小的班子,联系一些专家,共同来研究省情,制定近期改革方案,策划未来的长远发展。

我在省委那几年的工作,大体就是在这么个思路下搞的。必卿对我的工作很放手,总是鼓励我和省委比较年轻的几位同志“大胆放手干,有问题我负责。”他还委托何仁仲同志直接帮助参与和组织,吸收了一批省级各厅局、大学、科学研究所的学者、研究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广泛搜集资料,编辑出版了贵州省情的专著,展开了贵州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了城市改革的思路和要点,参与了大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推动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

当时省政府先后主持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苏钢同志、张玉环同志、王朝文同志、周衍松同志、刘玉林同志等,抓经济工作都很得力。大家在必卿领导下分工合作,使贵州在原来较低的经济基础上,那几年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1984年春,冰雪严寒,耀邦同志从四川南部向贵州西北高寒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去看望贫困山民。贵州山区冬季,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没法行。必卿让我们年纪轻的留在贵阳,他自己亲自到毕节去接耀邦。两人都年近七十,又都感冒生病,仍然坚持看望农民,找干部谈话。到贵阳后,耀邦又把西南几省领导人一起约来,分析情况,讨论工作,勾画西南开发的初步蓝图,促使四省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形成。

我随必卿送耀邦到湘西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回贵阳,按耀邦指示和西南领导人会议讨论的意见,召开省委会议,调整工作布置,并让

我召开电话会议，直接传达到县委的领导人。那种严格、认真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1984年夏末，省委全会临近，而我们没有按时完成原定要起草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文件。必卿让我向全会作口头汇报。会后他不仅没有指责我，而且背着我的

面向若干领导同志赞扬和推荐了我向全会所作的口头汇报。他说：党委的讨论，重在把思路、观点搞清楚。他对我在汇报中着重强调的：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在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等几个要点，都给予充分肯定。全会经过讨论，在当时的体制改革上大体形成共识，对此后贯彻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从思路上了了先导性的酝酿，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当认同。

1984年冬，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决策启发下，我在聊天时向来西南调研的中办负责同志，谈起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想法。中办的同志听后当即问我：这么大的事，你说得轻描淡写的。你向中央写了报告没有？他们认为：提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我赶快写报告。我用一千字、一页打印纸，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建议，送给必卿看。因为担心考虑不周，只想以个人署名上报，“仅供参考”罢了。不料必卿看后，认为很好，并由他亲自提请常委讨论，最后以省委署



池必卿在贵州

名，正式报告了中央。

那几年，原省委的徐健生同志、秦天真同志、吴实同志几位老领导人，从贵州的省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趋势中，确实是高瞻远瞩，早就注意到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不辞辛劳，深入大山深处，亲自发现景观、勘察景点，规划协调，督促实施，倡导发展旅游业。而我那时还只顾上“吃饭穿衣”，没有“回过神来”。健生同志严厉批评我：“织金洞，你去看过没有？还是你的老家呀！”我向健生作检讨，和省委几位同志一起，在健生的督促和亲自带领下第一次进洞察看。必卿得知此事，非常赞扬健生，赞扬天真和吴实。提醒我认真注意全局，并以他到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的亲身考察的经历。当面向耀邦推荐贵州的独特岩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争取中央机关对贵州旅游业开发的支持。

必卿和几位老同志深知贵州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破坏十分严重，而又是珠江源头和长江重要支流的生态屏障，开发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子孙的持续生存，要下大决心保护环境。我那几年抓紧时间自己跑宽阔水、洛龙和大小沙河、赤水习水林区以及几条江河上源等处查看，都得益于他们的经常提醒。草海的恢复和几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天真和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们的督



池必卿(右)与朱厚泽

促下实现的。

1984年前后,全国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调入,与粮食主产区闹矛盾。我和政府几个同志都比较一致,坚持每年20多亿斤粮食调入不要减少,除用于发展传统名酒,更着重于用在退耕还林还草上,希望逐步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落后国家、落后地区,一旦从长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经济体制下松动开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看上去高一点,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实践一再地证明是如此。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每到这时,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还会弄出些“一刀切”的什么措施来。我对这种事,向来不大赞成,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对报纸记者公开谈过:“哪个龙头漏水关哪个,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去关死总闸。”《世界经济导报》就曾经以此为题报道过我的谈话。正是在这个思路下,我在一次全省传达部署经济调整(实际是收缩)会议结束当天中午,立即通知把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留下,就“政治工作要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为内容,专门单独开了半天会。我讲了话。这事可能是有人告状到必卿那里,他找到我,直截了当地问:“刚刚开完会,怎么又开会?”我如实

地向他说明:经济调整就要贯彻下去了,我布置一下政治工作。我的想法是:全国性的调整措施,地方也无可奈何。但我们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许多宏观指标并未突破,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力争发展得好一点、快一点嘛。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对我的观点是完全理解的,但他一句赞同的话也没有说,而是叮嘱我:可要谨

慎啊!

只是到了我离开贵州,进京工作多年,历经一次又一次的风浪与波折以后,才了解到事物的复杂、艰险和微妙,理解他当时的关怀和良苦用心……那可是一块特殊专属领地、危险雷区,外人碰撞进去,就会引发高能量爆炸,是可以让你粉身碎骨的。

必卿是老资格的省委和中央局书记,比我年长十几岁,但他有意把我推到省委最前沿。中央一些会议在贵州召开,一些领导部门来贵州商谈工作,要听省委和他的意见,他经常让我出面。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大会,中央派伍修权同志等党的老领导人到遵义参加会议并讲话,还有大军区的老将军们出席,他却让我代表省委作大会报告。我们多年来习惯于论资排辈,“小的站惯了,不敢坐”。对于必卿这种做法,我那时的确颇感为难。那天在遵义,我注意到,伍修权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全文按北京会议的传真稿,一字不改地宣读的。我却冒冒失失地拿着自己到遵义后才紧张修改出来的报告稿,在大会上讲了一通。会议结束后仍有点忐忑不安,必卿却对我说:伍修权同志听完,向我点头,同意你的讲话。你不要那么紧张嘛。

1985年春夏,西南加广西,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即将举行。这是耀邦亲自倡导,得到国务院一些部门支持,各省协商一致“轮流坐庄”主持的松散的经济联合协作会晤。1984年第一次会在贵阳举行,必卿作主席,第二年轮到重庆,中央部门,沿海城市,许多大企业都有人来参加。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一再致电省委,请必卿到会。伯康还打电话给我说:第一任的主席不来交待,我们怎么接手呀?我当时正在遵义乡下跑,只得多次向贵阳打电话,请必卿去一趟。后来他总算电话回复,告诉了火车车次和时间,让我从遵义上车与他同行。那天傍晚我按时上车,与必卿和夫人徐若冰同志会合。我们一起在车厢里聊了好一阵子,各自休息。车到重庆是清晨4时过一点,天还没有亮,重庆市长到车站接客人。我已整装好请必卿下车,他却笑着说:你就去吧,代表省委讲话作个交待嘛。我这才知道他的车票是直达成都的,他实际上是把我赶下了车。随着汽笛长鸣,他和夫人、秘书就随车向成都方面驶去。

我只得随重庆市长于汉卿同志驱车到宾馆,洗脸、早餐,没有休息就进入会场。伯康大笑着把我拉到台前,坐在他的身边,硬是强迫我在开幕式上首先代表第一任主席作了一个即席讲话。然后,他才开始主持第二次会议的各项议程。

必卿与我在重庆火车站一别,就成为必卿夫妇离开贵州,与贵州人的告别。

他在成都呆了一段,经重庆转武汉,就离贵州之任转赴北京休息去了。

我回到贵阳,原省委的老同志们纷纷问起:省委就让必卿这么走啦?颇有责难之意。我当即让省委秘书长刘汉桢同志赶赴武汉,当面向必卿转达老同志们对他的问候,请他再留一留,回贵州再与大家叙一叙。从三中全会到1985年,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可是必卿毫不犹豫,就这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离开了。

此后不久,我也调离贵州。必卿的离去,就成为我这个后来人的告别“模式”。

在北京,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必卿对贵州

仍然是很关心的。翻阅存档,我手头还存有他到京后那几年,画得圈圈点点,还加有小字批注的关于贵州情况的参考资料。

这些年必卿生活是安详的。他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始终关注,也存在某种忧虑。

月前我到北京医院病房看望他,老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压在胸前,久久地不曾松动。但是,已经不能开口说出明白的话语,……我们只能用眼神对话了。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与风波之后,我也年逾古稀。

回忆与必卿同志相识相处的岁月,我的心中怀着的是尊敬、惦念,是感激之情……

在迎来老人九十高寿之际,祝愿老人平安,健康,生活在宁静、祥和之中!

2006年3月27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卫生部医药卫生优秀期刊

中老年保健杂志

全彩月刊 全年订价仅: 62.4元 5.2元/每月 邮发代号 82-221

全国邮局订阅电话: 11185



订阅全年杂志赠
2007年精美保健养生月历一本

关爱父母是儿女的责任
父母健康是儿女的福分

订阅电话: 010-64284311 84205154 网址: www.bj626.com

我参加的1946年“反苏”游行

● 燕 凌

1946年2月22日,在重庆,继之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一次爱国青年学生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活动。是非曲直,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几十年间,参加过这次行动的人们却为此背着一个“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为此挨整,至少是被弄得不清不白。至今,在青年运动的历史记述中,对这一件事情还没有一个明白的说法,正式的史书,有的仍然沿用以往的负面论断,有的则撇开不提,说是“回避”了。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为什么要回避呢?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还要回避到什么时候呢?

美英苏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埋下了祸根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45年2月4—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规定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直接有关中国的条件是: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协定签字的时候中国毫不知情。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

当时美英以损害中国权益为条件促使苏联参加远东作战,主要是为了早些结束战争,从而

减少美军的伤亡和损失。

美方当然知道,一旦苏军进入与中共军队接近的地区,会出现复杂的局面。因此在这方面事先要同苏联达成谅解。于是,美苏双方在1945年5月间作了一次会谈。苏方表示:将定期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而采取行动的日子将视中国满足雅尔塔协定的情况而定;苏方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并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统一的领袖,中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统一;苏军进入的地区,蒋介石政府都可以建立行政管理机构,蒋的代表可以随苏军一起前进。美方把苏方的要求和这些承诺通知了蒋政府。蒋介石提出要美国充当中苏之间的中介,美方拒绝了,并且申明,美国政府支持雅尔塔协定。

从1945年7月初起,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进行了一个多月讨价还价断断续续的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在日本投降已成定局的时候,才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的协定,关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斯大林仗恃三国雅尔塔协定,蛮横霸道,而蒋介石政府当时有求于苏联,想要在苏联支持下独占东北,终于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

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其中说:“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还指出,“这秘密协

定的本身还有一段很难看的文字,就是:“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楼光来、宗白华、范存忠、储安平、吴世昌、林超、苏阶廌、钱青链、吴人之、吴恩裕、陈铭德、罗承烈、赵超构、钱歌川、任美镠、张贵友20位著名学者联署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抗议》,措词强硬,指出这一协定开创了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之恶例,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之纪录。

广大青年学生看了雅尔塔协定,看了《大公报》的评论,不只同样感慨,而且愤怒起来。这时候,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一位工程师,当时是中央政府经济部工矿处副处长,被派到东北接收抚顺煤矿。据说,他和他带领的几位接收人员,到抚顺后受苏军阻拦不能执行任务,在离开抚顺的时候,在一个火车站上,被拖出车厢,一个个脱光衣服残杀了。传说,是因为阻拦苏军拆运机器而被苏军杀害的。又有人说,有人听到,他们被杀害的时候曾高喊:“中国人要有良心!”可见杀人的是中国人。有人说,他们是被东北民主联军游击队杀害的。或者说是被“胡子”(土匪)杀害的。莫斯科广播则说是被“反苏的匪徒”所杀。后来又有人说,张莘夫属于国民党内的政学系,是CC派杀害了他们又嫁祸于苏军的。这件事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查清。但苏军声称东北许多重要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所谓的“战利品”,大量拆走,确是事实。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激起盟国一致抗议和世界舆论严厉谴责。苏军中的一些士兵在东北强奸妇女的恶行,也时有所闻。还有苏军在东北大量使用“军用票”换取民间物资,无异掠夺。这些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权益和感情,难免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强烈的反应。

苏联本来定于1945年12月3日从东北撤军。蒋介石怕苏军撤走以后,他们的军队来不及运到东北,留下空隙,便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大城市,因此要求苏军延期到1946年1月初撤离;随后,由于运兵不顺利,又要求苏军延期到2月初撤离。实际上,苏军未按原定期限撤离,也有

他们自己的打算,因为想要搬走的机器设备还没有搬完,拆运一直到这年3月苏军开始大批撤离的时候为止,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拆得几乎无可再拆了。

那时候,人们难免联想到,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曾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宣言。不但宣布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敌对行动时另一方应遵守中立(等于宣称苏联不支持中国抗日),更令人气愤的是公然宣称:“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声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后,斯大林不但亲自为日本首相送行到火车站,还破例与日本外相共同坐了一段火车,表现得亲密得很。《苏日中立条约》公布的时候,中国许多著名人士,包括救国会七君子,就曾写公开信给斯大林,表示强烈抗议。1945年2月间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美英首脑要求苏方立即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对日宣战。迟至4月5日,苏联才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7月26日中美



毛泽东发表声明,致电斯大林将全力配合红军作战

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半个月,8月8日,苏联才对日宣战。中国人民对苏联这些并不友好的往事,憋在心中的愤懑,到1946年2月不由得一齐爆发出来。

那时候,蒋介石仍然力求用中苏条约阻止苏军帮助中共军队,当然不能发动反苏也不支持反苏。2月间重庆青年学生反苏游行即将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在杭州,曾电令重庆当局设法制止。但国民党内对支持政协的和主持外交的宋子文、王世杰、孙科、邵力子等不满的极端反动势力(主要是CC系、主战军人集团、三青团头头),却认为群众的反苏游行是可以利用来向民主力量反攻,借以引起纷争,以便推翻政协决议的一个好时机。他们不但不制止,还在火上加油。

爱国的青年学生为挽回国家主权呐喊

2月中旬,重庆的一些东北同乡就上街游行,向政府和外交部请愿,要求挽回主权,保护东北人民的权益。各家报纸上,东北问题一时成为热点。2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和助教会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个文件:《致苏联政府电》、《致英美苏政府电》、《上国民政府书》、《为东北事件告各党派书》。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很多同学出于爱国热情,主张游行示威。三青团里的反动分子也乘此机会活跃起来,把民主力量与苏联拉扯在一起,借此攻击民主力量,破坏政协决议。他们想要混水摸鱼,也鼓动上街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们作了一番讨论。他们按照自己一向接受的片面的宣传,认为苏联既然代表着进步民主力量,就不会做出对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对于反苏是极不赞成的。可是,云遮雾罩,情况不明,不知道怎样向同学们解释,觉得很被动。另一方面,自以为进步力量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在系科代表中占多数,就认为在中大搞不起来反苏游行。

两次系科代表大会都否决了反苏游行的建议。爱国热情高涨的同学们罢免了一些不赞成游行的系科代表,在又一次系科代表大会上,终于通过了到重庆市内游行的决议。

21日晚上,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到中大,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对他说,进步同学都不准备参加游行。朱语今也同意。他回到红岩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个情况,王若飞说:“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进步同学都不去,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以免陷于孤立境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去了还可以观察,区别谁是真正爱国,谁是别有用心。”朱语今连夜又赶到沙坪坝,把这个意见告诉新青社核心成员。转这个弯子可费了点劲,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坚持不去游行的人们说服了。

2月22日,由中央大学学生带头,沙磁区万余学生列队到重庆街头游行,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霸权主义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二二二”大游行。

游行队伍中有大幅漫画,画了一条大蛇,头是斯大林,蛇身盘在东北地图上,标题大字是《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宣言》、《告世界人士书》、《对苏联抗议书》等文告,呼喊“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反对苏联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国主义”,“苏联应切实实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不能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同时,反动分子夹杂进去一些反共反民主的口号。

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游行主席团领头的大队已经过去,落在后头的队伍已经是稀稀拉拉的了。这时候,反动派预先在附近埋伏的一群特务分子一涌而出,捣毁了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当时,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坐着汽车跟在游行队伍之后,停在民生路,显然是在暗中指挥。一群暴徒窜进《新华日报》营业部,发挥打砸抢的本领,从一楼打到四楼,砸毁门窗桌椅,杯碗炉灶,撕毁书籍报纸,累积盈尺。他们还把这些毁坏的东西扔出门窗,铺满一段大街。来不及疏散的人员横遭凶殴,身负重伤。相距不远,民主同盟的刚刚发刊22天的《民主报》报社,门面也被捣毁。当这些特务分子行凶的时候,学生游行队伍已经自行解散。

事件发生的当天,中共代表团就此事写信给蒋介石,述说了特务暴行经过和《新华日报》设

施被毁坏、人员被殴伤的情况,然后指出: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校场口血案未了,继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部一部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之阴谋活动。最后,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组织,道歉并赔偿损失,保证此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当天晚上9时半,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明。他说:“这次有组织的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显然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希望相违背。把战场上的挑衅移到陪都城市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他在声明中提出三个“分开”:第一,应该把爱国和排外分开。对于爱国,求民族独立,我们坚决赞成、拥护。但不能引导排外,因为今天要国际合作。第二,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的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第三个区别,我们还懂得,这个阴谋也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想挑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愤怒,好造成更大事件,来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还指出:捣毁新华日报事件和校场口等事件,都是一个来源。“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和负责的态度。这件事情,是在考验政府有无决心与各党派合作,有无决心负责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有无决心使中国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我们对此事件要求政府负责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的民主秩序。”

次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和他给蒋介石的信,并且对这次学生游行作了正面报道。大标题是:《沙磁区万余学生昨日举行游行》,副标题是:《特务暴徒趁机捣毁本报及捣乱民主报》。文中详细记述了学生游行经过的路线,以及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宣言》等文稿的情况,记述了游行的学生们喊的一些爱国口号。当然,也述说了“游行队伍经过本报门市部以后”暴徒捣毁门市部的情况。在同一版上,还刊登了游行主席团的负责声明,说明《新华日报》被捣毁,是在游行队伍离开20分钟以后。《新华日

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分子有计划的蓄意和阴谋。”坚决要求政府当局:1,立即采取坚决步骤,制裁反动阴谋分子,解散特务组织。2,严惩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之肇事祸首,赔偿一切损失。3,政府及地方的治安机关保证陪都治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同一天,《大公报》也报道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并发表社评,措辞谨慎地说:游行的学生爱国热情昂扬是好现象,也是很理智的;有些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暴行,则是不理智的。

同一天,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政协以后发生一系列暴行,校场口等事件的祸首尚未惩办,《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所办的《民主报》又被暴徒捣毁,“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他要求严惩校场口血案及捣毁两报的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在广大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让重庆地方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到4月5日宣判,把凶犯一千人判处有期徒刑。自然,对幕后策划主使者则未予追究。

进步青年学生的尴尬和检讨

复旦大学校园里和夏坝上的茶馆里,平日熙熙攘攘,22日那一天,冷冷清清。当时全校两千来人,没有去参加游行的大约只有二百来人。这二百来个同学,一时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由于距离红岩较远,复旦新青社核心成员未能及时知道南方局领导人提出的应该参加游行的意见。他们只是按照自己从某些书本上得来的成见,认为对苏联的一切都不应反对。结果,使自己相当尴尬。本来和同学们的关系相当融洽的,这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回到学校,都板着脸不搭理没有参加游行的同学。没有参加游行的顿时陷于苦恼之中,不知道怎样才好。

当东北问题引起反苏游行时,进步青年学生大都一时不知所措,不能像周恩来、王若飞那样认识和对待,以致处于相当孤立的境遇,相

当被动。这是为什么？他们之中一些人在苦涩中做过一些反思，可是总觉得不明不白。

3月初，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等一伙人，在当时到重庆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帮助下，做过一次检讨。他们当时认为，这当然有形势变化的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检查，是自己“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间同学”。更重要的是，“没有及时把爱国主义旗帜举起来”。冯文彬对他们说：中国学生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一切有爱国心的青年团结起来。

当时的检讨还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未能认识到，苦涩的孤立，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在理论思维方面，深深地陷入了苏式教条主义的泥潭；对现实的苏联的认识，有极大的盲目性。当时进步青年阅读的一些所谓进步的理论书籍和介绍苏联的读物，与其说是提供了科学的原理和实际的知识，不如说只是传播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他们毫无疑问地而且十分乐意地全部接受了，只因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现实太黑暗了，周围的空气太令人窒息了，而这些读物，为他们描绘了一幅他们向往的未来世界的图画，适合于他们改造现实的渴望。他们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圭臬。既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第一阶段”，这“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的新社会，当然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在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圣地”，人民幸福，一片光明。他们深信苏联歌曲中所歌颂的：“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有一个实例：那时候，成都一些进步青年曾找一些中间同学谈心，解释，说服，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反苏游行，可是收效甚微。这些中间同学几乎对进步同学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甚至根本不愿意听。当时在华西大学的贾唯英后来回忆：“那时候，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同我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上也倾向我们，参加过一些民主活动。反苏游行前，她却热心地为游行队伍绘制反苏的东北地图。我问她：张莘夫事件你相信是真的吗？她反问：不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是假的？一句话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又问：谁最先帮助我们抗战，不是苏联吗？要不是苏联出兵东北，日本

会这样快就投降吗？她激愤地回答：不管那些，那是过去的事情；今天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反对！我说：所谓侵略究竟是不是事实，你想过没有？她说：报上登了那么多事实，你没有看见吗？我说：看见了，可都是造谣。她说：你怎么能证明都是造谣？反对苏联侵占我国主权的同学这么多，他们都是没有脑子的？——谈不下去了，不欢而散。”

事实说明，当时多数群众参加反苏游行是正义的行动。而反动势力借口东北苏军问题兴风作浪，企图挑起事端，借以破坏政协决议，则是不得人心的。

斯大林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

当初，在1945年8月苏军向东北挺进的同时，中共领导的军队也坚决而迅速地向东北进军，与原先在那里的东北民主联军会合（后来统称东北民主联军），配合苏军，消灭日军和伪满的残余。苏军一度默许中共军队以东北人民自卫军名义占领沈阳，成立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外国通讯社纷纷报道此事，美国就向苏联交涉，指出这违背了美英苏三国的协议。

此后，苏方就宣布把中长路沿线和城市全部交给蒋方行政人员接收，有苏军之处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并表明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协议，不给中共部队任何帮助。甚至宣告：如果中共军队在这些地方不肯撤离，就要动用坦克驱逐。从12月下旬起，国民党行政官员先后接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但苏军不向国民党军队交防。当时苏方认定，他们按照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优越权益”，要靠蒋方保证；他们不愿意在东北发生军事纠纷，不愿因此使美军进入东北。但也不同意蒋介石派过多的军队进入东北。

中共方面当时也接受这样的现实，把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沈阳和其他城市撤出，分散在苏军没有占领的地区。但同时派遣大量干部，包括许多主要领导干部到东北，在没有苏军的地方，在远离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

1946年1月，全国政协会议举行，国共在一

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东北问题成为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坚决不肯与中共谈判东北问题,因为谈判就等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是合法的,苏军就也可以让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任何地方。美国由于有雅尔达协定的约束,不能在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地方进行国共之间的调解。苏联受中苏条约的约束,也不能在国共之间担任调解人。东北陷于僵局。

1946年3月1日到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极端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以CC系为代表的所谓“革新派”,与主战军人集团结合,在会上对国民党代表参与制定的政协决议群起咒骂,直截了当地要求蒋介石“临崖勒马,另行途径”。正是反对政协的这些人,在学生爱国反苏游行中另有所图,并指使特务暴徒打砸抢新华日报馆和民主报社,企图借此破坏政协决议。原先主持政协会议作出决议的蒋介石也反悔了,竟然使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否定政协决议的决议,回到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的老路上。

反苏游行的大规模发生和国民党内的动向,引起了苏方的警惕。特别是蒋介石政府迟迟不愿就东北经济合作与苏方商谈,使苏方认定不可能靠国民党政府保证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这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格局开始形成,苏方认定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绝不能让美国染指。当时,九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占据北平、天津、秦皇岛、青岛等地,美军用飞机、军舰运送54万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华北,3月19日又给国民政府派了军事顾问团,帮助他们发展现代化武装部队,并提供大量军火、装备。这些不能不引起苏联的反应。

苏军驻中国东北总部对反苏游行中喊得很响的“苏军撤出中国去!”的口号作出了回应,2月26日发表从中国撤退的声明,说明国民政府曾两次要求苏军缓撤,而苏军已经重新开始撤离,完成撤退的日期当不迟于驻华美军的撤退日期。

苏军的撤离,给了中共军队以行动的自由。3月间苏军在即将撤离的时候,就建议占领了东北许多农村地区的中共军队可以在南满铁路沿线“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夺取长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当

中共军队向长春进军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又要求苏军缓撤,苏方拒绝了。显然,斯大林把确保雅尔塔协定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优越权益”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中共方面了。

就在学生反苏游行前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会议上多次商讨东北问题。3月27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了停止东北军事冲突的协议。可是,3月末4月初,蒋军不顾在马歇尔斡旋下达成的东北停战协议,继续向中共军队占领的本溪、四平等地大举进攻。

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东北局势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内战状态,再次抗议美国大量输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特别声明东北民主联军有充分权利接收东北主权,接防苏军撤退的城市。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双方为攻防长春在四平街等地进行激战,国民党军队终于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式装备于5月23日夺得长春,28日占领吉林。随着苏军继续撤离,东北民主联军则于4月下旬进占齐齐哈尔、哈尔滨。此后蒋军在东北曾向民主联军举行战略进攻,到1947年4月在东北大体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1948年冬辽沈大战东北全境解放。

斯大林则一直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念念不忘在中国东北攫取“优越权益”。1954年12月,周恩来同即将出使苏联的刘晓谈话,说要在中苏关系上给他交个底。他说,1948年斯大林派人到西柏坡,要求中共“停止内战”。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苏联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意旨随同前往。斯大林总是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我们全国解放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那里耽搁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气,就因为斯大林还是害怕我们触犯雅尔塔协定。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才签订了这个条约。本来规定苏联应在1952年以前撤退驻旅顺口的海军,后来由于朝鲜战争,延期撤退。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到中国来的时候又要求让苏联海军继续留在旅顺港,中国拒绝了。这才最后结束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划(下转27页)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 林 晰

1966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活动。亲历其境，感受真切，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

从1966年开始的这场运动，至今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回忆其中的一些片断并把它真真实实地记录下来，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

我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

运动初期，我曾为这场打着“解放思想”旗号的运动所鼓舞，认为这将让中国人民冲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牢笼，可以使我们的人民和民族思想更为解放和性格更为开朗一些。所以我在“文革”初期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人民日报》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漫天浓雾。竟然找不到党中央的领导了！“上海为何突然向北京发难”等等一系列的不合常规的事情发生了，这使编辑部的同仁闷在葫芦之中。因此，《人民日报》编委会决定派出一个记者组（组长是资深记者顾雷同志，我是记者组五名成员之一），专程去上海摸情况，领导要求我们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千方百计地了解其中的缘由。事实上，上海市委已事先对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封锁措施，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注意，电话也被窃听，结果是一无所获地回到北京。这充分说明，《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为了紧跟“文革”运动的步伐，编辑部的许

多同志被派往全国各地采访，目的是为“文革”煽风，力求“将功赎罪”，我也被派到成都。我到外地这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了。陈伯达带领的工作组（称记者团）在1966年5月下旬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的权，发表了制造全国动乱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卫兵向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大举进攻的消息，从北京吹来的“造反有理”之风，也很快笼罩在古老的蓉城上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这座城市读过小学，成都的一切对我是那般熟悉。那一天，我独自坐在少城公园（后改为人民公园）回忆儿时的往事，而周围开始了异样的动静，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而且议论纷纷……在我回到新华社四川分社招待所的沿路上，发现成群青少年正在用石子儿砸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他们无所顾忌，而且显得有些理直气壮。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造反有理”吧。

第二天，市面上已是一片骚动，更多的年轻人在街头巷尾砸烂店铺的招牌，忙于改变街道的名称，有人追着剪女人的长辫子……一切开始破例行事了，使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的情景，也想起了“天下未乱蜀先难”的古话，让我的思想很不平静。中午，我来到玉龙街上的“陈麻婆豆腐饭庄”，原是想在这里尝尝儿时爱吃的“麻婆豆腐”，却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一场革命的风暴。只见几位工人师傅拿了菜刀，站在有人扶的梯子上刮去“陈麻婆”三个大字；在饭堂里，那些由名人题写的赞扬“陈麻婆豆腐”的匾额和“陈麻婆豆腐简介”牌，被取下来扔在墙角。“有麻婆豆腐吗？”我问。“只有麻辣豆腐，今天改了

名。”一位女服务员回答。事情的缘由是,那天上午饭店职工学习“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有人就提出“陈麻婆是个资本家”,不能要这个招牌了,把它砸了当柴烧。当时也有人不太同意,但在革命的威力下,无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很为这件事所感动,这不就是“破旧立新”吗?及时地在现场赶写了一篇短通讯,题目就叫《麻婆豆腐易名记》,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见报了。我在这篇通讯的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话:“无产阶级的风暴冲击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这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店。”显然,我对这场革命取赞扬、肯定的态度。然而,我那时哪里会知道,正是这场风暴造成了祖国的全面灾难,也毁坏了我的家庭,夺走了我亲爱父亲的生命。

我上了台,又被赶下了台

不久,报社通知我尽快返回北京,因为内部的“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社内运动初期那种恐怖的气氛未曾直接感染过我,那种残酷斗争所谓“走资派”的局面是我回来之后听说的。“当权派”已经一律靠边站,许多人挨了批斗,罚了跪,甚至挨了打。据说副总编辑胡绩伟同志被迫戴上了高帽子游楼,还让他拿着破脸盆敲打,高喊自己是“黑帮分子”、“三反分子”……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同志(即马铁丁,著名的杂文作家)在一次有组织的“牛鬼蛇神”游楼时,被迫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的耳光,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看看并厉声问道:“我是谁?”……在深受人格侮辱的情况下,笑雨同志当夜就跳水自尽了。临死前他还给自己的爱人写了“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的字句。在尊严和侮辱碰撞时,他选择了做人的尊严。

我在运动初期曾谈到过一些相当“左”倾的观点,因为那时我从内心深处是拥护这场革命的。例如,我认为应当尽快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即领导人工资收入不应超过技术工人的两倍;应该尽快在各级官员中推行民主选举制度,等等。这些观点其实都是从书本中来的,也确实是我心中真实的观点。当时我认为有些干

部高高在上,甚至作威作福,听不得不同意见……我很赞成把这些人狠狠地“冲击”一下。正由于我当时的这些堂而皇之的言论和对运动的积极态度,在我从成都回来之后,很快就当选为《人民日报》国内部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同时任党的支部委员和行政领导小组成员,可谓是一身三任了。而当时“文革”小组组长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成为部里的第一把手。我主持会议批判“当权派”,对问题有了决定权。当时最热门的革命行动是“抄家”(抄“当权派”的家),我也卷进去了。我记得由工厂造反派提出要抄聂眉初同志(当时任工商部副主任)的家,并要我也去参加。我虽然内心不很赞成,但已经是身不由己,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去了。我当时确有困惑:这种作法合适吗?所以在人们动手抄聂家的东西时,我只是在一旁观望,也防止有人趁火打劫。一次,批斗安岗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我是主持人,有人要他站在一张软椅子上,低头弯腰交待所谓“罪行”,并有人动手打了他几拳头。安岗同志战战兢兢地站在那软椅子上,身子摇摇晃晃,往日那种领导干部的气势一扫而光了。我虽然很同情他那时的处境(听说他患有高血压症),当时的气氛却不能让我表白态度,我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后来有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以命令的口吻让他从椅子上下来,但一定要老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久而久之,由于我领导斗争不力,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说我过于“软弱”,是“保皇派”,甚至认为是丧失了革命立场。所以在我当权两个多月之后,在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被赶下台来。为此我挨了批,并违心地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所谓“检讨”。

我虽然被赶下了台,还总想把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推上舞台。当其他部门的“造反派”扬言要来国内部夺权时,我就鼓动本部门的“追穷寇”战斗队(成员有黄采忠、尹品端等同志)赶快来夺我的权,并声言你们再不动,我就要“引狼入室”了。这句话后来被认为是我诬蔑造反派的罪行之一。当时的局面真是一片混乱,“你方唱罢我登场”!我确实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这番话,所以真真假假地“检讨”一番也就过去了。但“引狼入室”这句话,竟成了我在

“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一时在报社传开了。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见闻

“文革”中,毛主席一共八次检阅红卫兵,除第一次检阅我在成都之外,其余七次我都参加了采访报道。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规模竟是如此之大——每次号称百万人(其中有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满十岁的青少年);受检阅的人竟是如此激昂——热泪盈眶,高呼万岁;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响彻云霄——整版的长篇通讯和通栏的照片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一切都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我作为党报的记者,每次检阅都登上天安门两侧的检阅台,而且选择站在离城楼最近的位置。有一次,我站在华表旁临时搭起的摄影台,居高临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色海洋”尽收眼底,有如一幅充满革命激情的伟大画卷。正是这一次,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的红卫兵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拼命地向前涌动,将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这时由解放军战士们挤出一条通道,毛主席则平躺在吉普车上,由林彪、周恩来、陈毅等人站在毛主席周围护卫着,车子才徐徐地开上金水桥进入了天安门。我此时站在摄影台上,与躺着的毛主席的眼光正好相遇,这是我距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也是看见毛主席最清楚的一次。那时毛主席的威望是如此之高,对他真是如同神灵一般的崇拜,说人们见到他时热泪盈眶一点也不过分,那时的我也是饱含着两眼的泪花,以那么清晰地见到他为人生的最大光荣。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他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在广场上或东西长安街上整整等待了一个整夜。由于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所以拼命地往前涌动,不少人被挤倒了,受伤了。每次检阅之后,广场上被挤掉的鞋子、帽子成千上万,足足可以堆成一座座小山。如果说,这是有如宗教信仰者对自己信奉的神灵的崇拜,那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们这些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的共产党人,为什么竟会如此狂热?我至今也未能完全说得十分清楚。

每一次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记者们要

连夜赶写第二天见报的长篇通讯。执笔的人也无不对毛主席充满了纯朴的感情,否则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怎么会写得出来呢?这种写作往往是由记者分头写自己采访的片断(每次派出的记者往往是二三十个人,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地点蹲点或流动采访),然后由几个人统一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篇长长的通讯报道,当然制作轰动效应的标题也是很费推敲的。我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位,所以往往要工作到报纸开印后才能去休息。只是在若干年之后,特别是退休之后,回顾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走过了既荒唐又悲惨的历程,才感到自己曾经干过很多愚蠢的事,而当年那种崇拜之情,已经一扫而光了。这大概也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吧。这个过程的变迁,其内涵又是何等的丰富啊!

京郊的一次武斗事件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武斗现象。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就听说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剧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就打死了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成垃圾运走了。由于这是革命的非常时期,我每天都是深夜才从报社返回东四六条宿舍休息,骑车经过王府井、灯市口、东四南北大街,各个路口都有人拿着棍棒守候在那里盘查行人,阴森森的,使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有一天,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鲁瑛通知我,让我尽快去北京卫戍区见傅崇碧司令员,说是京郊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的地富分子杀了五十多名贫下中农,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并要求两家大报派记者同卫戍区的同志一起去查明缘由。我们一行约十余人(就我一人穿便服),分乘两辆吉普车,由摩托车开路直奔出事地点。沿途路过的京郊农村,灯火通明,据说是在批斗地富分子,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

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经过交涉才得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据村干部说,起因是传闻地富分子要暴动,因此对他们先下了手。具体作法是,那天晚上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当时一片惨叫声,不少人死后被发现屁滚尿流,屋子里臭气熏天。我们提出要看看出事现场,回答是尸体已经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了。

当晚回到卫戍区,由我执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立即送交中央,从此之后我未曾听到此事处理的下文。估计这份报告很可能送到了当时中央文革(即“四人帮”)手中,他们对此只会是睁眼闭眼不了了之了。这里需要提及的一个情况是,对这件事情的性质,我同卫戍区那位带队的处长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这种作法至少是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党的政策;而与我们同去的那位年轻记者却说这属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左”得出奇的观点,令我们吃惊。在当时那种变了味的“革命”气氛下,我们未能也未敢同他进行辩论。此人似乎是愤愤地离去,所以只好由我执笔写下了这份调查报告。

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陈伯达在报社搞了一场闹剧

1968年春夏的一个深夜,报社通知国内部在京所有成员紧急集合,原来是陈伯达、姚文元要来亲自审查国内部的阶级队伍。陈伯达开始时认真地对大家说,他同姚文元今天要对每个人进行审查,因为据他说目前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而在国民党手中。真是令人惊讶不已!然后又以近乎开玩笑的口吻开始询问每一位在座的人,在两三个小时里演出了一场闹剧,逗得人们哭笑不得。那一晚上的实况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回忆。这里,我把记得的几个很有趣味的情节记述如后。

——当问及白夜同志,陈伯达说“你为什么要叫白夜这个名字呢?”陈竟自作回答:“啊,你是地主家庭出身,原来是不分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剥削贫雇农呀!”逗得在座的每一位哄堂大笑。

——当问及赵近宇同志解放前是干什么的?赵回答曾经在天津《益世报》工作过。陈伯达毫不负责任地脱口而出:“那是国民党的报纸。你有电台没有?”就因为陈伯达的这句话,在运动中把赵近宇同志当作打入革命队伍的特务审查了若干年,为党作过地下工作的近宇同志长期被关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当问及李成华同志是哪里人,李回答家乡是大连市。陈伯达立即问他:“你的父亲是汉奸吧!”以至当时年龄还不大的李成华同志,在运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

——当问及1945年从西安去延安参加革命的郑启民同志时,陈伯达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延安?你带电台了吗?”这问得好奇奇怪啊!

——当问及崔筱桐同志家庭成分时,崔回答“中农”。陈伯达立即说:“你家庭是富农,为什么说谎?”原来崔筱桐同志家经过土改复查已由富农改为中农,陈伯达竟拿着原有的登记表格发问,不容得人把问题说清楚,好一副横不讲理的样子。

——当问及我的家庭成分时,我回答“高级职员”。陈随口而出:“你的家庭成份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没有说出任何道理来。

——当问及郝浩同志的家庭出身时,郝说她的爸爸在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工作过。陈伯达像发了神经病似的气愤地说:“那还不把我们这些人抓起来去枪毙吗?”“我们没命了……”然后气冲冲地离开座位,同姚文元扬长而去……

总之,这次的审查中,陈伯达、姚文元提出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其中许多是十分荒唐可笑、不合逻辑的,有不少则是带有威胁性的。陈伯达那半真半假的态度,有时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这时姚文元却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以教训的口吻对大家说:“这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政

治,有什么好笑的!”他装腔作势的话使大家的笑声立即一扫而光,在权势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

就是在这样一场类似开玩笑的审查运动中,给人们心头留下了许多阴影,也为以后的运动留了捕风捉影的后患,为一些同志带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苦果”;也正是因为这荒唐的审查,进一步推动了《人民日报》社两派之间的斗争,因为不少人认为陈伯达、姚文元提出的一些问题总会是有根据的,可以成为打击对立面的武器。所以我们说,陈伯达、姚文元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看来一点也不错。

把思想搅糊涂了的教育革命讨论

“四人帮”指责“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贯穿一条黑线,即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70年代初期,由姚文元亲自领导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开辟了三个教育革命讨论的专版:《关于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城市中小学应当如何办》以及《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黄植、林洪、王惠平、崔筱桐以及我被指定为这三个讨论专版的负责人(即主编),参加这几个专版编辑工作的还有其他十几位同志。我们的名单均事先送姚文元处备案。姚文元曾对鲁瑛说:“《人民日报》的其他文章我都可以不看,但这几个讨论专版非看不可。”可见“四人帮”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当时也确实是一块讨论专版只有姚文元签字后方可见报。这是他们有意识地否定和搞乱教育战线,搅乱人们的思想,并以此为口实或突破口,在混水中夺取全国的政权。

《人民日报》当时这几块所谓讨论专版,先后抛出了不少典型事件,以致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搞得云里雾里。我记忆犹新的有这么几件事。

——所谓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表扬了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此文原载《辽宁日报》。《人民日报》未及时转载,是因为我们几个人对这件事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私下议论,被人告到姚文元那里,说我们思想右倾、保守,反对教育革命。1973年3月10日,我们奉命转载了这篇奇文,并奉命写了一个赞扬“白卷英

雄”的编者按语。张铁生一时成为全国“反潮流”的“英雄”。姚文元批示:“要向交白卷的先进青年学习”;王洪文则鼓吹:“要锻炼一批‘反潮流’的干部队伍”;毛远新说得更为明白:“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们要拿这块石头打人了。”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的“黄帅日记摘抄”,也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黄帅是北京海淀区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因为同班主任产生矛盾,有一段造反精神的话记在她的日记之中。迟群、谢静宜等利用她日记中的某些话,有意制造和扩大师生之间的矛盾,大批所谓的师道尊严,在学生中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人民日报》刊登此文之后,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学生反对老师的运动,把刚刚粉碎林彪集团后恢复的教学秩序又打乱了,许多学校的校风、学风荡然无存。我看到一个内部材料中说,“黄帅日记摘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仅北京市在两个月里,学校的玻璃窗被砸碎的有二十多万平方米,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学生反老师的运动。这显然是“四人帮”为夺取政权有意制造的倒行逆施之一例。

——1974年初,为配合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这是“四人帮”利用一位女学生自杀事件,把矛头指向老师的案例。这份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调查报告,后来经过调查证明,许多情节均属有意捏造。这些人的用心真是恶毒之极,也说明“四人帮”为夺取权力不惜玩弄政治权术,制造假的案例,其灵魂深处是何等肮脏。

我是这些报道自始至终的亲身经历者,并参加了制作轰动效应的标题,也参与了撰写评论和编者按语,对这些事情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责任不可避免。当然我们对这些稿件是有过看法的,而且也很不以为然。怎么可以把交白卷的人视作“英雄”人物呢?是非显然是清楚的,但我们毕竟参与了这些制假贩假的活动。作为党报工作者,是党的工具,我们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更无权拒绝发表这些稿件,只不过是在几位信得过的同志中间私下议论一下罢

了。回想这一切扪心自问,我们这些人在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日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难道不正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也具有“两重性”的人格吗?这也许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无可奈何的悲哀啊!

父亲的死是十分悲壮的

1967年秋天,我从贵州采访回北京的途中,到郑州去探望父母亲。当时我很惦记父亲在“文革”中的处境和遭遇。郑州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同样陷于一片恐怖之中。我到郑州那天已经是夜晚了,从车站到绿东村的沿途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不时地还会听到枪声。父母亲见到我当然很高兴,但父亲的脸色显然不同于往日,他正在受到审查。他面临两方面的审查:一是“走资派”的身份,二是由于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身份,一时难以说清楚。也由于他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两派斗争中有意无意地同情了一派,结果遭到另一派无情的批斗,硬说他当年加入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实际上那是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员是双重党籍)因此是“老反革命分子”;还有一顶帽子则是操纵一派斗争另一派的“黑手”。甚至说,他在留学德国期间曾同希特勒在一起照过相,肯定是国民党的一位大官。(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他在柏林机场实习时,从远处见到过希特勒,并偷偷地拍过一些照片)家被“抄”了,连相簿的封面、封底也被撕开来检查,看看有没有“反革命”的证据;住房缩小了,老两口挤在一间小屋里,连走路的地方也没有。母亲谈起这样一些遭遇和变迁,伤心

地落泪了。

父亲这时已近古稀之年,看来他已意识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所以对我说:“谁要想污辱我可不成,顶多一死嘛!”还说“前些时有人就从楼上跳下去了,也很痛快。”这些话浇凉了我的心,强烈地意识到他会在这场运动中出事,心情十分沉重。我劝说他一定要沉住气,尽一切可能把问题说清楚,万万不可冲动行事。事实与我的愿望相反,他是在1968年6月21日清晨从办公楼的五层楼台上跳楼自尽了。后来,他的单位的同志告诉我,他死去的前一天,造反派在礼堂批斗他,有人还动手打了他。他据理力争,结果是批斗升级,相持的局面越来越激烈……回到关押他的地方,他拒不取下挂在胸前的侮辱性牌子,并高喊:“谁给我挂上的,谁给我取下来!”表现了他的英勇抗争。这是一场以他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的誓死抗争。他的死是十分悲壮的,大义凛然,也透露出他胸中无尽的感慨和悲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的,讲义气的,父亲真正做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高尚境界。我从我的父亲身上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把人格尊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整整十年之后,即1978年的冬天,他的所在单位正式为他平反。这是河南省最早平反的案例之一。1979年12月29日《河南日报》刊登了他平反的消息,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论。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留给我的只能是一片凄凉和终身的悲痛。

(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原工商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上接21页)定“右派”的6条标准之一就是“反苏”。1946年曾发表反对“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声明,全国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人士,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划归“右派”,整得很惨。当年参加过反苏游行的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即使得以幸免的,也被认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起初也是被定为“反苏型右派”的,因为他除了老账以外,1956年还应《旅行家》杂志社长、原《大公报》记者彭子冈约稿,写了一篇《旅

顺小记》发表了。其中提及:看到1904年日俄两军激烈斗争的堡垒,想到沙俄固然失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也未能幸免。“殷红的鸡冠山石,像火似地点燃着侵略者的血迹。”批判者说这是含沙射影,讽刺苏联。这就成为“反苏”的新罪证。毛泽东保护他“过关”,他才得以免于劫。“反苏”这个型号的右派帽子不能空放着,只是给一些小人物戴上不足以显示警戒力量,后来落到了龙云头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要给梁湘一个评价

——《梁湘传奇》序

● 于光远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组织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支持的结果。在此浪潮里,先后涌现了一批闯将,冲锋陷阵、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其中有老干部,有年轻人,有专家学者,有普通工农兵,凝结为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曾经在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担任主要领导的梁湘同志,就是极其出色的一员。睹物思人,大家至今还是深情地怀念着他,常常讲述他的故事,描述他的音容。

闻声同志写的这本《梁湘传奇》,真实而简明地记述了梁湘的经历和生平,适应了关心我国改革开放的读者们的需求,也为改革开放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宝贵的信息。

梁湘是广东省开平县人,生于上个世纪初10年代。不到19岁,他就离开家乡,奔赴延安。

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后,1936年大学毕业,曾南下广州开展青年工作。1938年我再次到广州,在中共广东省委工作。当时梁湘同志在广州负责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但是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后来我到了延安。在延安我与梁湘第一次见面,我们还曾经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

他离开延安后北战南征,出生入死,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至南下,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担任领导。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揭开帷幕,全国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一场大胆的探索开始了。闻鼙鼓而思将帅,梁湘被派到深圳工作,乃广东省第一书记任仲夷和省长刘田夫力荐,得到中央批准的。他们两位领导感到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梁湘,北战



于光远

南征,解放后兢兢业业,先后在辽宁、广州从事经济建设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经济工作经验,为人正直、廉洁、负责、敢干。果然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率领干部和群众,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子,在这荒芜的小镇艰苦奋斗,惨淡经营,很快就以“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著称中国,驰名于世界。

深圳不仅处于开放前沿,也是改革的试验地。

梁湘来到这里的短短几年,在搞“七平一通”和大量招商引资,开展“三来一补”的同时,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先行一步模式,连创多个

“全国第一”；如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取消购物票证和粮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开放；实行劳动合同制和结构工资制；引进外资银行和建立地方金融机构；筹措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精简政府机构和建立行业协会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现在看，这些多已通行全国；而当时策划和实施，要有很大的胆和识才行。正是解放了生产力，深圳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跃居全国之首，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很早突破了小康和初步现代化的指标，在全国起到了领军作用。但是，新生事物往往不容易为某些人所接受，在赞扬声中，也有质疑和抨击，直到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肯定其经验成功，才取得全民共识。

离开延安后，我们各奔东西，一直没有再见面。直至他主持深圳工作后，我们才多次见面。

1982年梁湘在弟弟梁文森陪同下，趁来京开会之际，到我家登门造访，专门向我征询有关特区建设和开放改革的大计。以后我去深圳又同他面谈，深入探索过。深感梁湘同志富有创新、敢闯的“开荒牛”精神。由于他的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当时就已非常明确，从而在他的领导下，使深圳高速发

展，业绩辉煌。

在成立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时，梁湘又负重担。他续有新的开拓，如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吸取一个青年干部廖逊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作为建设海南的指导思想，并在洋浦试行“土地批租”。后者，又遭到过责难，最后得到了推广。遗憾的是他未能毕其功，而在一场风波后，受到不公正的处理。之后，他郁郁不欢，患重病在家。我曾经在他养病期间，去寓所探望他，听他倾诉，了解到他抱恨终生。

历史是人民写的。梁湘不幸去世，光泽未减。最近，国内外一些报刊连续发表关于梁湘的事迹和思想。人们来到深圳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型大城市，看到深圳的变化及有关怀念梁湘的文章，有的同志提出“重评梁湘”，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本《传奇》，迟至今天才问世，也能对我们感情上有所弥补，讲文字，本书不一定完美。讲史料，本书出于第一手，是珍贵的。据悉，还有几部有关梁湘的传记在撰写中，准备中，我期待着，乐观其成！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34页）走时，身子已十分虚弱，脸上还留有青紫色血淤；但他神情自若、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一身正气。他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刚毅、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英雄形象，永难磨灭。

蔑视劝降 牢底坐穿

张要被捕后，人们都担心他很可能被判处极刑。因而在市军管会每次召开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会时，大家都十分紧张地关注着处决名单中是否有他。令人略感宽慰的是，他一直未被列入死榜。莫非他“认罪”了？妥协了？或者是被逼疯了？新一轮的牵挂又涌上人们的心头，但又很快地被否定：“不可能，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会屈服！”

果然，张要在狱中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同志们的疑问。就在他被捕的第二年，军管组和工宣队动员一些人去监狱“做他的工作”，劝他“认罪服法，争取宽大”。这正好说明，黑牢和酷刑也未能使他屈服，张要仍是强者。狱吏和军管当局无奈，

只好动员人去狱中“劝降”。但是张要坦然面对，一言不发，丝毫不为规劝和施压所动。就这样，张要被认定为“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继续在大牢里忍受着法西斯式的折磨，身体几被摧垮；但意志却更加坚强，宁愿把牢底坐穿，决不在原则问题上作任何妥协。

历史是无情的，祸国殃民的“文革”终于从理论到实践被完全否定。全国300万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张要终于从监狱凯旋并获彻底平反。出狱后发表很多评论文章。

以后，我离开了《天津日报》社，随后又去了香港。关山千里，天各一方。但我总认为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不料，张要却于1990年4月辞世，令人悲痛欲绝，悔不该未能当他健在的时候抽时间去看望他。如今，当年的党小组长张琰也已乘风去矣。每当我路过常德道张琰的故居，就想起那次我们三个人的“非常聚会”；而黑夜中张要烟斗里那星星火光，却一直在我的心中闪亮、闪亮，永不熄灭。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的老师何干之

● 宋 涛

何干之同志是我 1939 年在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学习时的老师，也是后来我在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所尊敬与共事的领导。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其学术风格与正直的人品一直影响着我，是我学习的楷模。

记得 1939 年的 4 月份，我由新四军推荐来到陕西旬邑看花宫的陕北公学学习，当时陕北公学的教员当中云集了许多知名人士，其中就有何干之老师。虽然只聆听他一次讲课，但我已经通过他的著作从心中结识了他。1939 年 7 月，中央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工人学校和青年训练班的基础上组建华北联合大学，并准备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办学。8 月，我们华北联大的师生就在罗瑞卿、成仿吾的带领下，渡黄河、过铁路、穿越封锁线，何干之老师也是我们千里小长征中的一员。10 月，我们终于抵达晋察冀边区的根据地河北阜平的城南庄。在城南庄驻扎后，何干之给我们上了第一节课，至今记忆犹新。由于战争，仅上了一课就因敌人的扫荡而被迫打游击了。我清楚地记得，在城南庄的第一节课，是何干之老师讲的中国的社会性质。他首先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问大家，什么是“半”？如何理解这个“半”字？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能回答。何老师向我们解释说，“半”就是过渡的意思，封建不完全了，在向殖民地过渡，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深受外国侵



何干之（1906——1969 年）

略，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及现在我们的国家正遭到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所以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因此我国的社会性质是从半殖民地向殖民地过渡。何老师讲课严谨又风趣，所以，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1940 年春，随着敌人对边区冬季扫荡的结束，我在华北联大的学习生活也结束了，我被分配到边区四中开始了我的从教生涯。1944 年，我们边区中学合并到华北联大，1945 年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大迁到张家口继续办学，成仿吾校长和何干之等从延安陆续回到张家口，从此也就与何干之老师奠定了共事的缘分。1946 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下，华北联大从张家口辗转撤退到冀中束鹿的杜家庄，华北联大恢复了政治学院，院长就是何干之同志，我是他领导的财经系的一名教员和系主任，开始是何干之的领导下，按照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办学。1948 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我们又迁到河北正定，组织上安排胡华与何干之老师二人教党史、我教抗日战争史，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向何干之同志请教和商讨问题，我当时讲义的很多地方都得到了何老师的指导。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胡华住在前院，我在中间，何干之住在后院。我们三个一起在华北大学分区队讲大课时的场景也历历在目。

华北大学进入北京之后不久，更名成立中国

人民大学，何干之同志任新成立的党史系系主任，肩负起培养党史教师和编写中国革命史教材的重任。1953年，何干之老师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一书，一经出版，就被高教部定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教材，广泛发行。可以说，何干之对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建设 and 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50年代，社会上反右派、反右倾等一些运动不断，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也不平静。正值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候，我1958年下放河北安国任县委副书记进行调研，我亲眼看到了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的种种场面，让我感到，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实实在在的大破坏。我看了后心里很是不安，回来后我就分别给河北省委和国务院写了信，学校的李培之同志带我到中南海总理住处，当面向周总理作了汇报。结果1959年春，我正在东北出差的途中就被电报催着回校了。回来后，就有人通知我，犯错误了，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接着就是停职和一连串的批斗，就在我被关押、遭受批斗压力最重的时候，何干之同志特地去看我，一见到我，没说几句话，我就哭了，他也哭了。我说，干之同志，你是我的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同情，我认为我无愧于组织，无愧于人民。听了我的话，何干之同志更是趴在桌子上哭个不停，哭得很厉害，口中喃喃道，你不反党，你不反党……老师信任的话语，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让我愈加珍惜与何干之同志的师生情谊和同志之间的友谊。

文革时期，我与何干之老师的遭遇一样，一开始就被打倒，一起被“勒令”每天到教学大楼去扫厕所。我们常悄悄地凑到一起议论形势，记得我们曾书生气十足地讨论什么是“走资派”，谁够得上条件。干之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系主任，算不上当权派，更算不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也赞同他的观点。“文革”中期，我们又常在一起劳动。一次在大操场拔草、刨地，干之同志

这时已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烈日当头，他一下子晕倒了，我在他身边，一把抱住他，火速给他服下口袋里的硝酸甘油，和胡华一道把他送回家去。据胡华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晕倒了。就这样，何干之同志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押、批斗、强迫劳动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不能泯灭的是他心中的凛然正气和对从事事业的热爱。1969年11月，我是第一批到江西余江下放劳动的。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何干之不幸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地哭了。1972年返校后，由于学校解散，也未能去看他的家属，很是遗憾。

这个遗憾后来得到了一些安慰，1973年1月15日，我特地找到干之老师的夫人刘炼同志，要她带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干之同志。这时天空尚未晴朗，我站在他的骨灰盒前，百感交集、泪如泉涌，喃喃地说：“干之同志，我来看您了，我来晚了。……”我相信他会听到的。

2006年5月是何干之同志诞辰百年，仅以此文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65年在吴玉章校长家中合影 前排左起 何干之、吴玉章、李逸三，后排右起宋涛、张腾霄

张要在文革中坚持为刘少奇、万晓塘说好话

● 方凌

不幸早逝的《天津日报》资深老编辑张要同志,在残酷的“文革”浩劫中,特别是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置于死地的大帽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他永远清除出党之后,仍大义凛然地公开宣称“刘少奇是革命的”,已被整倒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虽身临大狱、受尽折磨而不改初衷。如此高风亮节的新闻战线忠诚的共产党员,试问天津有几人?全国又有几人?

张要,不愧是一个“大写”的人。

独立思考 决不盲从

在《天津日报》,我和张要同志在时事部(“文革”中改名编报组)工作,同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当时我和党小组长张璉编要闻,张要和汪诚彪编地方新闻版。每到安排版面时,他总会过来问我:“一版有转文没有?多少字?”由于一版要闻变化较多,还常因新华社突然在截稿后又发来要闻而不得不“唱倒板(倒版)”,重新调整版面,牵连到二版的安排,转文较多,所以他常戏称我是“扩张主义者”、“大地主”。但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主动配合,慷慨“割地”。有时他收到地方新闻稿认为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主动推荐给一版,特别尊重记者的劳动。

从河南到云南,从西南联大到北大,如火如荼的地下斗争锻炼了张要的坚强意志;而那些曲折坎坷的蹉跎岁月,更磨砺他铁骨铮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不正常的民主生活和不公正的对待,却使他更学会了冷静的独立思考,宁可

保持沉默也决不趋炎附势。因此他总是叼着烟斗独坐沉思;透过烟斗里升起的缕缕烟雾,看到他那眯着的双眼,你可能以为他在打盹;但当你走过他身旁时,他会猛地拍一下写字台上的某一篇文章把你叫住:“喂,你看过这篇文章吗?这个论点行吗?”话虽不多,语不惊人,但却发人深思,擦亮眼睛。所以当“文革”的狂飚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他不但未被邪恶压倒,反而变得更加坚持原则,决不盲从。

真心似火 真情难得

“文革”一开始,我就受到围攻,成为报社首批被点名的人物之一,办公室门口的满墙大字报说我是个“漏网右派”、“美帝‘情报局长’”,停止了我的编辑工作,没有人再敢接近我。

有一次,张要与我在厕所相遇。他面壁而立,眼睛盯着门口,就像对别人说话似的,用只能让我一个人勉强听到的微声悄悄地说:“小伙子,稳住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些有了组织结论的事实,不是几张大字报一起哄就能随便推倒的。你首先应该对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说完转头就走。在那浊浪滔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刻,这样的同志是多么难得!他那番话,语短情长,对我来说比金子还珍贵,使我终生难忘。

在整个“文革”中,张要未写过一张大字报,并谢绝邀请在任何一份大字报上签名;更不在任何赶浪头的“大批判”会上发言,决不对受诬陷的同志落井下石。党组织瘫痪了,报社从党委、支部到小组都被迫停止了组织活动,但张要却要求党小组长张璉坚持每星期五照常召开小组生活会,

沉着应变 密商对策

而且十分固执地要向党小组汇报思想。急得张琰说：“现在市委都瘫痪了，报社党委书记、总编都进了‘牛棚’，你向我汇报，我向谁汇报？”张要却反问道：“按你这种说法，解放前的地下斗争就不用搞了？”这句话把张琰吓了一跳，连忙阻止道：“你可别乱说呀！这话要让他们（造反派）听见那还了得！现在党小组的人已经分成两派，小组会怎么开？你要在小组会上汇报这样的思想，不是自找倒霉吗？”

组织观念 临危更坚

张要按了按烟斗里的烟丝，使劲吸了两口，烟丝的火光映红着他那张清瘦的脸，激动地说：“那又能怎么样？开不了小组会，我也得单独向你汇报。我不信我们的党就会这样被人一冲就散了！”他显然是愤慨了，使劲地磕打着烟斗，拂袖而去。

这是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派夺了《天津日报》社的权，把我们这些“对立面”和“有问题”的人逐出编辑部之后发生的事。当时大家对“文革”把局面搞成这个样子很不理解，前景如何更难预测，人人心中无底，思想上十分苦闷。张要坚持要过组织生活，张琰颇感棘手，便找我商量。当时经过反对“资反路线”，我虽已被宣告“解放”，但混乱的局面仍使我毫无安全感，不得不更加谨小慎微。我虽同意张琰的意见，但却无法说服张要。

张要是说到做到。从那以后，他真的每星期五晚上七点准时到张琰家去向他汇报思想。说完就走，杯茶不扰。张琰怕出问题，但又不能闭门不纳，于是一度到我家去“避难”。但张要仍坚持准时前来，风雪无阻。张琰不在，他就坐到门外石阶上等候，直到平时小组会该散会时才离开。

有一次，张琰约我去看看这番情景。我们隐藏在常德道离张琰家不远的的一个门洞里，透过苍茫夜色只见张要独坐在张家门口冰冷的石阶上，双臂抱膝在抽烟，烟斗里的火光像星星在一闪一闪地眨眼，于黑暗中特别醒目。我真想给他送一杯热茶来，但张琰和我相对无语。当我们目送着他步履蹒跚地消失在寒夜中时，伤感和激愤一起涌上心头。慨叹时耶命耶，竟如此折磨着人！

夺权之争引发形势剧变。报社造反派夺了编委会和行政大权之后，内部发生了权力再分配的矛盾。而社会上各个山头的造反派冲进报社又夺了本社造反派的权，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一起爆发，以至引发武斗，使局面混乱得无法收拾。于是，天津警备区奉命连夜派人员维持秩序，接着天津驻军也派人进驻，成立军管组，宣布《天津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一切权力归军管，要求报社员工尽快报到上班，以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但是报社造反派认为军管是夺了他们的权，要求军管承认他们夺权后的“合法”地位，还权给造反派；否则不与合作。但军管组拒绝接受这个条件，造反派便拒绝上班，僵持的局面绷得很紧。

要出报首先得有编辑，而当时管编报的时事部已溃不成军。部主任鲁思被关进“牛棚”，副主任和几位分管版面的编辑也离岗造反去了；我们这些被夺了权，靠边站的编辑还在外面“漂着”。但保证报纸正常出版是个硬任务，造反派既不合作，军管组只好启用我们几个“保”字号的编辑，但宣布我们是“暂时留用”，并要我们选出一个临时负责人。可是谁也不愿意在那个时候当这个“官”。军管组一看选举不成，竟鬼使神差般地指定我为临时负责人，并宣布将时事部改名为编报组。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军管组终于正式表态支持报社造反派。于是张琰就此宣布“转变立场”，离开了编报组。张要提醒我做好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准备。但是张琰并没有“出卖”我们，而造反派却加大了对我们的压力，外部各派势力的干扰也日益频繁，使我们面临无法应付的困难。与此同时，有人来动员我“起义”参加造反组织，并指出这是我“唯一出路”。张要问我的想法，我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一生一世只能忠于党组织。”张要斩钉截铁般地说：“那好，咱们还一块儿干！”

军管组虽然表态支持了报社造反派，由于不可能向造反派移交已接管的权力，不但没有彻底改善同造反派的关系，反而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化，与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由于社会上造反派的强烈冲击，迫使报纸停

刊;工宣队就此进驻报社。

不怕围攻 坦诚直言

工宣队在报社与军管组联合掌权后,左上加左,提出要通过学《毛著》讲用会来推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潜藏在报社内部的“阶级敌人”;实际上这是一次人人过关的大清洗。报纸复刊后,首先清理了编报组的“留用人员”。我被首当其冲地送进了第八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组编报组时,张璜也被排除在外靠边站。只剩下张要一个人还在造反派编辑的包围中苦苦支撑。

“讲用会”在雷厉风行地进行着。人们争先恐后地“斗私批修”、议怪事、揭发检举,乱箭齐发的大字报如火如荼,其狂热超过“资反路线”时期,真可谓“形势大好”。编辑部所有的人都讲用完了,就剩下张要一人仍在保持沉默。于是很自然地被当局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列为攻坚重点。

编报组的“讲用会”终于拉开阵势,工宣队和军管组调来他们最信得过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软硬兼施地对张要展开了攻势。胸怀坦荡的张要却以挑战者的姿态,理直气壮地谈了自己对“文革”运动的看法。从党史和党的组织原则的高度阐述了对一些事态的不同意见;实际上也就是两句话:“刘少奇同志是革命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同志也是革命的”。

顿时,这两句话就像两颗重磅炸弹,投进了工宣队和军管当局的总部,其冲击波直接震撼了市革委。当局下令一定要想办法让张要继续交代,运用“引蛇出洞”等老招儿“诱敌深入”。但张要在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后,再次保持沉默。

酷刑拷打 忠贞不屈

够了,在那个时代,这两句话就足够置人于死地了。于是他立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逐出编辑部送进“牛棚”,接着抄了他的家。在撬开他的办公桌抽屉时,发现日记本上放着一朵悼念万晓塘被迫害致死的白花。日记中写着深情的哀思之词;从而成了当时全市独一无二的“现行反革命”大案。

接踵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连续批斗,并把他

编辑石坚和党委书记林锋拉出来陪斗。张要的身体本来就很瘦弱,当他被挂上沉重的“现行反革命”黑板牌子,反拧双臂用“喷气式”押上场时,已踉踉跄跄地难以站立。一轮批斗后问他:“说!刘少奇、万晓塘到底是什么人?”

“是革命的!”张要坚定地回答。

于是又招来一阵野蛮的毒打。有个“激起无比革命义愤”的打手,竟冲上来从张要的后腰提起他的皮带,将他的身子折成“人”字形离开地面,然后来个“扫膛腿”,将他重重地摔出去。但当他吃力地爬起来站定后,还是那句话:“刘少奇是革命的,万晓塘也是革命的!”他被还押到“牛棚”时,一进门就找“同监犯”石坚同志汇报思想。“牛棚”看守发现后又找来打手将他拉到院子里拳打脚踢,揍得他鼻青脸肿。但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张要坚持《党章》赋予党员可以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使军管组和工宣队感到在报社这个“知识分子成堆”和“老党员、老家伙(老干部)比较集中”的地方,面对张要这样的问题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先让群众“打着瞧”。

从容入狱 大义凛然

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表忠心的时机终于来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刘少奇“永远清除出党”,并发出红头文件,正式公布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正式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军管组、工宣队精神抖擞,立即下手,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对张要进行最残酷的批斗,却不料张要仍坚持“刘少奇是革命的,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并认为“现在把刘少奇同志抛出来,只不过是运动需要一个这样的靶子……”

军管当局不敢让张要公开申辩,以防扩散,匆匆宣布他是“死硬到底、顽抗到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于是我们的党用来对付敌人的手铐,竟无情地紧紧铐住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自己儿女的双手!

张要在武装人员押解下被拉(下转29页)

胡耀邦在川北指导我们办案

● 杨宗贤

1950年我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川北法院工作。刚到川北法院,胡耀邦主任就派彭秘书长来法院欢迎我们,并征求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因为看到法院的同志都穿着灰色制服办案,我们一群学生穿着长袍大褂,不像革命同志,更不像“法官”,大家提出了发给制服的唯一要求。第三天胡主任就来给我们作报告,他首先说明,行署的“服装大楼”因匪特纵火被烧毁,“干部服装”很困难,但正在想法给每个人发一件衣服和帽子。大家高兴得拍手称快,不久我们就穿上了发给的服装。服装事虽小,难度可知,在我心中分量不轻,我们终于参加革命了,一种被承认和尊重的感觉油然而生。

胡主任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的大干部,看到他办事认真,说到做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对共产党政府的认识。他知道我们刚从学校毕业都有大学文凭,他说:在实际工作中你们的文凭只能作参考。当时我们都想不通,认为千辛万苦,读了多年

书,好不容易拿到的文凭,怎么会只能作参考。胡主任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他用自己来作比较,他说:“我从抗大毕业,分配到前线,在工作上碰到许

多问题,所以我说毕业文凭,只能作参考,这话对不对,你们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继后我到苍溪县法院工作,最初一段时



胡耀邦在川北行署接见藏族劳动模范(1951年)

间,不会问案,不会搞调查,不会写判决书。有时碰到当事人的指责辱骂,更是受不了。在心情十分苦闷中,想到胡主任说的:“青年知识分子,刚参加工作,常常具有两重性,最初表现在心高气傲,看不起别人文化低,自己是大学生了不起,结果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几下‘钉子’,态度就180度的转变,情绪低落,甚至想离开革命,这是十分错误的。革命必须坚持到底,有问题,有困难,要诚心诚意地向别人请教。内心苦闷,思想不通,要找组织,找领导多谈心。要敢于暴露思想,说真话。”经过这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和工作上的锻炼,我才在实践中逐步学习到一些真知,适应了工作,也理解了耀邦主任所说文凭只能作参考的深刻含义。

1951年2月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前一时期剿匪反特斗争的继续。川北法院开会,会上胡主任针对近一段时间有杀人渐多的倾向严肃指出:“不杀不行,多杀不利。”也就是说“可以不杀,以不杀为有利,可以不杀而杀,对我们没利。”“要从人民的最大最长远利益而镇反。在政策上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分反革命分子与一般坏分子和违法分子。”并举例说明。他要我们必须准确掌握政策界限,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叮嘱我们要与县领导密切配合,务求不错捉和错办一人。此后他还亲自规定了对于镇反的批捕程序、量刑原则、判决批准权限等,要求法院与地方政府配合,严格

执行。1952年4月川北地区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没有错杀一人。

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是与镇反同时展开的,土改初期许多地主看到自己的财产行将不保,将其分散、倒卖,造成很大损失。土改一开始就针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胡主任领导下,川北区党委作出了《正确开展惩治不法地主斗争的几项决定》,明确指出这场斗争不能单纯从经济上着眼,更要着眼于政治,只惩治违法地主,不惩治守法地主。即使是对违法地主惩罚,也要经法庭判决,赔偿费要留下一定比例,使他们有生活出路。当时有的农民常常到城里抓人,只要是地主都抓,甚至到行署抓人,回到乡村都当做恶霸地主批斗。胡主任严肃指出:“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行署就变成了窝藏地主、恶霸的窝点。”他特别强调:“对历史上虽有罪恶,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力立功的,有的还是头面人物(包括他们的亲属对革命有功的),要保护过关。已移居城里的地主,不允许农民进城抓人,由领导出面调解并对农民进行说服。对于任行署委员或协商委员会委员的则实行硬性保护。”我们法院工作基本是按照胡主任的指示精神配合土改开展的。实践证明,这些做法在当时获得了农民的赞同和认可,从当时和长远来看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

记得在川北法院学习时,我曾办过“婆婆打死儿媳”一

案,当时,我们大家认定应该判处被告死刑,送行署审批。胡主任不同意,叫大家再议,还是一致同意维持原判,再送审。胡主任很快来了,他说:“你们要判‘杀’的理由,主要是这个封建式的‘老婆子’在解放后还敢打死儿媳,为了迅速摧毁封建式的家长统治,需要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判处死刑。反过来我要问大家,中国封建统治的时间有多久?我们打倒封建社会的统治又有多久?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反封建的教育工作做了多少?其深度和广度又做得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拿个70多岁的老太婆开刀示众,是否妥当?在广大群众内心深处,是否真心实意的拥护?所以我考虑不杀为宜。”后来经过上报请示后结案,留下了老太婆一条命。但警示了一大批用封建家长方式对待家人的人,反响很大。有个老大爷说:“我们这些人是死脑筋!打骂儿女是家常便饭!我听了这案的判决,想到我把媳妇打回娘家的错误,如果再不改变,整出事来,恐怕就不能这样宽大处理了!”

我的司法工作是从川北法院开始的,有幸得到胡主任的言传身教,终身受益。几十年来我在办案时都要经过严格的认真调查,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作结论,从未发生错案。

我怀念耀邦同志,他是我一生的好老师。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邓宝珊将军文革蒙难记

● 牛正武

兰州市广武门外有一条僻静小巷,叫广武门后街。在满街平民百姓聚居的众多民居当中,有一处小花园,从外望去,土坯墙灰瓦顶的大门,不显山不露水,与周围的民居一般无二;进得门去,方见里边花木繁盛,曲径通幽,别有一番景致。如若不是文革中红卫兵冲击了花园的主人,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花园。

小花园的主人是被誉为和平将军的邓宝珊,故而人们称此花园为邓家花园。

邓宝珊,1894年出生于甘肃省天水,童年时读过几年私塾,16岁从军赴新疆伊犁,次年即在清朝新军中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伊犁新军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后因起义失败离开新疆辗转返回故里。1914年,前往陕西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讨袁斗争和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917年后,邓宝珊在陕西靖国军先后任营长、团长、前敌总指挥、副总司令。1924年,加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先后出任第二军旅长、师长,参与了联合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有关事宜。1926年后,冯玉祥成立国民联军,邓宝珊被任命为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在中原大战中,参与了冯玉祥、阎锡山讨蒋斗争,险被蒋介石拘捕。“九一八”事变后,邓宝珊复出,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后又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



邓宝珊

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赞同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积极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在张离开西安赴南京、杨处境艰难之际,应杨虎城之邀前往西安,协助杨处理了善后问题。“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团军团长,驻守榆林。他大力协调榆林驻军各方面的力量,使其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一方面在北线抗击华北日军西侵,一方面也从北面保护陕甘宁边区。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对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

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毛泽东对邓宝珊胸怀大义高度赞赏,1944年12月致信邓宝珊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邓宝珊平生对国家、对人民的最大功绩,莫过于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邓宝珊出任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频频往返于北平和解放军平津前线驻地之间,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1月22日正式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北平报纸曾发表文章称赞邓宝珊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努力,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先后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甘肃省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

授予一级解放勋章。邓宝珊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

邓家花园原本不叫邓家花园。原址本为清代兰州先农坛,1922年,为北洋政府甘肃督军的副官韩某购得,辟为私家花园,人称韩副官花园。邓宝珊1932年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后,从韩氏后人手中购得此园,增植花木,整修假山,建为别墅。1941年,兰州遭日本飞机轰炸,邓夫人崔锦琴携子女在躲避中不幸遇难。邓宝珊将爱妻葬于园中,于右任亲临凭吊并手书“慈爱园”,制匾悬挂于园门。花园由此而名“慈爱园”。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人民政府将此园稍作修缮,作为邓宝珊省长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从此人称邓家花园。

还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年迈的省长邓宝珊就已经卧病在家。主持省政府工作的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胡继宗。由于邓家花园处于小街陋巷,周围住户都是平民百姓,不像省委书记们住的“青年农场”、其他省领导和部委厅局级干部住的“宁卧庄”那么赫赫有名,所以少有人知,更少有人注意。当文化大革命气势汹汹来临、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的时候,邓家花园却有点像是世外桃源。身为民主人士的省长邓宝珊竟能置身“世外”,安安静静地在家养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地处大西北的兰州气氛越来越不平静。甘肃省的“文革”形势真可谓波谲云诡,变化莫测。从1966年初到8月份,以第一书记汪锋为首的中共甘肃省委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跟着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步伐走,发动教育、宣传、文化、学术等战线,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各条战线所谓的修正主义,等等;第二阶段,在《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从本省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拿出一些代表人物,发动有关单位和社会进行大批判。从教育界拿出的代表人物,是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6月上旬,甘肃省委派出庞大的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支持造江隆基反的历史系学生李贵子,把江隆基揪出来进行批判斗争。批斗越来越残酷,最后达到了极端。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把江隆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反分子,6月25日在兰州大学大操场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

省委领导亲自出席,要把江隆基揪到会场台上进行批斗彻底打倒。就在大会开始后去江家揪人时,不愿再受屈辱的江隆基在家中自杀了。一生刚正不屈、倍受广大师生爱戴的江隆基就这样含冤自尽。

“文革”运动发展真是具有戏剧性。在中共甘肃省委还要再找典型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以推动文革时,形势发生了省委领导们意想不到的变化。1966年8月下旬,一批声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从北京来到兰州,联络当地造反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了中共甘肃省委。他们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举行大会,把中共省委主要领导推上大会主席台进行了批斗。中共省委领导们被拉下了马,中共省委瘫痪了。

中共甘肃省委领导前大半年在发动领导“文革”,顾不得管在家养病的邓宝珊省长。待他们自己被拉下马后,就自顾无暇了。此时人们还没有注意到邓宝珊。邓宝珊虽然心焦于社会上的动荡局面,但还能平平安安在家养病。不料,到了11月,一场灾难降临了。又是一批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来到兰州,冲进了邓家花园,冲击了邓宝珊。

1966年11月下旬,一天午后,天阴沉沉,风冷飕飕。一个电话打到新华社甘肃分社,说:北京红卫兵冲进邓家花园抄家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同事汪祖高立刻骑车奔往邓家花园。从新华分社到邓家花园骑车不到20分钟,说来可谓“近在咫尺”,以前竟从未到过。如果不是电话中间清了位置,一下子还不好找到呢。那时的邓家花园大门很一般,不像如今重修的门楼高大漂亮。进得大门,前院西厢房门口,坐着几个人,有男有女,像是邓家勤杂人员。他们指着花园后边的平顶洋房,说那便是邓省长的住宅。我们穿过花园小径来到邓宅,踏上月台还未走到门口,从屋里走出一男一女,把我们迎进屋里。在客厅落座后,女的自我介绍说,她是邓宝珊的女儿,叫邓引引,男的是她丈夫,都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我和汪祖高也作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新华社记者。

邓引引告诉我们,抄家的红卫兵午前已经走了。接着,她向我们叙述了红卫兵冲击的情况。她激动地说,父亲早就有病在身,加上“文革”运动来势凶猛,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一直卧病在家。尽

管外面闹得翻天覆地,家里倒还安安静静。想不到今天来了一群北京红卫兵,上午冲进来一直闹到中午才走。他们进得门来不由分说,各房间乱窜乱翻,找到一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佩剑,当成了父亲反动的证据。他们把老人家从床上拉起来,罚他跪在地上,红卫兵拔出剑来架在老人家的脖子上,对他进行批斗。他们声色俱厉地喝问老人家:你是不是反动派?打过红军没有?杀过共产党没有?……

邓引引说到此处,眼泪夺眶

而出,泣不成声。她丈夫接着说,1949年2月,周恩来(左三)和来西柏坡的傅作义(右三)、邓宝珊(右四)等合影



老人家知道这些娃娃不了解历史,不懂得历史,实实在在地向他们承认,当年作为国民党军队将领,确实与共产党打过仗,打死过红军,打死过解放军,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邓宝珊女婿讲到这里,摇摇头不胜感叹地说:这些红卫兵哪里知道,邓宝珊抗日有功,保护陕甘宁边区有功,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有功,是爱国将军、和平将军哪!

邓引引稳住了情绪,接着说:红卫兵像审问犯人一样审问我父亲,对回答不满意,就举起宝剑威胁,抽出皮带威胁。反复折腾够了,才扬长而去。临走,倒也没有抢走多少东西,只拿去了那把宝剑,拿走了一些武侠小说,不过,没想到把我们俩带的手表也摘下拿走了。说到这里,夫妇两人伸出手来,让我们看了看他们的空手腕。

听过了夫妇两人的介绍,我们走到邓宝珊房间门口,轻轻推开门缝看了看。邓引引说,父亲受了惊吓,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现在里间睡觉。我们没有惊动邓宝珊,就告辞了。

离开邓家花园,我们想追踪采访北京红卫兵。我们知道,那时北京红卫兵来到兰州,一般都由兰州军区第二招待所接待。我们骑车出了广武门后街,即直奔兰州军区第二招待所。到了那里,招待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北京红卫兵已经走了,兰州的一批大学生下午来把他们押到火车站,送上东去火车,驱逐出了兰州。工作人员说,这批北京红卫兵很神气的,听说大多来自高干子

弟居多的中学,都是初中生,言谈话语之中可看出,他们的信条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想不到兰州大学生竟然能把他们赶走!我们让工作人员带着看了看北京红卫兵住过的房间,只见人去室空,留下了一些小传单、饼干盒、罐头瓶之类。

我们看时间已经不早,赶快回到分社,将所了解情况写成内参,当晚发给了新华社总社。

两天后我们听说,周总理得知情况后,命人打电话通知尚在主持甘肃省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胡继宗,要他切实保护邓宝珊,保证邓宝珊的安全。几天后我们又听说,周总理已经派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京,安排住进了医院。

两年后的1968年11月,邓宝珊于北京病逝,终年74岁。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新华社发的一条简讯。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邓宝珊将军一生做出了全面的评价。

邓宝珊将军可以瞑目了,邓家花园也旧貌换新颜。1982年,邓宝珊的子女邓惠霖、邓团子、邓引引、邓成城、邓文文商定将花园献给了国家。1985年,甘肃省政府接收后进行了修缮,将花园开设为旅游公园,住宅辟成了邓宝珊纪念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周恩来与定西救灾

● 邓全施

1973年夏天,自然条件恶劣,历史上十年九旱的甘肃省定西地区,已连续22个月未下过透雨了。土地无墒,草木枯焦,禾苗干死,数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和家畜缺饮用水,有不少的人因饥饿、患病而倒下了。周恩来总理得悉真情后,立即展开了救灾大行动……。

笔者当年全程经历了这次救灾。2000年1月15日至16日,又有机会专请宋平同志谈了当年有关情况。现在,我把当年的采访笔记摘抄整理,将这段历史再现出来,以飨读者。

一.宋平发言讲了灾情,总理听了伤心落泪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冼恒汉,带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平,参加了会议。

宋平同志是1970年冬天,从西北局调到甘肃工作的。开始担任省国防工办的副主任,后来到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当副主任,抓工业交通方面工作。

宋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中讲到了甘肃农村情况。说定西地区因连年旱灾,农民缺吃少穿。正在这时,周总理来参加小组会。他让宋平不要停下来,继续讲。

宋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宋平关于甘肃农村的情况发言,当然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总理听了宋平的发言很难过,当时伤心落泪了。他说,我们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老百姓。甘肃农村的这些情况,我们过去不清楚,没有派

人下去调查了解,我们国务院有官僚主义。但你们过去也没有及时汇报呀!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困难都想办法给予帮助,我们自己的人民受灾了我们怎么能不管呢?周总理还询问宋平,有什么办法抗旱和帮助农民增收。听了宋平的一些介绍,周总理还说,可以组织农民搞麦草编织,多织造羊毛地毯出口,还可以学台湾的方式搞来料加工呀。

甘肃省一直“形势大好,农业连年丰收”之类的神话破灭了。甘肃定西地区农民的极端困难被中央知道了,一场大面积的农村严重灾荒才得以救助。

二.定西农村一贫如洗,京官看后无不愕然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从国务院各部门抽调干部,立即奔赴甘肃帮助救灾。

这是个高规格的比较庞大的工作组。国务院工作组组长是林业部部长罗玉川。副组长有商业部副部长刘忍、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宪。工作组里还有大批司局级干部。他们6月下旬到甘肃后,立即分兵几路下乡调查。

组长罗玉川部长一行,由宋平同志陪同。从6月23日至7月5日,先后考察了定西、通渭、陇西、会宁、靖远5个县的一些社队和农户。罗玉川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他是林业专家,一路上都鼓励基层干部和群众要多种植草苜蓿及抗旱耐瘠薄的柠条、酸刺、毛柳等灌木,既能保持水土,又能喂养大家畜,还能逐步解决农民烧柴问题。

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夏公然,带着我和何东君,随行采访。以下就是当年随行笔记的摘要

(为保持历史本来面目,今天只加做标题,不改动原记录的文字)。

1.6月23日晚上,定西地区负责人王化宇全面汇报定西地区基本情况

全地区财政收入(1972年)3610万元,支出6600万元,其中基建投资3260万元,支援农业710万元,文教卫生990万元,行政经费660万元,优抚救济670万元等。

全地区商品零售额1.46亿元,人均购买力63元。1971年发给农民的布票有70%没有买。

王化宇说,定西地区海拔1800—2000米,年降水200多毫米,蒸发量1500多毫米。无霜期110多天。这几年农业学大寨,全地区有3万多人到大寨去过。如学大寨的工分制,收回农民的自留地。临洮县100%地收回了自留地。

居住在干旱山区的有80个公社的115万人,现在有7.8万户49万人、10万头大牲畜、10万头猪和36万只羊,饮水很困难。会宁县在1971年3—4月间,有9000多劳动力专门搞水吃。最远的30来里路担水吃。

王化宇说:定西地区农民除了几颗粮食,再没有什么可以变钱的东西。1972年年终分配平均每人现金收入有25.7元。通渭县人均只有2.8元,临洮县7.95元。农村单一经营,现金收入很少,政府给缺粮户的回销粮指标,他们没有钱买。通渭县什川公社一个队,63户的回销粮有48户无钱买。李家店公社三平大队175户中有48户变卖了家具什物买粮食。会宁县青江公社王湾大队贫农张东立,把屋上的300页瓦卸下来卖了,才买回点粮食。这个队有54人缺衣服,下中农韩三娃的女人,一年四季穿件烂棉衣。

王化宇说,年年又购又销,把农民折腾苦了。今年,有17.8万户、106.58万人吃回销粮,占农业人口一半。已吃了6900万斤,缺口还很大。老百姓没钱,先买回点粮食,拿到市场上高价卖掉,再去买回剩下的回销粮指标。这样,国家给农民一天0.8斤的回销粮指标,他实际上吃不到。粮食不够吃,有的人就外流讨饭。通渭县外流要饭的有3000多人。

2.6月24日,新集公社书记谈“水窖”功能及制作方法

汽车在黄土沟壑间爬上爬下两个多小时,上

午11时到达定西县新集公社。公社书记杨和清汇报。

他说,全社12822人,其中有8000多人及各种牲畜,一遇干旱就缺饮用水。近的10里,远的走30里路搞水吃。这个地方主要靠水窖。全社已有1600个水窖,1972年一年挖了700多个,现在平均每户有1.3个水窖了。每个窖最多可贮水35立方米,按每人一天饮、用水10斤计,一年3600多斤,一个窖贮满水可供一户人用一年。问题是这几年连续旱,窖里没蓄上水。

罗玉川问:水窖是怎么样子的?怎么挖?要多少工日成本?

杨和清回答:水窖选址一般在路边、屋边、禾场边,集雨面积大,便于蓄贮到雨水。下雨时,人人都赶紧跑出去,拿铁锨拦截雨水进入水窖。我们最喜欢过云猛雨,渗不到地皮里去,都汇拢集流到水窖里了。

杨和清说,全社有40%的生产队年终分配没有现金分。20%的农户无钱买布。老实的人布票棉花票全作废了;奸滑点的人就悄悄地拿到县城卖掉,1尺布票也可卖1-2角钱,买回点盐吃。布票棉花票全用完的农户约占30%。全社一半的农户炕上没有垫毡,只垫有芦苇席或竹席。一半多农户虽有垫的毡,但没有盖的被子。

罗玉川、宋平听完汇报后,要杨和清带路就近看看农民家里情况。

3.6月26日李店公社王永祥家使大家落泪,罗玉川、宋平当即决定开仓放粮

上午,到李店公社。1949年17岁参加工作的党委书记常怀志,给地主当过长工。他说,这个公社是由襄南、常河几个公社的边边角角新组建的,今年2月才安家办公。这是全通渭县最干旱,沟深、坡陡、水苦、碱大的穷地方。河沟里有些苦水,吃了肚子疼,拉稀。外地人喝了脸色发青。全社13000多人,60%的人、畜饮水问题没有解决。目前已有800多个水窖,计划再挖1000个,户均1个。公社所在地也没有水,要到10里外挑回甜水来,掺和苦水饮用。有9111人无钱买粮,有的户经常断炊。

罗玉川、宋平听了介绍,立即要去农民家里。常怀志领着大家看了3户人家。

王永祥家

住一孔窑洞，用破烂的牛皮纸水泥袋做的“门”。5口人，2老3少。长子20岁，是家中依靠。王永祥61岁，已10年未干活了，病在炕上。女人51岁，25岁时得了病，右手痛。宋平揭开灶台上的砂锅，用筷子搅动了一下，是很稀的能照见人影的野菜汤糊。炕头上有一小口袋玉米，斜躺在炕上的王永祥有气无力又怯生生地说：要不是咱公社书记好，咱就饿死了。这是刚买回来的16斤粮食，不敢吃哩。我不放在枕头边护着，娃娃就抢吃光了。一顿磨半斤，搅野菜吃。磨多了就吃光了，还有40斤指标没钱打。罗玉川和宋平站着听着，眼里都噙满了泪水，默默地走出了王家。

其它两户情况也是如此。

回到公社会议室，罗玉川和宋平向公社干部和随行的地、县委负责人讲话。他们心情沉重，语调低沉。大家都觉得空气像凝固了。

宋平说：今天看了这个情况，确实看不下去呀！你们在这里工作，心情当然可以想象。你们刚才说这个月中有14户就在今天要断粮。怎么办？现在穿的还是次要的，缺粮断炊是最重要的。反正不能让群众断顿呀！实在不行了，让粮库先提前放粮供应。登记一下，先供应。当然要教育群众节约用粮。

群众缺粮又缺钱。开始是卖猪卖鸡蛋，后来卖布票棉花票，变卖家里一切可以值点钱的东西。现在还有啥可卖的？有啥卖啥，连房顶上的瓦都卖了，以后下雨了怎么办？再不要让卖了。买粮没有钱，先打个借条，将来或贷款或救济。

群众这样困难，你公社还买了他的瓦。他的瓦又不是多余的。你们可能是关心帮助他才买了他的瓦吧？但群众的瓦盖到你公社的房顶上，这行吗？常怀志呀，那些瓦赶快退回去，钱就算救济了吧！

罗玉川说：王永祥这样的农户，粮食能不能就此救济到秋天？一天八两粮要吃够。现在他不让小孩吃，饿坏了怎么办？你们要做好这一户的工作，影响全村。要让大家知道，这里的困难，党中央知道了，党中央关心支持大家的。你们可以给群众讲一讲。

宋平最后又叮嘱：你们迅速救济这些断粮断炊户的粮食。同时帮助农民多种些秋菜，节约用粮。他接着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好在还没有出现

大面积的浮肿和死亡，若再耽误些日子，肯定会有。

大家从会议室出来时，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笑。王化宇立即找地、县委的人布置工作。火辣辣的太阳烤得黄土地发烫，老天爷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路边有几棵柳树枝叶稀疏，没精打采地立在这贫瘠干旱的地方，四周的光秃秃的山岭没有绿色，了无生气。没有鸟飞，没有蝉鸣，没有鸡唱，没有狗吠。穷得没有生气。怪不得清代左宗棠就感叹“陇中苦瘠甲天下”！

（按：2000年9月我又重访了李店公社。王永祥夫妇都去世了，他们的大儿子盖了新房。我正碰上他们在吃中饭，是一盘馒头，但没有任何菜。他们都高兴地对我说：能有这样的白馍馍吃，这日子就好得很了。

4.6月29日晚上陇西县委汇报许多农户没有被子

陇西，渭河上游，陇山之西。当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菜充饥，最后饿死在首阳山。首阳山就在陇西。陇西县城四周有7万多亩川水地，但山岭上的土地也是十分干旱贫瘠的。

县委副书记胥起云汇报说：全县31.9万人，需要追加回销粮129万斤，救济被子2万多床，衣服14万套。柯寨公社八里沟生产队28户，只有19床被子；马河公社罗家山生产队13户人5户没有被子。队长家8口人，只有一串烂棉絮当被盖。

5.6月30日，定西地区粮食局长谈又购又销劳民伤财

下午召开的地区农办、气象局、粮食局等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粮食局长孙兆甲坦率谈到粮食政策问题是：又购又销劳民伤财。

他说，定西地区靠天吃饭，粮食生产很不稳定。近几年人口增长快，粮食没有增长，但粮食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多。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先不管你农民够吃不够吃，先要你给粮站仓库交了粮食再说。有的交了征购粮没过两个月，就缺粮了。于是，又到国家粮库去买回销粮。这样又购又销，粮食驮来驮去，把农民折腾苦了，当然意见大啦！近几年全区吃返销粮的社队农民都在一半以上，有些县如通渭，占八成左右。

罗玉川和宋平问，听说有些地方农民交粮食

还很积极,为什么?

孙兆甲笑着答道:那是因为他交的少,返销的多。他不交一点,怕你不卖给他。再说,为完成征购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又是开会,又是通报进度,今天点名批评这个,明天训斥那个,迫使下边干部谁也不敢怠慢,不购过头粮怎么办?农民也没办法,你要我交我只得交,反正你共产党的政府是不能饿死人的。

6.7月4日国务院赴会宁县工作小组的典型调查使京官刻骨铭心

国务院赴会宁县小组选择了一个好队和一个差队做了典型调查。

好队是河畔公社的上牟生产队。好就好在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这个队有68户441人3084亩地。有73头大牲畜101头猪203只羊。

1972年人均口粮397斤,生产队还有存粮95000多斤,按每人一天一斤安排可以到年底。

1972年平均每人分配现金8.1元,人均欠债4.1元。

有22户58人缺被子27床;8岁的女孩子8名,都没有裤子。

比较差的队是清江公社的后湾生产队。

全队17户99人,有耕地587亩,役畜13头。

1972年人均口粮201斤,根本不够吃。队上有牲畜饲料粮570多斤和油渣,都分给群众吃了。

1972年人均分配现金收入1.74元,人均欠债26元,每个劳动日值0.26元。

全村10岁以下的孩子33人,30人没有裤子。

李多财一家5口三代人,只有一床被子。

祁中海一家7口人,只有4个碗,没有被子。

全村有14户人家卖了布票1046尺。王聚民家卖10丈布票得1.3元,买了回销粮。

这里烧柴十分困难,公

社调运了煤炭进来,煤价降到0.035元/斤,农民还是没钱买。有人一次买了2斤煤,用草帽子兜着拿回家。

汇报者神情凝重,说是许多长年在机关工作的同志来会宁农村看了农民家状况后很难受。都觉得若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相信。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7.7月6日王化宇再次汇报,罗玉川和宋平强调讲真话

罗、宋率工作组到了靖远县,住武装部招待所。王化宇再次汇报,着重在灾情的汇总、需要救济的具体数量和生产救助的具体要求。

他首先是做检讨,说地委工作作风不深入,对这次灾情了解漏洞多,情况不太明;历年吃返销粮在全省比较最多,思想有顾虑,不敢多张口,更不敢要救济款。(宋平插话说,这个问题省上有责任,省上没钱,没有及时帮助。)农村一些方针政策上如收自留地,也影响了农民积极性。

王化宇说,据各县最新报告的统计,夏接秋需要回销粮4733万斤,冬小麦种籽281万斤,救济款326万元。有98359户395540人缺棉衣裤75万件;有95401户361695人缺被子126000床。此外,还缺小农具、大牲畜等生产资料,请中央帮助。

罗玉川首先表态:先把需要救济的钱、粮、衣、被等底数核实清楚。小孩子穿衣问题,比如



2000年定西人吃上了白馒头,但桌子上没有一碗菜(邓全施摄)

15岁以下的孩子,都应当让穿上衣裤。可以在大城市收买旧衣服,或调运解放军仓库的旧军服,发下去。有许多农民家的炕上光光的,不要说被子,连一张炕席都没有,说明穷得很了。这些情况在报告中都要如实写上。还要建议卫生部派医疗队来帮农民治病,提高赤脚医生水平,推动计划生育工作。

宋平接着强调说:要提倡干部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不要像1959、60年那样,搞假报告,对讲真话的人扣帽子。你们地、县委思想上也不要有负担,觉得救济面这样宽,数目这么大。地委和各县委工作都是努力的,对战胜困难也是有信心的。你们要组织干部下去看看群众,帮助群众。要像国务院的同志这样,深入社队农户家中了解实际情况。

(注:根据定西地委的两次汇报和沿途见闻,我们当天晚上写出了定西地区灾情的综合报道。全文近5000字,初稿由我和何东君执笔,夏公然最后修改审定,7月6日发往总社内参编辑室。)

三.南平房会议在如何向中央报告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国务院工作组到甘肃后,是兵分三路下去调查研究的。罗玉川一行走定西地区,水电部王英宪一行去临夏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商业部刘忍一行到庆阳地区的环县。7月10日,三路人马返回兰州,汇集在宁卧庄宾馆南平房会议室开会。

主持会议的罗玉川说:今天的会议三项内容。一是请省上同志介绍全省灾情,二是讨论给国务院的报告怎么写,三是议论一下救济的标准。

甘肃省财办主任翟焕三首先回答了工作组询问的几个主要数据。他说,全省统计,口粮需要8895万斤,种籽1765万斤,共计10660万斤。

王英宪说:甘肃中部干旱山区这个概念,不能说都是灾区。一部分有灾,一部分无灾。但无灾的地方也很困难。比如东乡族自治县去年粮食生产是历史最高水平,但许多小孩子多年来就是没有裤子穿。现在是人吃不饱,牲畜也挨饿,“一根扁担可以挑两个毛驴”也统计在大牲畜数字里,

生产怎么发展起来?周总理提出,半年内解决生活问题,两年半解决生产问题。我感到,粮食问题,衣被问题要解决,更要研究找些什么门路发展多种经营。

刘忍说:给中央的报告要反映灾情,也要反映其他的东西。困难问题,主要是灾,还是工作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这个也要反映。生产落后,我看不完全是灾,还有方针政策问题,多种经营问题,工作问题。

茅林(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说:甘肃这18个干旱山区县,有的是连续几年旱灾,有的是自然条件特别差,有的是工作问题。如单一经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得不好。还有执行政策问题,如又购又销,劳民伤财,是个大问题。

这时,服务员请罗玉川部长去听电话。

罗回到会议室后说,杨立功(林业部副部长)同志告知,中央已开了会,专等调查组的报告了。我看,关于政策问题等,下一步再研究。这个报告围绕生活救济和今冬明春生产自救两个问题来写。

申效曾(省委副秘书长)说:报告中要提到阶级斗争路线教育问题,有6个方面:(一)粮食市场的投机倒把。(二)变相高利贷。(三)大牲畜和羊只分户喂养使集体经济解体。(四)有资本主义倾向,带头闹粮。(五)变相卖青苗。(六)阶级敌人乘机造谣捣乱。以上问题需要重视,专门作为一个问题写上。生产自救也要提出一个方向问题,不能让个人放任自流,变相单干。

王英宪立即接上说:高利贷与互相接济要分清楚,投机倒把与农民卖粮买粮要分开。

罗玉川说:现在提这些问题,弄不好就把群众卡死了。

这时秘书说话了:初步设想报告分四个部分:一,成绩说够;二,灾情说透;三,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四,根本在生产自救。

大家一时无语。时间已是十二点多了,散会吃饭。

四.7月19日宁卧庄会议上出现了“不同调门”

7月13日,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已陆续返回北京。中央救灾的大批粮食、衣被等物资正在调运中。甘肃省为搞好这些工作,接二连三地召开各种会议。

7月19日,省委在宁卧庄礼堂召开中部干旱山区18县及邻近7个县的党委书记共30多人参加的会议。

上午,宋平主持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他说:这个会议题有三,一是生产自救,二是困难救济,三是规划改变面貌。

宋平说,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冼政委反映了中部地区的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周总理几次讲到,很关心。当时只讲到定西情况,他听了很难过。要给予支持、救济、帮助,旧军衣可以给。回来传达会议不几天,中央就派了这么强大的工作组来,下去访贫问苦,了解了很多情况。

宋平说:造成中部地区困难的原因,当然有干旱、灾害,但主要的还要从主观上检查,从我们工作上检查。学大寨运动开展得不够,政策方面有些不落实。同样的困难地方,有些生产队就不错,有些一看就不怎么样。有些政策没解决好,如又购又销的问题,全省13000个生产队(占总数的51%)购了过头粮。其中静宁、通渭等县占80%以上。这个责任主要由省上负。把任务压下去,要人家完成,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不实事求是。

宋平同志就如何搞好救济工作和规划改变面貌谈了5点意见。

下午,宋平同志主持会议,各地县委负责人发言。或汇报灾情,或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或三言两语,或互相插话,比较畅所欲言。宁静县委负责人李佐仓说,解放20多年了,有些农民还是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外流讨饭,为什么?生产队选不出人当队长,轮流当“决算干部”,年终就下台,谁也没信心。榆中县的负责人说,若不是这个会,我们还不讲夏粮减产定局,怕戴帽子挨批呀!会宁县的同志说,又购又销的问题折腾太久太苦了。公购粮任务能不能减免三年,让农民休养生息?这个难题不解决,生活不下去,生产更搞不上去。

下午的发言正热烈进行着,中共甘肃省委第

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冼恒汉,省委书记、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张忠到会了。宋平同志马上请他们讲话。

冼政委说:国务院工作组和省委都有给中央的报告,东西给多少中央定。我们先要有准备工作,思想工作要先做。要教育群众,首先要教育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当干部就是要准备同敌人斗争。

他说:教育农民,单干行不通。我们祖先几千年(单干),翻不了身。不搞集体经济,怎么搞机械化?怎么改土?困难多,党委不能回避。你不领导群众,阶级敌人就会钻空子。对敌人适当时机要打击,对群众要正面教育。

冼政委说:夏粮估产一次比一次少。我看,也不要你多报,但有那么多,少报也不对。说得那么难,看得太严重了,也会动摇我们的信心决心。

接着,张忠司令员讲:国家准备救济许多粮食、钱,使我们很受教育、启发、鼓舞。我补充三点意见。一,要解决救灾经济问题,更重要的要抓上层建筑。要深入开展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不要只见物不见人,只抓物不抓人是不行的。昔阳抗灾,陈永贵有个报告,我们抗旱救灾要以大寨为榜样,扫除悲观失望和沉闷气氛,鼓足干劲。(冼政委:把陈永贵的报告发到公社,那是一个动力嘛!)他说: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1960年是有经验教训的,搞单干,不仅不能解决困难,而且给群众带来了新的困难。困难时期把群众往哪里引?现在有的社队,社员大量外出搞副业,还开介绍信到外面去。这种错误做法应当纠正。……

这两位首长讲话时,会场异常安静。冼政委讲话慢条斯理,声音也不高。但大家感到了很重的分量。他们的话,有些地县委书记是会感到背上出冷汗吧!

五.并非结束语:定西农民幸免于难,总理遗愿有待落实

1973年秋冬,国家救灾的大批粮食和军队后勤仓库拿出来的大批旧军服,源源不断地运到甘肃,逐步分发到灾区农民手中。一时间,定西地区广大干旱山区受灾的农民“吃的是国家粮,穿

的是黄衣裳”,几乎成了一个“复员退伍军人的世界”。农民幸免于难,对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感激涕零。农民们记忆中的灾年,如1929年死人是相当多的。翻开定西各县的县志,大旱大饥,“饿殍载道”“人相食”的记载屡见不鲜。最近的记忆则是1959年至1961年,通渭县非正常减少人口,即死亡和外逃近10万人,其中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70年代初的旱情,比历史上的灾害要大。幸亏中央发现了,救助比较及时,才使受灾农民幸免于难。

周总理当年要求甘肃“半年内解决生活问题,两年半解决生产问题”。灾民生活问题在半年内是基本解决了,但生产问题在两年半是没法解决的。冼恒汉当权,开口闭口抓阶级斗争,搞路线斗争,批唯生产力论,谁也没法去落实周总理指示。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7月,中央解决了甘肃省委领导班子问题,宋平同志担任了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四人帮”那套极左思想路线对农村工作的干扰破坏才得以遏止。1979年后,甘肃定西地区农村逐步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村工作农业生产才真正走向稳步发展之路。但是,对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相当差的定西及甘肃18个干旱县来说,轻言“粮食过关”或“改变了面貌”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2000年1月15日至16日,记者请正在海南三亚休养的宋平同志,聊天式的回顾甘肃往事。他说到了如下内容:

我工作过的地方那么多,唯甘肃印象最深。每天看电视看完了新闻联播看天气预报,我都要看看甘肃兰州的。你想要我谈谈甘肃印象,那真是艰难岁月啊。一方面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困难,“四人帮”疯狂的时期啊。另一方面就是工作环境自然条件的艰苦。有些情况你也是经过了的。

我是1970年冬天去甘肃的。开始在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当副主任。后来参加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工作。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是张忠,省军区司令员。我当他的助手。

冼恒汉当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那几年甘肃工业增长速度和利税增长速度在全国都是靠前的。石油化工是增长比较快的。“一五”、“二五”计划期间上的工业项目陆续投产见效。

但是,农村情况非常严重,人民太穷太苦了。

……

1973年5月,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冼恒汉带我参加。在小组会上我发言讲到甘肃农村情况,恰巧周总理进来了。他没有打断我,让我继续发言。我也不会说假话,把下乡看到的情况说了说。说的也不多,因为我不分管农业,掌握的情况也不多。……小组会上讨论讲的这些话,冼恒汉是在场的,听到了的,不存在什么告状的问题。当然,这些实际情况,冼恒汉过去可能也不甚了解,或者没有向中央认真汇报过。……农村的这些情况,过去一级瞒一级,连省上的同志都不清楚。那年月讲实话报灾情就要大祸临头,明明问题严重还要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这个问题在上面很难设想。那不是一个人少数人不讲真话,是整个风气不好啊!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以林业部长罗玉川为组长的工作组来甘肃救灾。看了灾情很严重,我们向中央要1亿斤粮食。当时中央粮食也紧,但后来给了我们3亿斤粮食。还给了许多旧军衣和被褥。……

怎么改变甘肃的穷困面貌?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一直估计不足。从张仲良到冼恒汉,都有这个问题。提的口号不切实际,一些措施缺乏科学性,劳民伤财,损失太大。张仲良在1958年大跃进,搞虚报浮夸,搞引洮工程,那几年死了不少人。教训很惨痛。冼恒汉提出学大寨要三年大变样。他说要亲自到通渭县蹲点,看看三年能不能变个样子。他们都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对甘肃的真实情况研究不够,对困难估计不足,而且心情太急了,想得太简单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红色间谍”郭汝瑰

● 朱竟成 张治宇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一份份被秘密送到共产党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断定,国防部内部有“奸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战功卓著 备受赏识

郭汝瑰(原名汝桂),1907年9月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父亲郭锡柱曾中过秀才,清末废除科举,郭锡柱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他想也想不到的是,日后儿子成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

郭氏宗族中有个郭汝栋,是郭汝瑰同辈堂兄,在四川军阀部队中任高级军官。1925年,在郭汝栋的帮助下,郭汝瑰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五期。这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任职,并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学说。郭汝瑰深受他们的影响,立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不料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清共”。此时,郭汝瑰暂时安身于杨森部队中。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暗中筹划组织“兵暴”。暴动失败后,他潜逃日本,进了日本士官学校。这样一来,他的组织关系也由此中断。

从日本回来后,郭汝瑰不愿再回郭汝栋的部队,于是他又进了陆军大学,当上了“天子门生”。陆大毕业不久,郭汝瑰进了陈诚的18军。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他因战功受到陈诚青睐。此后一帆风顺,仅几年间就当到了军参谋长,由上尉升到少将。

历尽艰辛 重回组织



郭汝瑰

时间定格在 1945 年 5 月,地点是山城重庆。郭汝瑰前不久刚从英国考察回来,被任命为少将军务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这天,他从军务署出来,驱车去浮图关。车出凯旋路,正要拐向校场口,突然,他瞥见路边有一位 10 多年没有见到的熟人。这人正是他的黄埔五期同学任遯猷,当年是中共党员。郭汝瑰一直在寻找着党的关系,见到他后不禁喜出望外。打听之下,郭汝瑰很是失望。原来此人也已失去了组织关系,目前,任职于中央军官学校,军衔仅为少校,处境并不如意。不过这次意外巧遇,却使郭汝瑰后来的历史有了重大的转折。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重庆临江门郭府,有人轻轻敲响了门环。勤务兵开了门,走进来一位衣冠笔挺的中年男子。来人是任遯猷之弟任廉儒,他是真的共产党员。不过,任廉儒并未当场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自我介绍是川盐银行的高级职员,兼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经理。他说,他是从兄长任遯猷那里得知郭汝瑰的消息的。郭汝瑰原来也认识任廉儒,并知道他的身份。但他现在也不清楚任廉儒还有没有组织关系。

在他的旁敲侧击之下,任廉儒只是一味“无奈”地说:“我也和组织上断了联系,不过……”他停了片刻,又说:“我可以给你打听打听,也许还有了解那边情况的人。”

其实任廉儒当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直接受董必武领导。他这次来是探听郭汝瑰的虚实,还不能立即暴露自己的身份。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任廉儒继续造访郭府。而郭汝瑰也干脆把心中的想法全部袒露出来。他还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主编的一份《国军战斗序列》材料交给了任廉儒。此材料属军事机密,只打印了 13 份,底稿由军务署少将办公室主任李文伦监督烧毁。蒋介石再也没有想到,延安方面居然也很快有了这份绝密材料。

临危受命 卧底“国军”

经过一番考察,两个月后,任廉儒通知郭汝瑰去秘密会见董必武。地点是大军火商罗升之的公馆,即任廉儒的岳丈家。

幽僻的小巷深处,一座深宅大院里,郭汝瑰

和董必武紧紧握手。他说:“董老,我来迟了。”“你来得正是时候。”董必武面带笑容说道。郭汝瑰急不可耐提出了归队的要求。董老告诉他:“党要你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董老并告诉他,今后将有专人和他联系……

与董老会面后月余,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战胜利了。何应钦选中郭汝瑰作随员,随他到南京接受日寇投降。哪知抗战甫停,内战又起。随后美国出面“调停”,成立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调小组。郭汝瑰又奉命作张治中的副手。在重庆上清寺尧庐,郭汝瑰见到了周恩来。“老师!”郭汝瑰握着周恩来的手,喊了一声。他有多少话要向周恩来说啊,但此时身在敌营,有口难言。

不久,郭汝瑰又见到了董必武。董老告诉他,原则上可以恢复他的党籍,但必须等待,同时又嘱咐他千万要谨慎行事,不要功亏一篑。

周旋政要 半年三迁

说来也巧,这时国民党中枢对郭汝瑰的宠眷也与日俱增。他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个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当然四人对他最宠信的还是陈诚。

不久后,“太子”蒋经国也将目光放在他的身上。1946 年 5 月 1 日,郭汝瑰随军政部全体人员由重庆到南京,他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当时蒋经国住三条巷,与他算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来到郭府。郭汝瑰不在家,他的家人在吃饭,桌上只有两样素菜。蒋经国喟然兴叹:“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

既然小蒋都如此信任他,郭汝瑰当然要充分利用啦。那些作战计划,一份份经他的手交给单线联系人任廉儒,再由任送给中共地下党,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不仅如此,他还有意制造一些给当局添乱的事。1947 年 3 月 19 日,300 余名国民党退役将校级军官一齐来到中山陵,在孙中山座像前同声痛哭。此即“哭陵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当时国防部进行整军,大量军官被编余并要“自谋生路”。制定与执行整编计划的正是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郭汝瑰。

于是, 这些人的攻击矛头就指向了郭汝瑰, 一张传单上说: “有郭汝瑰者, 仅因为陈诚亲信, 为其十三太保之一, 竟致一年三迁。红得发紫。试问当朝诸公, 天理何在?” 传单说郭“一年三迁”, 其实郭是半年三迁。1946年9月, 他先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主管部队编制, 旋升任陈诚的总参办公厅主任, 板凳还未坐热, 复任五厅厅长, 1947年3月, 又任三厅(作战厅)厅长。这样的攻击, 倒是给郭汝瑰身上又加了一道护身符, 使得郭汝瑰可以继续进行情报传递工作。

疑为“奸细” 化险为夷

1947年5月12日下午5时, 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 “今晚8时30分, 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官邸汇报”在当时是国民党官场人人羡慕的事。

郭汝瑰与二厅(主管情报)厅长侯腾同时到了蒋介石官邸。他们刚刚坐定, 陈诚与刘斐也先后来。这时, 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解放泰安, 并进入了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同侯腾分别汇报了战地形势。蒋介石归纳了众人的意见并作指示, 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 以欧震兵团攻南麻, 王敬久兵团攻博山。郭汝瑰将此一一记下。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孟良崮战役。会议刚完, 宋美龄走进客厅说: “请大家吃饭。”桌上只是四菜一汤, 没有饮料, 其中有一道菜——蒸气鸡, 味道颇鲜。餐后的水果是木瓜, 刚用飞机从广东运来, 算是给众人尝鲜。

郭汝瑰回到家, 就把当晚的作战部署重新抄录了一份。刚抄完, 任廉儒就来了。他把作战部署交给任, 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 有整编74师, 全部美式配备, 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果然, 在孟良崮之战中, 郭汝瑰的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74师被全歼, 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而这一切, 距“官邸汇报”仅4天(5月16日)。“卧底”的郭汝瑰, 所起作用不亚于10万雄兵!

隐藏得很深的郭汝瑰, 还是差一点被人察觉, 那人就是杜聿明。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前夕, 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

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守淮”的具体方针是, 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他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计划。而郭汝瑰制定的计划尚未实施, 就被送到解放军指挥机构。

接着郭汝瑰又诱导老蒋改变原来坚守蚌埠的决策, 改为在徐州外围决战。当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在碾庄时, 蒋介石急召杜聿明到徐州指挥作战。而杜聿明对郭汝瑰早有怀疑。日后杜聿明回忆说: “这时, 我心中忐忑不安, 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 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 人又矮小, 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 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 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回蚌埠附近,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 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报告的方案, 觉得争亦无益, 一个人孤掌难鸣……”(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事隔多年后, 杜聿明和郭汝瑰同是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 杜聿明患病住院, 郭汝瑰去看望。杜问: “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 郭答: “是的。你是从哪里得知的呢?” 杜说: “山东方面。” “谁?” 杜笑着避而不答。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郭汝瑰追问。杜长叹一声: “我拿不出真凭实据。” 此乃后话。

淮海战役后, 郭汝瑰找个机会到四川组建72军, 他任军长。1949年12月, 他率部在宜宾起义。

解放后, 郭汝瑰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 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研究员等职, 以副兵团级离休。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本刊更正

本刊今年7期“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一文, 第73页左栏第12行“……避免这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不再重演”一句应为“避免这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重演”;

《许集美冤案始末》一文中的“曾镜水”应为“曾镜冰”。特此更正。

本刊编辑部

李普今年八十八

● 杨继绳

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著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河北省著名企业家孙大午,为彰显“两头真”的老人,还建设了数百亩树林,命名为“两真林”。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

作为记者的李普

李普作为名记者,我在上学时就知道了。真正知道他这个人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1973年,他从中南局调回新华社,在北京分社任社长。我在天津分社当工业记者。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天津工业形势述评,拿着稿子送到总社。工业组的老编辑华敏把我的稿子粗看了一遍,就从他的办公桌上抽出一篇稿子给我。这是一篇北京市的工业形势述评,北京分社刚发来的。华敏说:“这是李普写的,向名记者学一学吧!”我迫不及待地细读了一遍,果然名不虚传。那如虹的气势,那深刻的立意,那精密的结构,那洗炼的文字,使我钦佩不已。我赶紧从华敏那里要回了自己的稿子,躲在招待所里一遍又一遍地改了起来。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用“两虎把门”的版式,让北京和天津的两篇工业形势述评共享一版头条的位置。

位于天津市睦南道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在办公楼后的平房是一个放旧物、旧书的仓库。那里面有一大堆50年代初期的杂志。其中一套经济理论文章选集对我很有吸引力,上面收录的是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许涤新等经济名家的文

章。在这套书的第八辑,收录了李普1950年写的一篇长文:《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我先是羡慕作为记者的李普能写出分量这么重的经济理论文章。我读了两遍,不仅学到了很多经济知识,更佩服的是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通俗。我从这里开始学习怎样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述深刻的思想。

李普的新闻写作是第一流的,这不用多说。李普坚持“新闻写作绝对不许虚构,必须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是新闻文字的第一生命。”因此,他一再强调“新闻报道不要盲目向文艺靠拢。”李普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他对用文学手法写新闻始终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比如某次高层会议和两三个人之间的密谈,有些作家写得如亲临现场,活灵活现。读者会问:你又不不在现场,怎么知道每个人谈话时的眼神和动作?你又不是钻肚子里的虫子,怎么知道人家那么细致的心理活动?李普为这种“把真实的写成了可疑的”的作品感到惋惜。李普还创造了一种质朴的文风。他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他认为形容词越多,文章越不美;他在动词上很下大功夫,力求准确和贴切。李普写文章不用华丽的辞藻,直接把日常口语挥洒纸上。读者却感到美,感到有说服力。这正像金代一位诗人《谈杜诗》中所说的一样:“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

作为记者的李普,用他那质朴可信的笔,记录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面说的那篇文章记录、分析了开国六个月之内发生的一件安邦定国的大事。在新中国开国前后,李普的新闻记录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记录了开国大典,这些,都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作为记者的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胜利和成功的喜悦,也见证了并评析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拐点”。他认为这个拐点是1953年。他认为

“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在这一点上，李普不仅是记者，而且是历史学家。不过，他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学结论，不是研究史料得出来的，而是实地采访和亲身观察和体验得来的。

他见证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那时他作为报道开国大典的记者，住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李普就从他手里接过了讲话稿和一张纸条上写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李普从名单上看到了“联合政府”的阵容：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非共产党人，56位委员中有27位非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中有四分之一的非共产党员。作为临时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把搞社会主义当作将来的事。这个共同纲领还“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李普很赞赏这个纲领。

李普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之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接着，“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李普认为，新中国历史上“左”倾的弯路是从1953年放弃“共同纲领”开始的。

李普在他的新闻学著作中写道：“独立观察、独立思考、更是一个记者的命根子。”李普能看到、记录历史这个大拐弯，正是因为他守住了记者这个命根子。

李普为“共同纲领”被推翻而惋惜不已。至于为什么一个人的权力那么大，他的88个字的批示能够取代“根本大法”？为什么“共同纲领”这么脆弱，一个人的一个批示就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说。

作为官员的李普

李普是大官，官至新华社副社长，至今还住在副部长级的房子里。可是，除了房子大以外，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当大官的时候我和他没有见过面。这并不是他高高在上，而归于我的一种特殊的过敏症，对官员的面孔和眼神过敏，对官员鼻孔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更是过敏。所以我对高官总是敬而远之。其实，李普并没有使我“过敏”的那种面孔和眼神。他的鼻孔里从来没有发出过那种令人浑身不自在的声音。黎澍曾说李普“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他没有把自己当大官。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985年夏天在养马岛休假，我们两人多次在海边散步。望着远处朦胧的小岛和近处的渔船上的炊烟，他说：你会写诗吗？咱们来两句！我说：上中学时我写过诗，在清华学了6年工科，诗情画意都被数理化熬干了。他说：那就不写诗了。我们到海滩去捡石头吧。他和我提着拖鞋，光着脚，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用脚踢沙子。捡到一块好石头那种欣喜的样子，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那时我向他谈了一些当时主流舆论视为叛逆的言论，没想到竟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出的一些话竟比我还大胆！我们年龄相差20多岁，但我总是对他李普李普地呼喊，因为我们谈话时，总是忘了年龄的差别。他呼我小杨，但写信时却称“继绳兄”，使我惶恐不已。后来我想，信上这样地称呼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规矩。

李普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讲资历有资历，讲能力有能力，讲人品有人品。可他在官场上混得不太好。在新闻界名气那么大，写了那么多名篇，可到头来还是副部级待遇，实际级别是正局级。当然，这与体制的改变有关。他离休时新华社是副部级单位，作为副社长，只能是正局级。后来新华社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水涨船高，连中层干部都是正局级，李普没有赶上。

李普在官场不顺，有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官场是分等级的。在官场混的人必须有等级观念。即使你脑子里没有，你的行为上

必须有,至少你的脸上必须有,特别是在高你一级的人面前非有不可。否则,你只能在你现有的级别上熬一辈子。而李普,除了埋头干活以外,却“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作为官员,说话得讲“艺术”,要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讲一些自己不信、却要别人信的话,有时甚至讲一些假话。李普不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讲真话,讲直话。他说话大胆,文字泼辣,简直不知道官场的种种禁忌。像他这种不懂官场的人,如果不是能力过人、成绩突出,恐怕连个局级也混不上。李



李 普

普大概也有自知之明,官没有升上去,却也悠然自得。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怨气。我多次听李普说过这样的意思,他之所以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重庆的干部。只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抢救运动的“磨练”,才会“夹着尾巴做人”。

这是不幸还是有幸?我认为是有幸。“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建国至今五六十年,部长数以千计,谁能记得几个名字?而很多人知道李普这个名字。因为李普不断地向社会奉献华章,到八十八岁还文章不断。

作为学者的李普

有的新闻单位提出“记者要当专家”的目标,对这种提法我是不敢苟同的。专家的研究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他一辈子在他的专业领域里皓首穷经。在这个专业里,他有绝对的发言权;离开这个专业,他的认识深度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作为记者,不能一辈子只关注某一个专业。真要这样,他就改行从事那个专业了。要说记者是专家,只能是新闻这个行道的专家。所以,说某某是“专家型记者”是不妥当的。那些有成就的研究

型记者,说他是学者比较恰当。

李普就是我说的这种类型的学者。除了有新闻功力以外,他还有理论功力。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他采访什么问题,就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得很深,从中挖出很多道理。只要他肯在某一方面花时间,他也可以写出某个专业的专著。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著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著同列竹帛。李普不是专门研究某一学科的学者,他的视野更广阔。他关注的是国家、民族,是

天下大事。他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真理追求者。

作为思想者的李普,他的思想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他自己写道:

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李普这里说的前两个阶段,走进革命行列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样。可惜,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进入第三阶段: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

要进入第三阶段必须有一个思想大解放。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要解除前两个阶段留在大脑里、渗透到血液里的种种定见、种种框框。思想解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是要有勇气承认自己在第二阶段有哪些不对。二是要冒政治风险,不怕与主流不一致。第三要有思想家那样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思维品格。

李普敢于否定过去不正确的东西。他无情地解剖了他那段时间“可恨”、“可笑”的“左”。他坦诚地向今天的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两次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的发

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气壮如牛，是一个十足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李普为追求真理敢冒政治风险。他敢说与主流不一致的话。他不怕因说真话、求真理而被“边缘化”。

李普把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称为他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他写道：“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长过程。我好比进了一次大学，1978年的讨论好比是我的一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毕业了。我可以说至今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黎澍老夫子》）他还写道：“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多年不用脑子，不想问题了。然后又悟到，那时想还是想了的，不过是在既定框框里想，是预先肯定它正确。那时的想，其实只是领会，只是学习，只是‘跟’，跳出了这个框框，便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思考的快乐》）他在其它文章中也谈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开朗的欣喜，如梦初醒的振奋”。

本文前面说的，为什么一个人88个字的批示能够推翻“根本大法”；为什么“根本大法”如此脆弱，一个人的88个字就可以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回答。而作为学者的李普，从根本上作了回答。到晚年他大彻大悟。他的彻悟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对领袖的认识；第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第三是对现行制度的认识；第四是对马克思的认识。李普在这四个方面的彻悟是深刻的，一针见血的。

话题又回到他的“第一次解放”。他“参加抗日民主救国运动”，到今天看还是无可厚非，而“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需要进行历史的反思。

一位著名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自由民主取代专制主义。“五四”运

动就是这样的启蒙运动。他在谈到他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写道：“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启蒙，是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位学者到晚年才明白：“抗战前后的所谓新启蒙，……实际是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启蒙的偏离。起初也许只是差以毫厘，逐渐就谬以千里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偏离‘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

显然，仅凭陈伯达等几个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当时的热血青年，也不是那么简单，陈伯达等人写几篇文章，就能把他们“启蒙”了？陈伯达等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是当时视为楷模的苏联。当时有一定的国际环境，有一股不大的国际潮流。国际环境就是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而相比较的是当时苏联的建设很有成绩。在这个环境中，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诸如英国的肖伯纳，说了不少苏联的好话。青年人的偶像鲁迅那时也向左倾斜。当时，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共识：苏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政权的力量，使这种部分人的共识变成了全民的“集体认识”。正是有了那种“集体认识”，才会有消灭私有经济的狂风，才会出现“大跃进”和由它引起的大饥荒，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荒唐。……

我这里说的“集体认识”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权威政治条件下，相当多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共同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审美观。“集体认识”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股横扫一切的潮流，一切与这股潮流不同的都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消灭。“集体认识”有一个最高的权威，通常是最高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不仅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信息，垄断了舆论，垄断了真理。只要政治权威发出什么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清白无辜的人会遭受“广大群众”的残酷迫害；正派廉洁的人会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撒下弥天大谎被认为是党的忠

诚;滥杀无辜被认为是解放全人类……“集体认识”是强大的,也是很可怕的。

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时说:“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

“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像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那样,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乖乖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呢?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李普已经八十八岁。他不会、也没有机会再一次掉入历史的陷阱。后来人可得十分当心啊!

2006年7月25日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 妹	39.00	7.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35.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68.00	8.00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刘武生	38.00	6.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16.80	5.00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6.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7.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6.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6.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6.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6.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6.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董 健	18.80	5.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红色家书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35.80	7.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作者走访当时夹边沟、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历时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对于一切关心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 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李宗仁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作者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本书将“文革”时期周恩来为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的史实展现给读者,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复杂历史和周恩来这位人民总理的理解。

《红墙大事》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20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纯情燃烧的岁月

● 段仁汉

白盛玉,女,园林县人。是我在茶林师范学校同班同学。因我俩是同学,所以相处很好。但她比我大二三岁,所以我叫她“盛姐”。她也一直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喊我“汉弟”。所以学习生活互相照应。她因人长得漂亮,学习唱歌跳舞样样行,是班上的尖子生。

1949年冬末,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路过我们学校。那时时局动荡,学校已停课。二野政治部招收青年学生参军。我俩被同时招收到随军学校受训。第一次穿上宽大的军装,我好高兴。但白盛玉整天都愁眉苦脸,有一次她悄悄地对我说,我们读了十来年书,结果却当了个“丘八”,这书岂不白读了?天天行军打仗,真划不来!我说,盛姐,解放军首长讲了,今后一安定下来,要派我们下连队当文化教员哩!她摇摇头表示不可理解。

果然不几天,白盛玉便私自逃跑回家了。

我们随军学校的郭副政委平时很欣赏白盛玉的才华,他也知道我和白盛玉是要好的湘西老乡。便对我说:“段仁汉同志,白盛玉主要是年轻不懂事,严重违反军纪。由你带路,我们返回湘西把她劝说归队。”

第二天我和郭副政委乘坐一辆小军用吉普车,带了一个警卫员,从四川酉阳出发,经过一天一夜急驶到达园林,找到了白盛玉的家。当时园林全县正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白盛玉家是地主,她父亲正在受到贫苦农民的批判斗争。白盛玉跑回家看到这一情况,好后悔,正在苦闷不堪时,恰遇我们来找她,劝说她归队。所以她二话没说,就跟着我们返回到部队。到达

重庆后,我们一起参军的同班同学全都分配到基层连营当了文化教员,只留下白盛玉和我们班长向志在师部政治部当了文化干事,我们都羡慕不已,但也无法攀比。白盛玉自不必说,才貌双全。向志虽比我们大几岁,但他为人处世稳重,而且吹打弹唱样样拿的起放的下,一贯是我们敬爱的班长。

之后不久,就闻传郭副政委追求白盛玉的绯闻,我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因为郭副政委当时已是正师级领导干部,原来妻子是军区文工团员,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没有小孩,正孤身一人。更主要是他当时也只有三十多岁,是当时解放军中极少数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对我们这批参军的青年学生特别关照。我从内心祝福他俩喜结良缘。

1954年的冬末,部队的文化速成学习运动已接近尾声,大批南下的解放军干部战士都达到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每年分期分批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原来他们见到我们穿四个口袋的文化教员要敬礼,现在我们见到他们要向他们敬礼,因为他们这几年都由战士提拔到连营团的领导岗位。我们这批文化教员大都复员转业回到地方工作,而少数留在部队的经过五六年磨炼,大多都入了党提了干,我这时已调升师部通讯参谋。白盛玉已提升为军政治部文化部协理员。而出人意料的是,一直表现不错的我们班长向志却在一个边远连队当副指导员。让人更感到奇怪的是,一对让大家感到合情合理的幸福婚姻竟没有成功,至今郭政委仍是孤身一人,白盛玉当然也是单身。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几年郭政委一直对白盛玉一往情深，工作学习上照顾自不必说，就连生活上对白盛玉也十分照顾。开始白盛玉十分感激，但一提到婚姻她就一口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经过组织调查（解放初期解放军的很多单身领导干部都是由组织上考虑帮助解决个人婚姻大事的），发现白盛玉和向志感情好。组织部的领导就干脆找白盛玉个别谈话，说明郭政委为革命奋战几十年至今仍孤身一人，并且年龄也不大，又有文化，特别是对你白盛玉一往深情，希望白好好想想。至于向志，领导明确表示，他资历浅，职位低，在部队当时还没有达到谈恋爱婚姻的条件。白盛玉只默默地听着，不点头，也不摇头。领导只好让她好好考虑，想通了再向组织汇报。之后几个月郭政委又主动找过她好几次，并主动亲切地安慰她说，小白，不要勉强，慢慢想，好好想，想宽点，想远点，想好了我再来找你，反正我是从内心深处爱上你了。白盛玉只是不点头也不摇头，但眼泪却夺眶而出……

之后不久，向志便从机关调到一个边远的连队任副指导员至今。听说调离那天，白盛玉和他躲在竹林里话别。回到机关大家都看到白盛玉的眼睛哭得红肿肿的。

从此白盛玉对组织的态度强硬起来。每当组织部派人来问她考虑好没有，她都强硬地摇着头说，不行！不可能！但对郭政委她还是非常敬爱的，每当郭政委来看望她，他俩谈话都很融洽，但一提到婚姻大事，她都十分明确表示：郭政委您是我敬爱的领导，但不是爱情。因我已有心上人，他就是向志！

1955年底，组织上决定我们这最后一批知识青年全部转业到地方工作。离开那天，我们乘坐的十多辆军车停靠在大操场上。欢送仪式已结束正准备离开，但郭政委和他的警卫员还远远站在操场一角不愿离去。我和白盛玉、向志是坐同一辆军车。这时突然发现郭政委的警卫员跑步来到我们车前，向白盛玉敬了一个军礼说：白干事，我们政委请您去一下！白盛玉不肯动。大家都劝说她快去，我也劝说：盛姐，首长一番好心请你，你快去！就连坐在她旁边的向志也说，领导站在那等，可能要交待什么，你

快去！她才勉强下车去了。我们静静坐在车上，只远远地看见操场的另一角郭政委正向白盛玉讲着什么，还不时用手亲切地比划着，样子显得非常亲切自然。而白盛玉却低着头，一言不发。大约有二十分钟，白盛玉才回到车上，脸上毫无表情。郭政委也来到车旁向大家道别，大家都站起来向这位敬爱的首长握手敬礼。只有白盛玉低着头坐着不动，两颗泪珠顺着她的眼眶流下，她迅速用手帕擦干……

第二天到达成都休息一天。我偷偷地问白盛玉那天郭政委对她讲些什么？她说他劝她留在驻军当地政府工作，并说不管分到哪里工作，工作、生活遇到困难都要给他写信，他可以设法帮助解决……

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我因在部队是通讯参谋，被分配到湘西自治州邮电局工作。向志和白盛玉都分到本县一中教书。他俩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组成一个幸福家庭。向志因为能力强，工作踏实，很快被提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后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事业，再也没有取得联系。

1960年初我调任湖南花垣县邮电局局长，有一次到武汉出差，路过白盛玉工作的县，我有意停留一天，想到一中去看望一下我的老同学白盛玉两口子。那时我才二十八九岁。穿一件笔挺的毛料中山装。一中传达室的人一看我进来，非常客气地问我找哪位老师。当我说明要找白盛玉和向志老师时，他忽然态度对我十分生硬。问我找他两个要干什么？我只得说他俩是我的老同学，我出差路过顺便来看一下老同学。他很鄙视地指着里边一间偏屋说，在那间煤屋里，你自己去看吧。当时我一头雾水，走进那间屋里时，使我大吃一惊。只见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地坐在那补衣服。屋里锅子碗筷到处散落，旧桌烂椅东倒西歪。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愁眉苦脸坐在女人身旁。当她回头看到我时，我俩都惊奇地对视好久。还是她先认出了我，你是段仁汉！我却不敢叫她。因为眼前这个女人跟部队时的白盛玉完全两个样。但在她满脸愁苦中带着倔强，凄苦的眼神中还带着一线希望。我肯定地说：“你就是白盛玉，盛姐！”

原来她的丈夫向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现正

在农村监督劳动。她本人也被划为中右,取消了她的教学资格,专门要她打扫学校的清洁卫生。说着说着眼泪就长流不止。我只得劝说,现在反右是全国性的,又不是你一家。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希望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委屈都要坚强地活下去!她顽强地点点头。

临别时我把身上仅有的八十多元钱塞进了她小孩的腰包,她也没有阻拦,只对我说,汉弟,你以后再也别来看我,更不要给我写信!我默默低头跨出了她的家门,走出学校回头一看,她还站在家门口对我呆呆地看着,我挥手叫她回去,头也不回离开了她的学校。

从此我们就失去联系,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1992年5月一天中午,从边城宾馆打来一个电话,一个女中音在电话里问,这是段局长的家吗?我忙说我就是段仁汉!你是谁?电话里却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猜我是谁?听我半天猜不着,她却大声说:我是白盛玉!我啊了一声忙问,你现在哪里?她说我们现在就住在你们这儿的边城宾馆三楼318号。我马上坐车到边城宾馆。

一见到他们使我有点不敢相认。两口子一派华贵的名牌休闲服装,向志还是那么精干潇洒,白盛玉却显得雍容华贵,富态的身体有点发胖。我马上把他们接到家中欢聚。

原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俩都彻底平了反,俩人都被评为高级教师。向志还被提为县教育局副局长,唯一的儿子现在美国读研究生。两人现在都已退休,安享晚年幸福。这次是专程到张家界旅游,专门绕道来吉首看望我的。

蹉跎岁月,道路坎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嗟叹不已!

临走时她打开钱包,抽出百元大钞,整整数了八张塞给我的孙子。我说你给小孩那么多钱干什么?她说,三十年前,在我们最困难的日子里,只有你段仁汉一个人来看望我们,给我们活下去的勇气。你给那八十块钱,当时真是救命钱,我们铭记至今!

1995年我已完全退休,在儿子段明的北京家中闲居。无意中在解放军报中的边角看到一篇讣告,正是当年郭政委大名。原来他早已调中央军委工作。生前是中央军委中层领导干部,中将军衔,早已退休,妻子也在军队工作,也已退休在家。儿女都在军队工作。去世时86岁。我当时把这个消息电话告诉白盛玉,她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她问我追悼会哪天开。我说大后天下午。她又问我参不参加,我说争取参加。她说请你代我向 he 鞠个躬,敬个礼。我说可以。

不料追悼会那天,白盛玉和向志两口子都从长沙坐飞机赶到北京。我们一起前往北京八宝山告别厅参加了郭政委的追悼会。

在绕灵一圈时,白盛玉突然从队列中走出来,在灵前深深地三鞠躬。郭政委的儿女看到这位泪流满面的白阿姨的感人举动,都拥着这位素不谋面的白阿姨泣不成声。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

让生活不留遗憾
订阅家庭保健报

开始
订阅喽

订阅办法:全国各地邮局
订阅价格:全年99元
什么最重要? 家庭!
什么不能少? 保健!

统一刊号: CN23-0022
邮发代号: 13-3
彩色印刷, 每周二、四出版
咨询电话: 0451-84652433
84653121

吕彦直设计监造中山陵

● 鄢增华

在南京东郊的钟山风景区内,众多民国建筑众星拱月般地围绕着一座宏伟壮观、庄严肃穆的陵墓,这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中山陵。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海内外宾客前来瞻仰。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中山陵与一个流星般短暂却炫目的名字——吕彦直紧密相连,他既是中山陵的设计者,也是陵墓的监造者,正是他的呕心沥血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光辉的杰作。

吕彦直,字仲宜,又字古愚,山东东平人,1894年生于天津,1913年以庚子赔款公费从清华进入美国康

奈尔大学,先攻读电气专业,后改学建筑。毕业前后曾作为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的助手,参加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校舍的规划、设计,同时描绘整理了北京故宫大量建筑图案。1921年回国后寓居上海,开设彦记建筑事务所。1925年在中山陵公开征集陵墓设计图案评比中获首奖,并应邀主持中山陵建设,终因积劳成疾患肝肠癌于1929年病逝,年仅35岁。吕彦直与梁思成、杨廷宝被称为我国近代建筑三宗师。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设计、主持监造了中山陵,并主持设计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等大型建筑群,这都是我国近代建筑中融



吕彦直

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的代表作,在建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构思巧妙,中西合璧,中山陵图案设计脱颖而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按其遗愿归葬南京紫金山,成立了由张静江、汪精卫、林森等12人组成的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设葬事筹备处于上海。段祺瑞政府也下令国葬,以示隆重。中山陵的建造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工程,陵墓设计图案至关重要。

几经研究,葬事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征求陵墓图案条例》,决定向海内外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至9月15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共收到应征方案40余件。当时年仅31岁、名不见经传的吕彦直在上海报名后,潜心研究了中国古代皇陵和欧洲帝王陵墓,根据《征求陵墓图案条例》的设计要求,参照紫金山地形,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地工作,精心绘制出平面呈一大钟形的平面图及建筑物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等9张设计图和1张祭堂侧视油画,撰写了约1000字的《陵墓建筑图案设计说明》,对布局、用料、色彩提出了初步设想。此次设计图案的评选,除宋庆龄、孙

科及筹备委员会亲自评阅外,由委员会聘请凌鸿勋(南洋大学校长)、朴士(德国著名建筑师)、王一亭(著名画家)、李金发(著名雕刻家)等4位评判顾问分别对仅标暗号、不署姓名的中外建筑师、美术家应征图案,写出书面评判意见。结果,吕彦直的设计图案获得首奖,二奖为范文照,三奖为杨锡宗,名誉奖7名。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陵墓建筑特色,又有创造性的突破。首先,陵墓整个平面呈警钟形,给人以警钟长鸣、发人深省之感。孙中山在临终遗嘱中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吕彦直的警钟形设计图案,最符合“唤起民众”之意。其次,从设计来看,它结合山坡地形地貌将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巧妙地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用大片绿地和宽大的石台阶把这些单体建筑组合成为一组庄严肃穆雄伟的整体建筑群,主体建筑——祭堂虽采用了传统的造型,但却把平面设计成方形,突出四个角墩,屋顶采用蓝色琉璃瓦,墙体采用花岗石,护壁及柱子均采用黑色花岗石,烘托着孙中山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十分肃穆。最后,祭堂在前,墓室在后,使用祭堂时,墓门可以不开,墓室为圆形,墓圻一周筑有石栏,便于谒陵者以此瞻仰,而且墓穴在地下,即使地面建筑被毁,孙中山先生遗体也不会受损。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枢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评选结束后,所有应征者图案都放在大洲公司楼上公开展览五天,展览期间每天来参观者平均约在一千人左右,中西各报纸各有评论,是为当时中国建筑界的一大盛事。展览结束后,葬事



中山陵

筹备委员进行复议,一致认为吕彦直设计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此方案建造陵墓。

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中山陵建设精益求精

吕彦直在设计图案入选后,受聘担任中山陵墓建筑师,主持绘制建筑详图、选用建筑材料、监工及工程验收等事务。他担当此重任后,立即着手编制初步概算,限于经费,经葬事筹备委员会讨论决定,工程分两部进行。吕彦直深知,要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必须要有一个资金雄厚,施工经验丰富的营造厂承建,而当时上海几家大营造厂中,只有曾经建造过上海电话大厦、外白渡桥和南京南洋劝业会的姚新记营造厂最为合适。但直到招标结束的前5天,仍未见姚新记来投标。他一面将招标期限延长4天,一面让人以他的名义写信请姚新记前来投标。至招标结束,共有余红记、姚新记、新金记康号等7家营造厂投标,姚新记报价为白银483000两,居第二位。由于经费有限,吕彦直与姚新记几经商量,最后,姚新记以

白银 443000 两银的造价承包。年底,孙科与姚新记签订第一部工程合同,吕彦直以证人身份签字,合同规定工期 14 个月。1926 年 1 月 15 日,中山陵工程开始炸山填土,3 月 12 日举行奠基礼。

由于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施工,条件极差,材料运输也非常困难。从意大利、香港、青岛、苏州等地运来的各种石料,只能运到沪宁铁路下关车站,用市内小火车转运至督署车站后再用自备汽车运出城外。城外道路更加崎岖,几经周折才能运至山下,然后在山坡铺上木枋、铁轨,用人力加绞关拽上山去。当时军阀割据,政局混乱,从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和从比利时进口的竹节钢经香港转运上海后,海关要征收巨额关税。沪宁铁路局也以“不办联运”和“枕木腐朽,不堪承重”为理由,勒索巨款。当地土豪劣绅又以占用农田、破坏道路为借口,进行敲诈、阻挠。而且当时南京被军阀孙传芳盘踞,政局动荡不安,工地被散兵游勇骚扰、工人被拉伕、财物被抢掠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工程进度十分缓慢。至 7 月中旬,开工已半年,而主要材料还没运到,墓室、祭堂的基础工程也没有完成。为此,葬事筹备委员会于 7 月 19 日致函吕彦直,告诫工期已近一半,如不能按期完工,将要承担责任并受到罚款处理。姚新记营造厂也多次致函吕彦直,要求帮助解决施工中的困难。为加快工程进度,吕彦直不得不奔波于沪宁之间,9 月份,终因辛劳过度,病倒在上海寓所。但吕彦直对建筑所涉及的每一个细节都严格要求,每一份工程的图纸大样和做成的模型均须送往上海,由他亲自审查、修改。选用的建筑材料,除必须按他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经南洋大学试验并超过美国标准,他才签字准用,否则,他就要求返工。他的严格要求与一丝不苟的态度,引起了姚新记营造厂发出“工程在宁、取决于沪”和“吕建筑师欲成其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试验出之”的怨言。

1927 年 3 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葬事筹备处由上海迁至南京,加推蒋介石等 7 人为委员。5 月起,材料运输顺利。11 月 24 日,第二部工程开工,第一、二两部工程同时进行,进展十分顺利。1928 年 1 月,南京严寒,大雪盈尺,由于之前工程进度速度太慢,至此,工期已超过了合同规定

期一年,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7 月,葬事筹备委员会召集委员、建筑师、包工会议,商量赶工办法,采纳了吕彦直提出的日夜施工的建议。8 月 11 日起,两部工程同时日夜赶工。吕彦直拖着虚弱的身体,不分日夜地在工地巡视督促。1929 年 2 月,墓室、祭堂基本完成,吕彦直在上海卧床不起,病中仍念念不忘中山陵工程。20 日,他写信给姚新记,要求全部工程必须在 3 月 9 日前完成,以便在预定 3 月 12 日奉安大典(后推迟至 6 月 1 日)前验收交工。不料就在工程即将全部竣工准备迎接他来工地验收时,他却在上海病逝。人们无不为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建筑师未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设计、监造的中山陵建成就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4 月 3 日,葬事筹备委员会第 66 次会议通过了“继承吕建筑师工作案”、“承认此项工程用彦记事务所名义,由彦记建筑师李锦沛继任陵墓建筑师”。5 月,李锦沛、黄檀甫代表彦记事务所进行工程验收。6 月 1 日按期举行了奉安大典。

永远的怀念

为了褒奖吕彦直在中山陵设计及建筑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29 年 6 月 11 日,南京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布第 472 号褒扬令,全文为:

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事优良,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画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勋,惋惜殊深,应予褒扬,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

1930 年,陵园管理委员会又为吕彦直立纪念碑,石碑上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由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祺制作,下半部为于右任书写的碑文。文曰:

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这是我国至今为建筑师树立的唯一纪念碑,石碑原安放于中山陵祭堂西南角的休息室内,抗战中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但这无碍于我们对这位杰出的建筑师的崇敬和怀念,因为他已与中山陵同在。(责任编辑 赵友慈)

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度兼理川政

● 曾景忠

在大陆时期,尤其是抗战期间,蒋介石之党政军兼职甚多。有些著述多从蒋氏喜欢揽权,独裁专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原因是否确实如此,颇值得研究。

单就蒋介石抗日战争期间一度兼理川政来说,就很耐人寻味。难道已经掌控全国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为了独裁专制,竟不容许别人担任省政府的领导职务,而要亲自掌握四川一省的统治权不可吗?恐怕我们还是要从分析当年四川政局的情况寻找答案。

四川地处西南地区,幅员辽阔,过去对外交通不发达,比较闭塞。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各派军政势力分裂割据,曾为争夺地盘争战不已。抗战前,蒋介石即选定四川为中国未来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国民政府中央的势力逐步伸入四川。1935年11月,建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川康军事进行整理,国民政府下令整理四川财政。这些都是实现四川国家化,实现全国统一,为将四川建设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而作的准备。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总体而言,四川军民拥护国民政府中央发动全面抗战,积极支援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8月初,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应召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参与发动全国抗战的决策。不久,四川省出动14个师奔赴华北、华东前线杀敌。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四川各界欢迎国民政府迁都入川。这是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表现。

但是,四川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随着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病逝,这一矛盾爆发了。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任刘湘为第七战区

司令长官,刘湘部川军开到浙皖边境,掩护从淞沪撤退之部队。1938年1月20日,刘湘于汉口病逝。为抚绥川局,国民政府对刘湘丧事之办理甚为隆重。国民政府明令褒彰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民政府还下令对刘湘国葬。

刘湘病逝后,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由谁继任,非常重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东部地区重要机关、工厂西迁,四川成为抗战后方的中心地区,中央政府自然要加强对四川省政的控制。刘湘病逝刚过二日,1月22日,国民政府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23日发布)。当时张群担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并任行政院副院长,其每一项职务的工作均很繁重,但国民政府仍选用出生川籍(华阳)的张氏为川省政府主席,可见中央政府对掌控四川省政何等的重视。

但是,张群虽为川人,但早年离川,后在中央任职,不是川省地方势力代表。对张群的这项任命,遭到四川省地方势力的反对。25日,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代理省保安司令(原为刘湘)王陵基支持武德学友会(王任会长)发出通电,反对张群主川,出现了四川省政危机。

为稳定四川政局,1月28日,国民政府决定,新任命之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未到任前,省政府主席一职暂由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代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一职暂由绥靖公署总参议锺体乾代理。

面对四川地方势力的挑战,中央政府只好妥协,四川军政职务还是要从四川地方人士中物色。3月2日,国民政府特派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4月26日,行政院议决,张群一时不克赴川就任,省政府主席职务由王缙绪代理。张群



刘 湘

张 群

蒋介石

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实际已成虚悬。至8月1日,行政院议决,由曾秘密加入过复兴社的川军将领王缙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

但四川省地方势力内部也矛盾重重。四川地方势力中有对王缙绪任省政府主席职务反对者。至1939年8月10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策动川康七师长彭焕章等通电反对王缙绪。9月,国民政府安排王缙绪出川作战。川省府主席一职仍未能确定适当人选。不得已,乃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1939年10月,身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在对日抗战非常紧张的形势下,作为军事统帅的蒋氏,可谓日理万机。由全国最高统帅亲自兼任一个省的负责人,恐怕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各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蒋介石10月3日由渝飞抵成都。7日,蒋氏亲至四川省政府视事。10日,他招待出征军人家属。11日,蒋主持省政府会议,听取各厅长本年度工作报告。15日,蒋发表告川省同胞书。16日,他出席成都党政军联合扩大纪念周,讲施政要旨:去除倭寇,提高正气,培养民力,俾能担负民族复兴根据地的责任。17日,蒋方离蓉返渝。

其后,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贯彻蒋的施政方针。10

月,贺国光召开全省专员会议,蒋未能与会,但对会议发来训词,由贺国光宣读。按蒋氏“告川省同胞书”要旨,会议确定:禁绝烟毒,整理财政,整顿保甲,推进地方自治,纠查兵役弊端,抚慰出征家属,确立役政,推广合作,开发地方经济。

12月5日,蒋介石手订《四川省施政纲要》,共8项,28条,交省政府政务会议审订颁布。1940年2月20日-3月13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四川省施政纲要》。4月19日,省府政务会议通过1940年施政计划,决定“为中枢分忧劳,为川民谋福利”。

1940年4月21日,蒋介石又从重庆飞至成都,处理四川省政务。26日主持省政府政务会议,约见成都各校校长,宴请各界绅耆。29日,他出席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川政建设之检讨与今后应有之努力》,提出:彻底禁烟,肃清盗匪,切实建设,造福川民,改进机关,建设社会,着重经济建设之推进,立信为行政之本。30日,他电令四川省党政军首长,力崇节约。

5月1日,蒋介石出席四川省训练团地方行政干部班第一期开学典礼。他致词说,要推行地方自治之根本要务。国民政府颁布新县制后,蒋令在四川省积极贯彻。

直到5月9日,蒋氏才离开成都飞返重庆。

兼任四川省政期间,蒋介石重视禁止烟毒工作。1939年12月16日,他决定改组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亲自兼任督办,贺国光任会办。

1940年5月8日,他对禁烟工作作指示:要在半年内肃清,大力宣传,严法相绳。按禁政优劣对官员进行奖惩。对川边地区,设立禁政机构,长期督导,三年完成。他还兼任四川省烟毒总检查督察团团长。1940年8月16日,他派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万县区办公处主任褚辅成代理。他授权检查团各组可电请省政府撤惩官吏。

他对四川省经济建设抓得很紧。1940年4月8日,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成立,研讨四川省经济建设纲领,送呈蒋介石审阅。5月9日,《四川省经济建设纲要》发表,确定成立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6月3日,行政院颁布《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6月13日,蒋介石核定增加川省银行股本,调整人事,以期为建设注入资金。7月24日,蒋发表告四川省同胞书,希望整理各县市财政。9月27日,蒋指定张群、徐堪等十人为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11月1日,委员会成立,张群、徐堪、贺国光等80人为委员,蒋介石任委员长。蒋因公务繁忙未能参加成立会议,而由常务委员张群作代表,蒋氏颁训词,强调地方治安,要转移社会风气,加强交通运输建设,切戒机关衙署弊习。

战时军民食粮供应至关重要。1940年3月15日,成都米价猛涨。蒋介石发出手令,命成都军政首长,查明成都奸商大贾囤积居奇者,有计划地对粮食进行平价销售。如再发现囤积居奇,悉数充公,并按扰乱治安问罪。9月1日,设立四川省粮食管理局。11日,蒋介石发表“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10月15日,四川省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贺国光代表蒋介石报告省政工作。大会发出通电,响应蒋氏“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在加强粮食管理的同时,要捐献军粮。

蒋介石重视教育工作。1940年3月21日,四川省召开教育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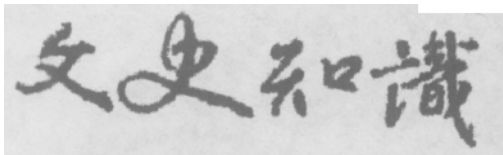
导暨师范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救国,拥护蒋介石慰勉小学教师电和电勉全国教师电,确立教育救国的观念。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14个月之后,直到1940年11月13日,才辞去省主席职务,而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从上述可见,因抗日战争的形势,国民政府西迁四川,为了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国民政府原本安排中央亲信人物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由于遭到四川地方势力的反对,才任命川籍将领邓锡侯、王缙绪担任四川省的军政职务。但四川省军政势力内部也存在矛盾,王缙绪的省主席职务也做不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蒋介石才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很明显,这里很难用蒋介石喜欢揽权、专制独裁的原因来解释。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前后达一年另一个多月的时间,两次赴成都主持省政府工作。他兼理四川省政,并非只是挂一个空名。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与历史对话 与时代同行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作者荟萃全国一流文史学者,内容涵盖古代文化各个方面
2007年《文史知识》将继续发扬“大专家写小文章”的优良传统,加强知识性、可读性,扩充篇幅,以全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特32开,160页(增加32页)

每月1日出版,全国邮局均可订阅

定价:6.00元,全年72.00元

国内邮发代号2-271

国内标准刊号 CN11-1358/K

国际代号 M627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2-9869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458229 63397473 传真:010-63458226

电子信箱:wszs@263.net.cn 网址:www.zhbc.com.cn

柳亚子与汪精卫

● 李海珉



柳亚子

柳亚子先生在《南社纪略》等书中,多次提到“荃蕙化茅,不乏旧侣,最所痛心。”这“荃蕙化茅”出于屈原的《离骚》。“荃”和“蕙”都是香草,茅则是茅草,比喻好人变成了坏蛋。柳亚子先生用来指某些南社社员动摇变节,成为了汉奸国贼,其中汪精卫属于变节分子中的代表人物。早年柳亚子对汪精卫十分钦佩、推崇,引为南社的骄傲,后来对他则痛心、痛骂到痛疾深恶。柳亚子对汪精卫等人的爱憎,决不是由于私恩或者私怨,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来看一看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爱 and 恨的渊源及其发展变化。

1897年,年仅14岁的汪精卫客居广东乐

昌,重阳节游西岩时即兴赋诗一首: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杯中酒在襟。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茱萸怅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这首重九登高的小诗,大受时人青睐,更受柳亚子的赏识。后来,南社成立,柳亚子把它收入《南社丛刻》的诗集之中。

1904年,21岁的汪精卫赴广东应府试获府案首,被人称为才子。柳亚子16岁时与他舅舅一起赴吴江应童子试,三场考下来,舅甥两人难分上下。当时的主考官吴江县县长,特地接见了柳亚子,说因为柳亚子是外甥,小一辈,应当让一下,这一次的案首就取舅舅了。柳亚子虽然屈居第二,但是他的才名却传遍了吴江乃至整个苏州。柳亚子与汪精卫两个年龄相仿的青年(汪比柳大四岁),经历相似才气相当,互相爱慕当是十分自然的事。

汪精卫是中国同盟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而且是同盟会的重要理论家,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代言人。1906年,柳亚子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汪精卫。汪年少英俊,仪表堂堂,又是天才演说家,他的演说常常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分析入微论断严谨,更能联系时局切合场景引人入胜。柳亚子与汪精卫志趣相同,自然引为知己,再加上柳亚子自己患有口吃,不善辞令,因此对汪精卫深表佩服。

1910年,27岁的汪精卫潜心研究炸弹,成功之后到北京以开设宁夏照相馆为掩护,秘密建立了暗杀机关,最后决定谋杀摄政王载沣,但是连续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事情泄露,汪精卫等人被清廷逮捕。被捕时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告别南洋同志书》等决心一死的书函。审讯时,汪

精卫索取笔墨直书供词：“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篋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寄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供词一一道来，痛快淋漓。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四首，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气冲斗牛，壮怀激烈，传达了革命同志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一时响彻四宇，环球为之震动。按大清法律，汪精卫等人必死无疑，但是当时清廷自感日薄西山，害怕处死汪精卫将会引发剧烈的反抗，无奈之下改判无期徒刑。次年，武昌革命爆发，清廷一面派兵镇压，一面下达“罪己诏”大赦革命党人，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治问题获罪的人，一律开释。1911年11月6日上午11时，汪精卫出狱。还在四年前，汪精卫赴南洋宣传革命，募集军费，有一华侨巨商之女陈璧君，年仅17岁，才貌出众，她对容貌英俊口若悬河的汪精卫由衷倾倒。汪精卫也有心于这位小自己整整七岁的陈小姐。但是，汪精卫自明，自己这一身随时随地要作出奉献，因此不敢贸然答应陈璧君。直到谋刺摄政王遇赦出狱，才答应了陈璧君，完成了夫倡妇随的姻缘。从此陈璧君是汪的夫人，又是汪的高参，后来，汪精卫在政治上的风风雨雨、雨雨风风都与这位高参的运筹帷幄密不可分。与汪精卫相仿，柳亚子先生20岁那年，到上海进入理化速成班，学习实用化学，想自己制造炸弹，准备从事暗杀，为革命出力。汪精卫从事暗杀，付诸行动，且义无反顾，柳亚子仅仅有这种念头并没有付之实施，因此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十分钦佩。

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汪精卫被中山先生指定起草改组宣言。柳亚子先生以一个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加入了改组以后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逝世，汪精卫任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监。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排斥共产党。汪精卫因为蒋介石不打招呼擅自行动，竟然负气出走，赴法国马赛去了。当时柳亚子先生和国民党左派很多人士纷纷呼吁，坚决请汪精卫销假，以主持党务和政务。1927年，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四·一二”政变发生，汪精卫还为武汉《中央副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柳亚子先生与汪精卫的政见也完全一致，马上致电谴责蒋介石这种同室操戈的分裂行径。

总之，到这里为止，汪精卫的言行思想在柳亚子先生眼里大方向是正确的。汪精卫仍然是能人、是英雄、是荃蕙。汪精卫与柳亚子的交往一直比较密切。汪精卫参加南社比较早，在一千余人中，汪的入社号是第260号，1923年10月10日，新南社成立，汪精卫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合影留念，尽管政务繁忙，但汪精卫仍不断有诗词在

《南社丛刻》上发表，那时，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器重有加，推崇备至。记得柳亚子先生在作南社与新南社的比较时曾说过，南社是诗的，新南社是散文的，南社的代表人物为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人物则是廖仲恺。稍后，胡朴安从《南社丛刻》第3到21集中出了一个选本，名叫《南社丛选》，特地请汪精卫为之作序。

仍然是1927年，在8月6日汪精卫竟然发表了《错误与纠正》一文，称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他从此以后决定公开反共。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十分失望。柳在给友人姜长林等人的信中说，“武汉的事



汪精卫

情被老汪弄糟了”，表示对汪精卫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照道理他们两派应当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料，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起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局面。这就是汪主政、蒋主军，汪蒋共管国民党，和平分权的所谓“宁汉合流”。对此柳亚子先生感到异常痛心。对于蒋介石其人，柳亚子早已看透，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可是对汪精卫其人竟然与蒋介石同流合污，柳亚子内心的痛苦真是无法形容。汪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一向公认是孙中山先生的理论家、代言人。他这一转变，带着极大的欺骗性，将带动一批人向右转，一起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国的三民主义怎么能够实现，中国革命将走上更为曲折复杂的道路。

抗战爆发，汪精卫在7月29日和8月3日两次广播讲话，大谈抵抗就是牺牲，就是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因抵抗侵略而毁灭。叫嚷：“我们牺牲完了，我们之抵抗目的也就达到了。”众所周知，“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就是这个汪精卫，阳奉阴违，继续叫嚣“牢牢认定剿共事业不可中止”，诬蔑共产党利用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汪精卫甚至纠集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组成什么“低调俱乐部”，暗中策划与日本实现所谓的和平。荃蕙彻底化而为茅了，柳亚子先生痛心疾首，斥之为汪逆、国贼、千古罪人！

1938年11月26日，汪精卫偕同周佛海、陈公博等一小撮卖国贼逃离重庆，公开发表声明，响应日本军国主义提出的所谓“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三原则，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汪精卫终于撕下了假面具，由暗中通敌到公开卖国，沦为不齿于国家民族的狗屎堆。后来，在日本的武力压迫和政治引诱之下，汪精卫承认了伪满洲国，承认了华北的所谓“自治”和日本侵华以来的全部事实，在“防共”的名义下，又允许日本在华北、蒙疆、华南沿海岛屿和海南岛永久驻兵，完全满足了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侵略欲望。日本在1940年3月30日导

演了汪精卫的所谓“还都典礼”。其实，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完全是傀儡政府，卖国政府，直到日本投降为止，这个政府存在了五年零四个半月。柳亚子先生义愤填膺，多次痛斥汪逆汉奸。

有几次，南社社友和其他朋友要为柳亚子先生编全集，柳亚子都不肯同意，他说：“比如汉奸国贼，我从前和他有来往，有恭维他的诗，现在都不能用了……”直到晚年，柳亚子先生移居北长街89号，布置居室时，他亲自指挥安排，鲁迅的条幅、何香凝的画幅都悬挂在中堂。有人找出了汪精卫早年为柳亚子题的扇面和条幅，柳亚子不看则已，一看怒气冲天，挥着手说：“这，这，这种劳什子只配挂到厕所里去！”

综观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从由衷的佩服、热爱和推崇，到失望、痛心和憎恶，根本不凭私人的恩怨为转移，完全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他站立的高度、观察人品的视角、品评人物的标准，值得我们沉思和效法。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向中老年人传递阳光与活力 网址: www.chinaxtd.cn
订一份给自己，送上最温暖、最贴心的陪伴



《新天地》

原《老人天地》

邮发代号2-290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月刊 大16开 64页 全年48元 定价4元
订阅电话: 010—84257955
84200699

地址: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7区16号楼6层(100013)

爱因斯坦的 宇宙宗教感情

● 吴 江

最近在 2006 年 3 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读到《关于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一文(作者于祺明),益发觉得宗教问题大可研究。

这篇文章以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为题,引用了爱因斯坦关于宗教的不少言论,唯独我在别处看到的爱因斯坦的一段语录此文未提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未来的宗教应该是宇宙性的,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无需死板的教条与教义,包括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基于对一些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经验而成一体。佛教最符合这些条件。”此语见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 1985 年 9 月 19 日编写的一则资料。但我亦未查明此资料的出处,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记得该资料还记录了尼采的一句话,尼采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而我们知道,尼采是无神论者,几乎是反对一切宗教的。

于祺明的文章(以下简称于文)主要分析爱因斯坦为何

有“宇宙宗教感情”,对于爱因斯坦这个大科学家来说,我觉得谈这个问题有重要意义。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一点任何科学家都无法否定。有时当我们仰望渺渺的太空,发现有一些非常之奇妙的自然现象,有许多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自然结构,这时脑子中虽也出现一些从科学家论文中得到的所谓“宇宙大爆炸”、“虚粒子”、“量子力学”、“万物理论”、“暗物质和暗能量”(科学家认为它是整个宇宙不断扩张的力量)等概念及某些解释,但在认识上毕竟仍是一片虚空,更多的是会感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奥秘。这个时候的内心感觉,常常是和真诚的宗教信仰相接近。所以这时如果你问宇宙中是否有人或者有造物主在创造这一切,我想任何人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个故事:已故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曾对埃及共产党人说:“如果你们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奥妙和真正好处是什么,我马上就信仰共产

主义。”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宇宙的奥秘,而且人类有能力穷尽宇宙的所有奥秘,那我就可以立刻告诉你:我不相信任何宗教,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虚妄的。在这样假设的人当中,就有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内。

爱因斯坦早在 1946 年 5 月间的一场公众讲演中曾这样说:“原来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废除我们的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们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客观真理发现之一。人类从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以上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11页)

宗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宗教有不同的社会作用和倾向,有稳定社会并且有益于创造社会文明的正教,也有少数被人恶意运用并专门从事关于制造迷信以危害社会的邪教。这里不去谈这些,只谈爱因斯坦所讲的宗教。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看法并导致有关宇宙起源、黑洞和平行宇宙的理论。他还证明原子是存在的,光是由叫光子的粒子组成的,从而为核能和太阳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于文在这里介绍了这位大科学家虽然不相信鬼神和拟人化的上帝,但他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却多次提到“宗教”和所谓“宇宙宗教精神”。例如爱因斯坦说:“一般地说,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才能大大超出这个水平。但是属于所有这些人的还有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做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没有这种感情的人阐明它是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什么拟人化的上帝概念同它相对应。”他说:“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从

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究竟什么是“宇宙宗教感情”,于文有如下的解释:“爱因斯坦表达的意思很清楚:这是‘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已经超越了‘恐怖宗教’和‘道德宗教’两个阶段;是由对‘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的那种认识和‘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的那种感情所构成的。所以,“宇宙宗教感情”的含意,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的可认识,‘相信世界的本质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另一方面,‘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

爱因斯坦把宗教分为“恐怖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三阶段,因为对这三阶段没有比较分析,因此我们要了解它们仍然很不易。但从于文的叙述中大致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和他所从事的伟大的自然科学事业有关。一方面,他从事探索宇宙和他自幼受熏陶的宗教

感情也有关,特别当这种宗教精神和伟大的理性、理想相结合而成为一体的时候,正好像伽利略和哥白尼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也都是宗教徒,他们也有一种造福人类的宇宙宗教精神。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其应用产生一种深深的困惑,觉得自然科学获得的成就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给人类造成灾难,这是一个无情地摆在人类面前让人万分痛苦的问题。这是他们切身经历到感觉到的。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二战时期跑到美国,正是他,一个证明了原子存在的人,提醒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早制造原子弹,以便战胜法西斯强敌,因为他知道希特勒也正在加紧研制原子弹,时不我待,必须先下手为强(按:据2006年5月17日《环球时报》载:据俄罗斯《事实与论据》、《真理报》等媒体近日相继报道,纳粹德国已先于美国四个月就试爆了一颗小型原子弹并准备立即采取行动)。虽然爱因斯坦本人并未实际参加此项制造,但原子弹终于造出来了,而且抢先爆炸了。在日本广岛,一颗原子弹就使几十万人命丧黄泉。那还只不过是一颗粗糙的当量很小的原子弹,它的威力远远不能和目前人类拥有的核弹相比较。而据今年3月份《俄罗斯报》一则报道,现在全球已拥有三万颗核弹头,并已有将近五十个国家掌握了制造核弹的技术。试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几十颗核弹头因有人发疯而爆

炸,那我们人类及人类所居住的地球还能够存在吗?

这里我们可以插一段一位美国将军在二战刚结束时告诫大家的话。那是 1948 年 11 月 10 日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当时的美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即席发表了一篇演讲,其中说到:“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一位刚刚获得胜利的美国将军尚且有这种感慨,并向社会发出强烈的宗教呼吁,难道首先掌握原子奥秘的爱因斯坦会无动于衷吗?他会觉得他能置身于人类毁灭的灾难之外吗?无怪乎越到晚年爱因斯坦越痛苦地认识到:自然科学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不能由自然科学来决定,只能由人自己来决定。“要关心人本身”,“宗教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样的话他讲过不止一次。1951 年 1 月给在纽约举行的“伦理教育协会”成立 75 周年纪念会的贺信中,他又说:“在宗教清洗掉迷信成分以后,它所留下来的就是培养道德行为的这种最重要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



爱因斯坦

要部分,但对于宗教,教育却考虑得太少了,就连仅有的那一点考虑也还是很系统的。”所以,他呼吁:“当前世界政治上所处的可怕的困境,同我们的文明疏忽了这一方面的罪过有很大关系。要是没有‘伦理教育’,人类就不会得救。”(转引自于文)

在爱因斯坦看来,宗教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宇宙观,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而且,清洗掉迷信的成分,综合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经验,而成

为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的道德行为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当他环顾世界各宗教时,独认为佛教最符合这些条件,佛教有可能使人类得救。这是一位科学家对佛教的很高评价。

我们无法猜测爱因斯坦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看法,他怎么会把佛教看成是人类自救的办法之一。虽然他自幼受宗教的熏陶。就宗教本身来说,大凡世界各大宗教(当然除邪教外)的创立,都有其向善之心,

有某种救人之心。但世界各种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当宗教和政治相结合并为其所用的时候,宗教对社会的作用就会很不同了,会有正面的影响,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但即令如此,宗教毕竟将始终和不可解开的宇宙奥秘并存。从历史上看,就各宗教的社会影响看,产生并广泛传播于东方的佛教确有其特殊性,我认为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佛教确实是改造人自身的宗教,其学说要远超过其他宗教;第二,佛教又确实是最崇尚和平的宗教;第三,佛教有一种独特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量无边的,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这种宇宙观被称为宏观宇宙观,和现时的科学宇宙观暗合。爱因斯坦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佛教的这种特性,尤其是,至少他在世界上没有发现用佛教或佛教教派的名义发动的战争。

这就确实需要对佛教进行一番细致的研究。佛教没有“改造”人的说法,它用的是“超度”、“解脱”、“觉迷”、“涅槃寂静”等词,多少有些神秘色彩。印度的原始佛教不崇拜偶像,不相信神,不相信创世主。因此,从佛教的原始形态看,它确是“超越人化的”(说它是“泛信仰主义”也可以)。它所关注的是人本身,是人的生死、祸福、善恶报应等。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所以它的主旨是“灭苦”。灭苦之法,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它的学理基础是“因缘和合”,讲人的各

种遭遇是因各种实际的“关系”、“条件”而定,“关系”、“条件”变了,人的遭遇也要变。所以说人生须“随缘”。这里面就含有一种辩证法因素。再从佛教的一切修持方法和严格的戒律看,也都是从人本身的超度出发。佛教分小乘和大乘两个教派,两派在超度人方面有区别:小乘只是超度个人自身(所谓“独善其身”),大乘则主张超度众生(所谓“兼济天下”),认为只有众生超度了,自身才得以超度。这和梁启超所说的话暗合,梁曾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汤用彤先生则说佛教是“因理及教,依教说理”,此说甚是。爱因斯坦之所以看重佛教可能成为宇宙性的,是否和佛教的“因理及教,依教说理”有关?可以研究。

佛教的和平性质大家都可以看到,佛书中也到处强调这一点。东方人民和亚洲民族之所以多爱好和平,我想在一定意义上和佛教盛行有关系(日本可能是个例外,那多少是因为日本人的佛教精神敌不过他们的武士道精神的缘故)。

在世界各宗教中,佛教堪称和平宗教,这一点大致可以作出定论。佛教作为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不与其他教派发生无谓的冲突,更不导致战争,这种性质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在谈爱因斯坦的佛教观时,也不妨简略提一下佛教在中国的遭遇。据说在中国 13

亿人中,有 1 亿多是佛教徒。佛教本产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大约至少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跨过了“中国化”这一关,中国在此时恰正处在漫长的封建时期,而中国原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但却有各种各样迷信习惯的国家,所以当原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反而大大增加了封建迷信的成分。现在的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各方面现代化的时期,佛教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毫无例外也要过“现代化”这一关。所谓佛教的“现代化”,就是要使佛教在保持其自身的特性、主旨和基本的修持方法以外,要使其尽量适应现代人的宇宙观、思维习惯及其对人生的态度,即对完善人生的追求方法,并尽量减少其迷信成分。当然更要提高佛教群体的文化层次,注重社会慈善事业,在爱国爱教原则下开拓国际宗教的和平交往。这样做自然要有一个过程,但更重要的是佛教界本身要出一批有思想的改革家。赵朴初居士生前极力提倡“人间佛教”,是否就可以看作是这种改革的开始呢?

中国的佛教界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改革家,我相信,在当代的“佛教现代化”进程中,也一定能够出现更多的爱国爱教的思想家和改革家。

(2006 年 4 月)

(责任编辑 吴 思)

口号数字化 数码别太大

● 章立凡

如今什么都讲究“数字化”——恕我用这样的时髦字眼,来评说严肃的政治口号。

某日与朋辈聊天,扯起历年政治口号,真个蔚为壮观。其中有不少是数字口号,从革命年代的“三八作风”,历数到近年的这条那条。正当不胜枚举之际,我忽然发问:“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立时全场哑然,最终竟没有一位答得全的。

将政治主张口号化,是为了便于向群众宣传;将口号数字化,是为了便于群众记忆——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

例如革命军队的军纪,纲三条目八款,就概括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编了歌教唱,为的是让大家“个个牢记”。又如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也被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简称“三八作风”。

1949年以后,这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被从山沟带进城市,并迅速推广到全国,成为中国特色文化。于是有了“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等等……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数字口号也坚持大旗不倒:“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大家都熟知的;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干部“四化”“三讲”“三个代表”等等……

数字口号的特色是名称朗朗上口,缺点是具体内容未必人人记得牢——数码多了也会把人绕糊涂。例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歌可唱应好记,怎奈年代久远,不少年轻人以为跟“三八作风”是一回事;更可叹者,还有将“三八作风”与妇女节操混为一谈的……怎么这么不严肃?!

最尴尬的仍数“五讲四美三热爱”,二十多年前也曾风行一时,还以此为名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各地都设有分支机构;我以这句口号为题,逢人便考“脑筋急转弯”,一个圈子转下来,被考者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另一些口号的测试结果也不理想。

尘世日见浮躁,认真学文件的传统,早不知哪儿去了;烦琐犹如迂阔,面面俱到的口号,最终只剩数字外壳;提倡节约型社会,宣传工具给人脑的信息,超过最佳当量也属浪费。

举一能反仨,过五算白搭;口号数字化,数码别太大。

(2006年3月15日 风雨读书楼)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

● 陈麟德

一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放翁此诗三四句，用欲擒故纵法，点明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允的，它有不可估量的道德力量。从正面来说，有强大的感召力。史可法慕文天祥之为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誓死抗清。而史可法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三百六十多年以来，又不知激励了多少后人。在扬州城外梅花岭，有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就很能激发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以历史人物为楷模，以天下为己任，走上救国救民道路者史不绝书。可见，历史感召力是如何震撼人心。若从反面来说，则有无穷的震慑力，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连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均概莫能外。唐太宗深恐魏征把他与亡国之君隋炀帝联在一起。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一》中也记载赵匡胤畏惧史官。权臣宦官亦畏史官，汉末司徒王允杀蔡邕，即为例证。史笔千钧，岂可等闲视之。所以唐代刘知几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

二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史识”。清

代学者章学诚于史家“三长”外，又补充“史德”一条。这就是说，才能（素质）、学问（功底）、见识（修养）、品德（心术）并重，缺一不可。那么，什么是史家守正不阿的品德呢？那就是善恶必书。然除司马迁外，孔子而后的封建史家，鲜有秉笔直书者。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叙事极简，字寓褒贬。如“郑伯克段于鄢”，《东莱博议》中评议说：郑伯讨伐亲弟段，为什么不说克弟于鄢呢？这是因为“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冰霜一语，斧钺千秋的“春秋笔法”，可以说既有感召力，又有震慑力。“春秋笔法”就成了史家的传统笔法，中国历史著作的滥觞，“春秋笔法”也一直被沿用。其精髓有二：一是真实，二是简练。执著的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性命，传为美谈，代不乏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孔子一面为《春秋》立褒贬大法，一面又宣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就不能不视为“春秋笔法”之微瑕。

偏偏就有一位离经叛道的太史公司马迁，抑扬去取，自成一家。要在史学上有独特的创见和迥异的风格，必然要放言无惮，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当然就“是非颇谬于圣人”。他连汉朝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前代皇帝景帝刘启和当今皇帝武帝刘彻均敢于揭露其丑恶行径。司马迁是悲剧人物，他的笔下也不乏悲剧人物，可以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太史公能把自己的坎坷遭遇与历史人物的不幸结局结合起来。他读屈、贾赋，则悲其志，得其情，论者谓《屈贾列传》“以抑郁难遇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史记评议》）。这样字字皆血，句句有泪的文字，物我难分，能不感人！卓哉史圣，不特为灵均、长沙之知音，抑亦屈、贾文章之知己也。

私人修史盛于明,衰于清。明末清初,有人因修史而罹文字狱祸,即使侥幸未罹难者,其所著之史亦不能刊行问世。扬州兴化明季史学硕儒李清,曾任崇祯朝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弘光朝大理寺左寺丞。明社屋后,“归隐邑之枣园,四十年不窥户”(《咸丰兴化志本传》)。键户著书,写成明季著名史料专著——《三垣笔记》及《南渡录》。《三垣笔记》记载从崇祯十年至弘光元年作者任刑、吏、工给事中时朝章典故和大臣言行,无偏颇之言,存真实史料。《南渡录》为作者任弘光朝大理寺左寺丞时所辑录之诏谕章奏及朝臣言行,反映了弘光朝君臣从崇祯十七年四月至弘光元年五月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私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记》《录》均可匡《明史》之谬,补《明史》之缺。《清史稿·李清传》载:“编次《南渡录》等书,藏于家。”可见,成书后即遭禁锢,更未能付梓,仅有少数抄本流传。故乾隆修四库,首禁李清著书。后因清人入主中原已成定局,《明史》刊行问世时,将《南渡录》书名列《艺文志》,属杂史类。

三

记历史事件,应用直笔,忌用曲笔。曲笔非但不成其为良史,而且所书之史亦不成其为信史。是是非非,方为信史。倘无直笔之史,后人则承其谬谈。史笔之直、曲,决定了历史的真伪。

中华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一部二十五史,是中华民族据以知兴衰得失、子孙繁衍不息、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发轫史。然而清代写过《廿二史劄记》的著名史家赵翼告诫我们:“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后园居诗》)。此语虽言过其实,亦并非无稽之谈。

中国传统的惯例是新朝为旧朝修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的交接,无不扬新朝而抑旧朝,灭其国必先去其史,难免没有曲笔,难得求真存实。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南明弘光等政权尚与之相抗,就迫不及待地诏修《明史》,以示君临天下,而南明诸政权即为附赘悬疣矣。对于入关前爱新觉罗先世受明册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与不承认南明诸政权,不为南明诸帝立纪,均为难言之隐,讳

莫如深。弘光帝列传附于福王常洵之后,只写二百字,大量史实均不作记载。对于敌国之君的弘光帝,大泼污秽,竭尽诋毁,并借此宣扬“我大清兵”的赫赫武功。《明史》涉及反清言行一概讳而不载。南明弘光朝以左懋第为使往北京与清廷交涉,《左懋第传》闪烁其词,以清廷为正统而蔑视南明,对左一行如何不辱使命,保持民族气节直至壮烈殉国皆避而不谈,岂但《左懋第传》,《史可法传》《表继咸传》等何尝不是如此。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战”更不会载入正史,《明史》是不录清军暴行的。

纪传体史书的中心是人物传记,论人立传,必须直笔,切忌讳言,多所溢美或曲笔诬罔,均失之偏颇,不能修出信史。《二十五史》中的人物传记,林林总总,浩如烟海,而列后的评赞却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如果说传文是在纪史,那么评赞就是在评史,评鹭人物。如“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等等,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纵观“前四史”而下,史传评赞的作用主要为:1、总结经验,借以发挥政治见解;2、权衡功过,给人物以恰当评价;3、彰善瘅恶,宣扬社会道德;4、纠冤辨诬,发抒对世事的感慨;5、因人评事,就事论人,法善戒不善;6、怀念先贤,寄托敬意,发抒自身的感慨。如《史记·项羽本纪传赞》《史记·李将军列传评赞》均写得很出色。不仅正史人物传记后评赞百读不厌,即野史中对人、对事的评论亦不乏真知灼见。如明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不仁而有功”,虽“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然凿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运输”,“运漕商旅,来往不绝”(杜佑《通典》),“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于慎行之论,洵为卓见也。

四

史乘包括正史、野史笔记和地方志。正史为官修,取材大都来自国家档案,亦酌取私修材料。观点平稳、严肃,一本正经,语言凝重、严谨,极有分寸,处处体现官方对事件与人物的看法及评价,有老成持重之态,无标新立异之见。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述诸葛亮“有逸之才,英霸之

姿”，还专门给晋武帝司马炎进《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表》，陈寿父曾因故为诸葛亮处髡刑。臧否人物，不计个人恩怨，十分难能可贵，恐非溢美，当较可信。而《宋史》中对岳飞之死的记载则系泛泛而谈，官样文章，无鞭辟入里之见，未能深中肯綮。《岳飞传》载：“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秦桧传》亦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皆未道出个中真谛。迨至明代文征明《满江红·题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问世后，如石破天惊，“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揭露宋高宗不顾国恨家仇，贪恋帝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岳飞被害，咎在高宗，只不过假手秦桧而已。寥寥数语，一扫笼罩历史数百年之尘霾，道出岳飞之死的真相。尔后，清代郑板桥又步文征明之后尘，写出《绍兴》一诗：“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与“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有异曲同工之妙。文、郑春秋之笔，诛心之论，虽出自诗、词，然证之以史事，确系不易之论！高宗力阻二帝南返，有史为证：1、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是跟徽宗北狩之小臣，后携徽宗手书自间道遁归康王（即高宗），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奉徽宗由海道归。然而，康王却通过执政“出勋于外”九年不迁其官。2、太学生陈东于两宋之交屡次上书论时政，曾风光一时。最后竟上疏请高宗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结果，终因此次上疏而被斩首。

纳入正史的材料，极其审慎，宁缺勿滥。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一生放荡不羁，偏离传统观念，以致沉沦下僚，连在《宋史》上立传的资格都没有。小说家施耐庵、蒲松龄生平事迹就更不可能载入正史。唯其如此，自然而然就要借助于私人编修的野史和笔记了。《明史》不载左懋第使清的全部经过，李清的《三垣笔记》《南渡录》对左一行抗节不屈却写得气壮山河，惊天地而泣鬼神。由此可见，笔记专著里不无信史材料。野史笔记虽也免不了缘饰，甚至有讹传，挟恩怨。但尽管如此，野史笔记中确实包含着翔实可靠的史料，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在反映历史的真相上，有时比承袭官方材料的正史或官样文章真实、生动和具体。所以野史笔记常得史官之青睐，有些学术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却在野史笔记中偶然得

之。如《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究系何人捉刀，历来聚讼纷纭，各执一词。而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却言及此事：“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维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按彭士望《耻躬堂诗钞》卷十三《岁暮书怀第六首》，答书实系彭士望和欧阳斌元的好友王纲所作。“昔交王与欧，老死并无后。欧早负盛名，经术无不有。王为史相客，国书出其手。”彭士望《书欧阳子十交赞后》也记了王纲的活动，先是“纲从史公招徕高杰、复摄政国书俱出纲手”。除正、野史外，可从方志中得到许多从正史中无法得知的历史实际情况。如蒲松龄入江苏宝应知县孙蕙幕始末，孔尚任治水馆江苏兴化撰《桃花扇》二稿，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县官任上写成《牡丹亭》，均为正史所不录，而《宝应县志》《兴化县志》《遂昌县志》则详记之。北宋词人柳永事迹，散见于《镇江府志》《扬州府志》《崇安县志》《丹徒县志》和《隆庆真州志》中。《兴化县志续志》还为施耐庵立传，并载有《施耐庵墓记》《施耐庵墓志》等仅见资料，为学术界所瞩目。方志还可为正史补缺匡谬，如《明史·列女传》载：宝应一位女子嫁给戚家，“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其夫暴殁之原因似未说清，后阅《宝应县志》，方知新郎夜阑送客落水死，非“暴殁”。方志亦可印证野史中所作记载，如按俞曲园及彭士望所述，答书出于王纲之手。同治九年《续修江西乐平县志》有《王纲传》，记《答书》出于王手。邹儒《志补》（乾隆《江西乐平志补》）云：“王纲有经济才，学极淹贯。为文博大宏远，诗有盛唐风味。甲申之变，弘光建国南京，阁部史可法闻其名，走书聘至幕内，参预机务。顺治元年，豫王督师南下，致书可法。可法命幕下诸名士各属答草。纲草先就，诸名士见之，皆曰：‘无逾于公者’，因尽焚去。相传《答豫王书》乃纲笔也。”清代章学诚认为：方志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章氏遗书·方志立三书议》），确系信评！

历史除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外,还具有无穷无尽的道德力量,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圭臬,道德的天平,立身处世的杠杆,为国为民的动力,明荣知耻的教科书。即以一肩明月、两袖清风的清官而言,他们为什么能出淤泥而不染呢?主要由于道德观念的支配,无怪乎郑板桥作宰山东范县、潍县三年,最终只得三头毛驴,驮着铺盖卷儿、书、乐器,罢官回乡仍心安理得。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可法善戒不善。野史称秦桧后裔秦涧泉,拜岳庙,祭岳坟后,油然而生感叹说:“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历史是无情的,中国书法字体历代均以书法创始人姓名命名,如称颜真卿之书法为“颜体”,柳公权之书法为“柳体”,唯有宋体字却以朝代命名。宋体字的创始人是南宋秦桧,状元出身,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在书法上造诣很深。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派,创立了宋体字。后世以其为人卑污而不称秦体。历史是公允的,不能爱憎匿善恶。岳飞后代岳钟琪,是

清代雍正朝川陕总督,官封宁远大将军。雍正六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入陕,劝岳反清,被岳告发下狱。岳亲手炮制了一时震动全国、株连千百人的“曾静狱案”。这个岳家后裔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当年秦桧陷害他的远祖岳飞的翻版。而秦桧的曾孙秦巨,却是南宋抗金战争中一位英雄。他为国尽忠的言行,八百多年后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可见,功罪有时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近年来有人著文诋毁保卫扬州以身殉国的史可法,不顾扬州百万生灵,难免沾名钓誉之嫌。甚至连写过“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之楹联赞颂史可法的郭沫若,也遭到嘲弄。更有人称“扬州八怪浅薄”,否定郑板桥诗、书、画三绝等等,皆为失之偏颇的曲笔。良史诛意,是是非非。褒贬不当,必为议者所病而被视为秽诬。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青蝇点素,枉费心机。明荣知耻,以德治国,不可不以史为鉴。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马克思的女儿不是嫁给资本家

● 高 放

贵刊第7期《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实录了陆定一、李锐和项南三老领导于1988年10月5日在北京医院聚谈的内容,读后深受教益。只是有一段话不符合实际,请予更正。

项南讲到“文革”中中央曾经发个文件,把陆定一祖宗三代的照片都印出来了,说陆定一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地主的孝子贤孙。项南接着说:“1985年我和胡启立到了西德,到了马克思的诞生地特利尔,看他的故居,有一个马克思家庭的系统表,其中有一个他很喜欢的女儿,叫珍妮。珍妮的丈夫是荷兰人,叫飞利浦斯。我就问:这个飞利浦斯和家用电器的飞利浦斯是不是一个人。他说就是他。你看,马克思的女儿也是可以嫁给资本家的,马克思也没有僵化到把成份论看得这么厉害。”

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有三个女儿,都不是嫁给资本家。大女儿燕妮(不叫珍妮)嫁给法国新闻工作者沙尔·龙格;二女儿劳拉嫁给法国籍的英

国外科医生保尔·拉法格;三女儿爱琳娜嫁给英国的大学教师和文艺工作者爱德华·艾威林。其中大女婿龙格是农村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二女婿拉法格是葡萄种植园主家庭出身;三女婿艾威林是爱尔兰基督教牧师的儿子。马克思不重视女婿的成份是真的。

项南谈到的他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看到的马克思家庭的系统表,已经收入今年6月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马克思传(插图本)》附录,第496页。这份“马克思家谱”列出了马克思一家前后十代主要成员的姓名和生卒年份,从其中中国读者可以第一次看出马克思七个子女(不包括另一个死婴)三个女婿以及孙辈的简况。

那么项南在谈话中提到的荷兰人飞利浦斯究竟与马克思是什么关系呢?莱昂·飞利浦斯是马克思的姨父,莱昂的儿子和孙子于1891年创办了飞利浦斯电器公司。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

(中)

编者按:在7月14日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茶话会上,十几位同志作了精采发言,第八期登了几篇,这一期又登出五位的发言和贺信。第10期将刊出其余发言。

愿望出现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

● 阎明复(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

我是《炎黄春秋》的老读者,《炎黄春秋》对我来说,是良师益友,每期看完之后,都有许多感慨。我不可能像刚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领导人张文彬同志那样,详细地评述《炎黄春秋》的文章,但是,很多文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今天在座的白介夫白老写的《我和萧光琰的交往》,写了和一位从海外回来的爱国的工程师、爱国的专家萧光琰在一起共事的那段经历。我是流着眼泪读这篇文章的。萧光琰热爱祖国,不远万里从海外归来,投向我们党的怀抱,结果却因为我们党的错误而结局悲惨,他的夫人和爱女同他一起被迫自杀。我们作为共产党的一员是



有愧于他们的。这个结局是不应该有的。回忆邓拓的文章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邓拓是我们党的秀才,现在年轻人当中像邓拓那样有才华的人是太少了,他也牺牲了。这些文章我们应该把它编辑成册,留给后代。我不知道《炎黄春秋》在青年中的读者有多少。我想,在杂志社和社会各界同志热情地支持下,《炎黄春秋》能更加求实胆大,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代。

我也希望有关主管机关能够给《炎黄春秋》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抗战时期,毛主席讲,判断一个事物正确与否,主要要看它是“延安还是西安”,况且现在是我们党领导的天下。《炎黄春秋》在巩固党的领导、改善党

的领导,教育人民等方面,起着这么好的作用,应该更宽松地对待它。即使有一两篇文章发表的不合适,也万万不可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禁止转载它的文章,甚至禁止发行,应该给它一个宽松的环境。另外,要相信读者,读者是有判断力的,让读者在阅读当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是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我写了一些在给毛主席当翻译过程中的经历,发表在《炎黄春秋》上。有一篇有一个史实上的错误,读者就很不客气地给我指出来。我陪彭真同志到印度尼西亚去,我记得当时的印共中央的领袖艾地请我们到一个别墅去,留下一张照片,所以,我的

文章就放上了这张照片,我给照片的说明说当中站着的是艾地。文章发表后,当年在新华总社雅加达分社任社长的一位同志就给我写信,说你错了,这不是艾地,是约多。这位同志认识约多。后来我就请一位同志到中联部里去找张向明同志核实,张老当年是认识这些人的。可张老说,他年纪大了不记得了。通过这个事例可以说明,读者有非常敏锐的眼力。很多读者还有非常正直的良心,又有很高的觉悟,读者是有判断力的。《炎黄春秋》拥有这么多读者,而且发行量越来越大,正说明了这一点。

祝《炎黄春秋》杂志能越办越好,越来越发挥教育人民的好作用!

忘记了历史， 就只能在 原地踏步

● 朱厚泽(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炎黄春秋》创刊 15 周年了,要讲祝贺的话、希望的话,我想讲这样两句话:一句叫保留记忆,一句是保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她的未来的。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来的地方踏步,只能在已经逝去的生活里往复循环。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清华中学图书馆里有好些书,我们这些刚懂事其实还很不懂事的毛娃娃,就拿起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胡翻,有些好像看懂了,其实好些也没有看懂。这些年我又重新看梁启超的一些文章,感到有些惊异,也有点悲哀: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们思索的范围,没有超出他们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有一些大报上发表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其实好多是梁启超那个时代已经批判过的东西,现在居然拿出来,当作发明,大登特登。

所以,我在想: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炎黄春秋》在保留记忆、保存信史上做了许多努力,我和好多读者都感到非常高兴。



刚才李锐同志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炎黄春秋》有这么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要刊登一篇陆定一同志去世前的谈话,作者和编者还不得不把他老人家谈话中的某些个别内容进行“删节”或“改头换面”,才便于发表,这能不让人感到一丝悲凉吗?

就这样生活下去,让我们的后辈也这样生活下去,行吗?……这总是不行的吧。争取到像李锐同志刚才所讲的那样的环境,把宪法早已明确宣示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兑现,这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一个深深埋藏在心中的希望。而要使这种希望成为现实,恐怕是不能光靠等待的。

《炎黄春秋》得到这么多老同志的支持,大家一起来为这个希望的实现而努力。

《炎黄春秋》要在“保留记忆,保存信史”这两个问题上做得更好,就要在“鉴别真伪,揭穿谎言”这两条上,进一步认真下功夫。那么,我想,《炎黄春秋》也就一定能在“以史为鉴,开拓未来”这两条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杂志办得更好! 谢谢。

《炎黄春秋》的生命是无限的

● 胡绩伟



我祝贺你们,感谢你们,这个“你们”是指你们全体同志,而不是刊物。《炎黄春秋》不是“你们的刊物”,而是“我们的刊物”,是人民大众的刊物。它不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是与世长存的。在你们诸位仁人智士的驾驭下,正如长江一样,滚滚东流,汇入海洋的!

紧紧地握手!

胡绩伟敬贺

2006.7.6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人民日报社公用信箋

我祝贺你们,感谢你们,这个“你们”是指你们全体同志,而不是刊物。《炎黄春秋》不是“你们的刊物”,而是“我们的刊物”,是人民大众的刊物。它不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是与世长存的。在你们诸位仁人智士的驾驭下,正如长江一样,滚滚东流,汇入海洋的!

紧紧地握手!

胡绩伟敬贺

2006.7.6.

诚实而严肃地对待历史

● 冯 健(著名记者,新华社原副社长)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十多年,每次拿到这本杂志,基本是一页一页地读到最后一页。我看完了给孩子们看,孩子们看完了还要送给我的哥嫂看,他们是85岁以上的教师。所以,我这一份杂志等于三份,它的读者就更多了。按我这份杂志的读者数量推算,《炎黄春秋》的读者恐怕有上百万。

我读《炎黄春秋》这么多年,印象深的有两点。一是诚实而严肃地对待历史,二是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

能不能做到这两点,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是一件大事。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历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诚实而严肃地对待历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还是很难很难的。古往今来都是这样。文革开始到今天已经40年了。这40年我们都经历过,其中有很多大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是不是一件件都诚实地对待了?是不是都吸取了教训?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1981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



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错误发动”,“内乱”,“灾难”是不是诚实、严肃地对待了?有多少教训?是不是认真总结了、吸取了、借鉴了?我认为差得很远。

唐代文学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这篇著名文章最后的一句话,是点睛之笔。杜牧生在唐朝末年。唐敬宗准备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殿。杜牧写《阿房宫赋》目的是警

唐。但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是警唐,它总结了一个历史规律。历史是公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最终要作出评判。当代人不能评判,后人也要评判的。当代人不能哀之,鉴之,后人也一定要哀之,鉴之。

《炎黄春秋》就是评判历史的一本杂志。要给读者灌输,让读者都能诚实地、严肃地对待历史,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对历史重大事件要哀之,鉴之。为什么《炎黄春秋》这本杂志发行量年年上升,影响越来越大?原因就在这里。读者喜欢它,原因也在这里。现在这本杂志已经有了十五周年的历史,我们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诚实、严肃地对待历史,对历史哀之,鉴之。

《炎黄春秋》 印象

● 李 乔（北京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炎黄春秋》是我最爱读的杂志，其爱读的程度，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书籍和报刊。这不是夸张，是真的。我自认为是《炎黄春秋》的“红色恋人”，开始是相见恨晚，继而海誓山盟，终至难舍难分。我是七八年前才读到这份杂志的，故曰相见恨晚。没有任何人向我推荐，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广告，但一接触，便放不下。因为我知道，我一展卷，就要和一段真实的历史，一些沉重而又非常重要的、不能回避的话题接触了。

许多革命前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谈到年轻时看《新青年》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猜想，就是耳目一新，心头一振，振聋发聩。这种感觉，我在读《炎黄春秋》时似乎也感受到了些，我因此有时也将《炎黄春秋》比作《新青年》，我好像也有一点点革命前辈读《新青年》时的感觉了。

《炎黄春秋》不是官定正史，也不是纯粹的野史，但却有着鲁迅先生所说的野史的好处，首先是不摆官架子，再有就是，不仅仅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月光从树影中照在莓苔之上，写照出了当日的许多事实，而是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的历史真相。

《炎黄春秋》的“春秋”二字，甚好。“春秋”者，既标明了这是一本历史杂志，也代表了一种褒贬憎爱的严正态度。“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炎黄春秋》就有这个功能和作用。比如，坚持《历史决议》的正确立场，对“文革”做出如实的记述、评说，给予严正的批判，确会使“乱臣贼子惧”，也会使无知者和糊涂人士受到教育。举两个例子。我报有两位编辑，都是名牌大



学研究生，30余岁，能力不低，但对“文革”知之太少。一次在美化版面时，欲将一方篆刻作品发表，已上了大样，我一看，图章上赫然三个大字：“天天读”。我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天天读”吗？他说不知道。若不是我及时发现，就见报了。另一位编辑在编一篇歌颂田汉的稿子时，做了一个标题《作为“四条汉子”的田汉》。我一看，大惊，问他，才知道，他以为“四条汉子”是个褒称，如同“新闻百佳”，“企业500强”。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个标题呢？他说，因为觉得“田汉真是一条汉子！”这是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事，多么可笑和可悲。这是年青人不了解“文革”历史的结果，是少数总想给“文革”评功摆好的先生们培育出来的一代新人。《炎黄春秋》那篇批评“十年失误”之说的文章很好。应该多想办法让年轻人也看到这份杂志。对于“文革”，我认为，当然不能整本杂志、满篇报纸总是登，但也应该保持一定的量（哪怕是较少的量），不能像一些报刊那样，一个字都不登，真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炎黄春秋》有董狐之风，有太史公之笔，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实，实事求是共产党人修史的本分，遥想三百年前的乾嘉学派，他们把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家法，难道共产党人还不如乾嘉诸老吗？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永远的丰碑”栏目很好，看后很受教育，但也感到有的文章有若干失当之处。比如，张闻天是总书记就没写，连“负总责”也不写。又如段德昌之死，只说是“牺牲”，人们还以为是牺牲在战场上，而实际上是死于夏曦的肃反。这些，都不仅仅是加减几个字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历史

的真实性和历史评价的大问题。《炎黄春秋》是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如刚刚刊出的张培森的《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一文,就是例子。办历史刊物有很多原则,如照顾大局、考虑现实、古为今用等等,但书写历史,实事求是应是最高原则。

《炎黄春秋》很尊重广大党员和人民的知情权,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包括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一些讲话,如小平同志讲的“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压人”那段话,我最早就是在《炎黄春秋》上见到的。有时看到一些刊出的史料,我就想,幸亏这本《炎黄春秋》登了,否则,真不知到哪里才能得知。

我从《炎黄春秋》这本杂志中,不仅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许多精彩观点,更可以看到这本杂志借以立身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类解放,以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为崇高目标。《炎黄春秋》做到了陈云同志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想再加上一句,就是“不信神,不信邪,不怕鬼”。

从《炎黄春秋》的许多文章中,我能深切地感到编者特别是许多革命老前辈作者的拳拳屈子之心,即屈原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更感受到了他们那种张横渠式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和理想。我仿佛听到了这些老革命作者的年轻时的心在跳动。

《炎黄春秋》也有缺点和不足,我想提几点意见和希望。

一、听一位《纵横》杂志的朋友说,《炎黄春秋》有时有史实上的失误。我不知具体指什么。但我想,《炎黄春秋》今后在史实的考订方面再多下一些功夫会更好。

二、文字上有时欠通顺。比如,刚出的这期杂志第73页说,“要避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不再重演”,这话说反了,“避免不再重演”,不就等于要重演吗?我的一篇小文,把“报喜不报忧”,形容为“哪壶不开不提哪壶”,但发表时却错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意思也反了。

三、希望作者的面再宽一些,如新当选的许嘉璐副委员长,刚给本报写了文章,《新华文摘》马上就要转载,希望能在《炎黄春秋》上也能看到许先生的文章。“炎黄”二字,是个内涵最大的概念,希望《炎黄春秋》扩大作者,海纳百川。

为祝贺《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我写了一首小诗:

血性文章君子风,
爱敬炎黄九州同。
屈子高擎董狐笔,
横渠频敲警世钟。
乱臣贼子畏《春秋》,
志士仁人意纵横。
莫道尘埃掩真史,
人民方为太史公。

最后,祝愿《炎黄春秋》健康、长寿!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欢迎订阅2007年

《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传真：(010)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6年第**9**期

周恩来与定西救灾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邓宝珊将军文革蒙难记

“红色间谍”郭汝瑰

李普今年八十八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